



共产主义者

季刊第1期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 2025.5

时事

中国的经济转型
——资本主义的两头堵

理论

社会主义革命
的战略与策略



我们是谁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政治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寰宇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华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寰宇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华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中国和华人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寰宇内的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以双手开拓的、属于新世界未来的晨曦！

时事

I	杨铭宇黄焖鸡米饭塌房事件	04
II	被开盒的孕妇：我们时代的“尊重用户隐私”	08
III	资本主义的双簧戏——中国强制下班的背后是什么	10
IV	美国发生”群聊门“事件——阶级国家官僚的厚颜无耻	13
V	土耳其抗议的启示——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独立的政治领导	17
VI	关税、贸易战：右翼民粹主义的无足之鸟	20
VII	中国的经济转型——资本主义的两头堵	23

26	中式教育体制下的口号文化：消费主义与政治冷感	VIII
42	“左派之主体性”——为何要纠结“网左”与“真左”？	IX
47	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与策略	X
66	唯物主义辩证法简论	XI
79	如何在当下中国组织一个布尔什维克党	XII
82	文化战线：我们的现实与革命的自由	XIII

理论

I

黄焖鸡米饭塌房事件

3月12号，新京报的记者暗访多家杨铭宇黄焖鸡米饭加盟店，报出诸如使用存放多天的发酸食材、顾客食用后的剩菜回收再加工售卖、隔夜发黑的牛肉加色素后冒充新鲜牛肉等问题。

在第二天的3月13号，国务院食安办就对对山东、河南核查处置“杨铭宇黄焖鸡米饭后厨乱象”实行挂牌督办。

食品安全被称为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是以“为人民服务”的中共及政府极其重视的领域。然而，远的来算有08年的三鹿奶粉大头娃娃，近几年的从22年315晚会曝光的土坑腌制老坛酸菜牛肉面，24年7月的食用油罐车混运，24年11月的良品铺子配料造假，再到前几天的黄焖鸡。重大食品安全一次次的发生，屡禁不止，原因何在？

偷工减料，店长制胜小诀窍

杨铭宇黄焖鸡米饭作为一家成立于2011年的“中国餐饮品牌成功典范”的连锁餐饮品牌，荣获无数荣誉，成功将黄焖鸡米饭变成中国大街小巷都有的流行菜。即使在之前也屡屡爆发出过数次安全问题，但著名的大牌子让无数人依然选择相信。然而，此次事件已让该品牌门店受到严重影响，营业额锐减。品牌建立起的信任如今已被打碎，但仍有相当的人抱有“价格低廉”或者“我吃的那家挺好”的思想而仍然对品牌持一定支持态度，并认为此事件乃是“蹭315热度而对品牌展开的攻击”，“不要因此波及所有加盟店”。作为加盟品牌，各个店面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为什么店长要冒着被曝光和检查的风险选择赚“黑心钱”？

其原因可以说是品牌方管理不严，市场监管力度不大等等原因。但最根本上讲，作为一个付出昂贵加盟费和各种其他费用的店主，即使餐饮行业本身获利颇丰，若想提高利润率，最为简单也可以说是最为古老的办法就是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在市场和利润的驱动下，无数的“黑心钱”现象势必像表面平静的江河下的暗流般生生不息。

政府出手，可否解其弊端？

在一次次的食品安全问题被曝光后，大部分时候政府总是选择站在消费者这边来讲话（反例

就如上文所提的良品铺子事件），替消费者伸张正义，以市场监管委等等机关替群众实行实际的监督权。

然而结果往往是这一次的事件平息了，而后相隔不久又有相似的事情发生。各种食品安全问题在政府铁拳的制裁下似乎在大体上总是有效的，能够在一定程度抑制各个店老板的侥幸心理，并逐步改善社会的食品安全问题，但在根本上始终无法彻底杜绝此类问题的频发。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政府用来处理此类问题的方法几乎都是补救式的，不管是日常的检查监督，还是如此般的“挂牌监督”，政府的监督始终只能作为各门店运行中的辅助监督的角色，无法对每一个门店 24 小时出售的每一份菜进行核查监督。

政府只有在整个运行过程中出现明显、可能动摇社会稳定之根本时才会站出来，以纠错者的身份敲打敲打各个品牌和店长。就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要义那般，把生产的自由交给老板，政府作为监管者与调配者自上而下地督办其运行。



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死结，各个老板在市场和利润的驱动下总是为了提高利润，赚更多的钱，由此总是有着偷工减料的冲动。而政府作为监督者又不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份冲动，恰恰相反他反而是鼓励这份冲动源头的那份目的——资本主义体制因价值规律而驱动的逐利之目的——只要逐利的手段不至于从宏观层面整体危害到了市场经济的运行，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就可以大为听之任之。

同时，这样的偷工减料也仅仅是因为严重影响到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和群众的健康因而才被当作负面典型予以打击，成为需要被整治的非法活动。无数的合法的甚至是被鼓励的“偷工减料”正在无时无刻的在我们身边发生，就比如最为经典和臭名昭著的由飞利浦、通用电气等组成的太阳神垄断联盟通过控制白炽灯的寿命，操纵灯泡的制造和销售，最终让次品成为了正品，影响直至今日。

更进一步，前面是通过对产品的偷工减料来提高利润率，还有一种同样简单而古老的办法便是压低实际劳动者的工资，对工资“偷工减料”，让本该工作八小时甚至更短的例如四个小时的时间就能拿到的工资变为需要“自愿”在八个小时基础上加班两个小时乃至更多的时间才能拿到，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

何处是出路？

在新京报的曝光视频中，那位将剩菜重新加工装盘的大妈的一番话令我们动容：“吃出问题都是饭店的事，跟你干活的有啥关系。咱干好咱的活，他叫咱弄啥咱弄啥。”“（顾客）要找也是找老板的麻烦，不会找你的麻烦。”这就是普通劳动者对黑心老板的态度。其实所有人都理所应当明白这样做是不对的，是昧良心的，但是也无人能够保持清高，大家都能想象若是不去这样昧着良心办事的结果将如何——大妈没有把后面的话说出来，但结果我们都很清楚，那就是被老板解雇。在所有对待此事件和相似事件的过程中，社会舆情都是直指各店主和品牌方，然而所有人都很清楚这些绝非是某些老板所称什么“员工的失误”等等，老板与员工的对立和其支配地位是我们在心中的前提。

在这个对立的基础之上，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在当今时代，可以通过网络媒体的方式补足传统政府监管的不足，通过网络舆情和各项曝光使得政府注意到这些事，使得这种黑心商家越来越少。

然而我们应当说到，这种方式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监管方式，没有改变各个消费者原子化的状态，无疑只是为政府砸下铁拳多了种辅助的手段罢了——当然了，如果砸下铁拳不能够捂住大家的嘴巴而是会在本就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上火上浇油，那么政府当然乐于让大家噤声，连铁拳也不会砸下来。

那么路究竟在何方？

我们认为，只有改变各个消费者孤立、原子化的状态，真正让全国的消费者成为一个坚实的独立的组织，而不是现在这个被政府直接控制的消费者协会。在此基础之上，才能摆脱对于政府阴晴不定心情的揣测，摆脱因曝光流量不够，恶劣程度不大等而石沉大海的局面，保证真正做到对每一个违反底线的商家实行彻底的直接的斗争和整改，对各商家和政府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监督。

同时，有必要让各个负责生产、运输等各个环节的劳动者乃至最终端的商家以及消费者组织在一个统一的劳动者组织之中，以最为灵活的调整各个生产和销售环节，最大限度的避免浪费，充分的利用各项资源，并且使得最终的产品能直接的受消费者的反馈而不断改进调节，同时也实行最严格的监督作用。

我们已经注意到，要实现以上两点很明显是与老板的利益不符合的，老板的门店是自己的店，可不会接受这样一个组织和协会对自己的生产和销售指手画脚。官老爷和钱袋子不会容得下我们为自己的安全与权益发声，他们过去这么多年以来总是借助治标不治本的缝缝补补了，层出不穷的事件全部向我们指向了一点：紧靠着社会舆论的压力、政府的决心、老板的善心是绝无可能保证杜绝此类事件一再发生的。本就是劳动者和工人的消费者必须紧紧站在广大食品产业从业者、广大因资本剥削而不得不昧著良心办事儿的、同为工人的员工身边，消除一切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的矛盾。

我们自然明白，随着中国经济一再陷入困境，就连大资本、大企业想要盈利也已经愈发艰难。在全中国与全世界市场经济陷入危机的当前局势下，任何温和的改良口号与劳动者们团结起

来的行为都会招致政府最深入骨髓的恐慌。消灭消费者与食品产业工人们之间的矛盾不是一朝一夕或者某种独立的、片面的尝试，而是最为真切的、同当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冲突的目标。只有我们成为我们命运的主宰，只有当我们真正的破除了一切私有制，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社会，才能让我们每个人生活在真正的幸福与美满之中。而若要实现这样的公有制，唯一的出路由过去和现在的全部历史已经向我们揭露出来了：无产阶级革命。



II

被开盒的孕妇： 我们时代的“尊重用户隐私”

近日，一网友因饭圈纠纷对一名 B 站孕妇进行“开盒”。该用户不仅发布了大量针对该孕妇的侮辱性言论，还自称是百度副总裁之女。在她以往的微博帖子中出现过网购平台的订单截图，截图中的商品收货人显示为“谢广军”。经查证，百度公司内部确有名为谢广军的高管人员，而他的女儿仅 13 岁。

3 月 17 日，百度公司高管谢广军在微信朋友圈致歉。百度公司同时发布声明称，开盒信息并非来源百度。

尽管百度官方想方设法使公众相信数据并不是从数据库中泄漏的，但是这样苍白的辩解根本无法服众。公告称，百度内部实施了数据的匿名化、假名化处理；数据存储和管理实行严格隔离和权限分离，任何职级的员工及高管均无权限触碰用户数据；百度安全部门反复调取了相关日志，并查验当事人权限——结果表明，开盒信息并非源自百度。而是源自海外平台上的“社工库”。

“社工库”全称为“社会工程学数据库”——简单来讲，就是网络黑客将泄露的用户数据进行整合分析，然后集中归档的数据库。如果说开盒是某种攻击手段，那么社工库，就是开盒者的武器箱和“买凶”服务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对个人隐私的贩卖早已形成了一整条完整的产业链；位于缅甸的各类早已为人熟知的诈骗犯罪园区被曝光时，调查人员就发现了大量从中国走私而来的电话卡，并且有数量众多的待拨打以实施犯罪的电话号码。在国内实名的电话卡，竟可以被大量走私！

这一令人骇人听闻的新闻背后的逻辑链浅显易懂——是服务商和走私犯、黑客一同打造了这条贩卖人们隐私的产业链，政府及其腐败官员们对人们的信息收集愈全面，那毛孔处滴着血的资本就有多肮脏，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次开盒不过是将人们最后的遮羞布揭下罢了。侵犯隐私，权贵易如反掌；主张维权，上访难如登天。名人隐私权比金子还贵，普通人的隐私权贱如如草芥，不是法律或者政府的失误，而是立法时目标即为如此：中国的隐私权侵权赔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财产损失赔偿，即侵权行为造成的实际财产性的损害；二是精神损害赔偿。如果一位名人出现泄密，其隐私权及其后的法律起诉可以带来巨大收益，折算成许

多赔偿金，但普通的大众受害者在审判定量时根本定不出仨瓜两枣。而在“精神赔偿”层面，二者则是同样“廉价”。

隐私权不过是法律的一纸空文，因为国家机器就在肆无忌惮地侵犯中国人的隐私，在言论平台对言论的审查，为了地方绩效搞“远洋捕捞”，对无辜的维权者和上访工人进行监视居住——种种行为无不是建立在侵犯隐私的行政手段之上。威权政体并不会是国家机器的永恒形态，相反，它终将被无产阶级所粉碎。我们呼吁全体劳苦大众的团结，目标就是为了推翻这样恐怖的体制机器。



谢广军

最近，我13岁的女儿在网上与人争执，情绪失控下，把海外社群网站上的他人隐私信息发布在自己的账号上，进而导致自己的个人信息也被曝光，引发大量负面言论扩散。作为父亲，未能及时察觉并引导她正确处理问题，未能及时教会她尊重、保护他人及自己隐私，我深感愧疚。针对此次事件，我已与女儿沟通，严肃批评了她的行为，在此，也向所有受影响的朋友郑重道歉。

作为未成年人，女儿的心智尚未成熟，在冲动中做出了错误决定，伤害他人的同时，也因这场风波承受了远超年龄的压力与伤害。在此，恳请大家停止扩散相关内容，给她一点改正和成长的空间。

III

资本主义的双簧戏 中国强制下班的背后是什么

近期，欧盟宣布不再进口所谓“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参见欧罗巴联盟《强迫劳动禁令》）。这新政策立刻让中国政府慌了神，中国已经因为美国的关税壁垒而失去了一部分美国市场，倘若再因为此事丢掉部分欧洲市场，毫无疑问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冲击，于是像大疆、比亚迪等制造业大厂纷纷开始让员工“强制下班”。一向追求“内卷”的中国资本家突然大发善心让工人不再加班，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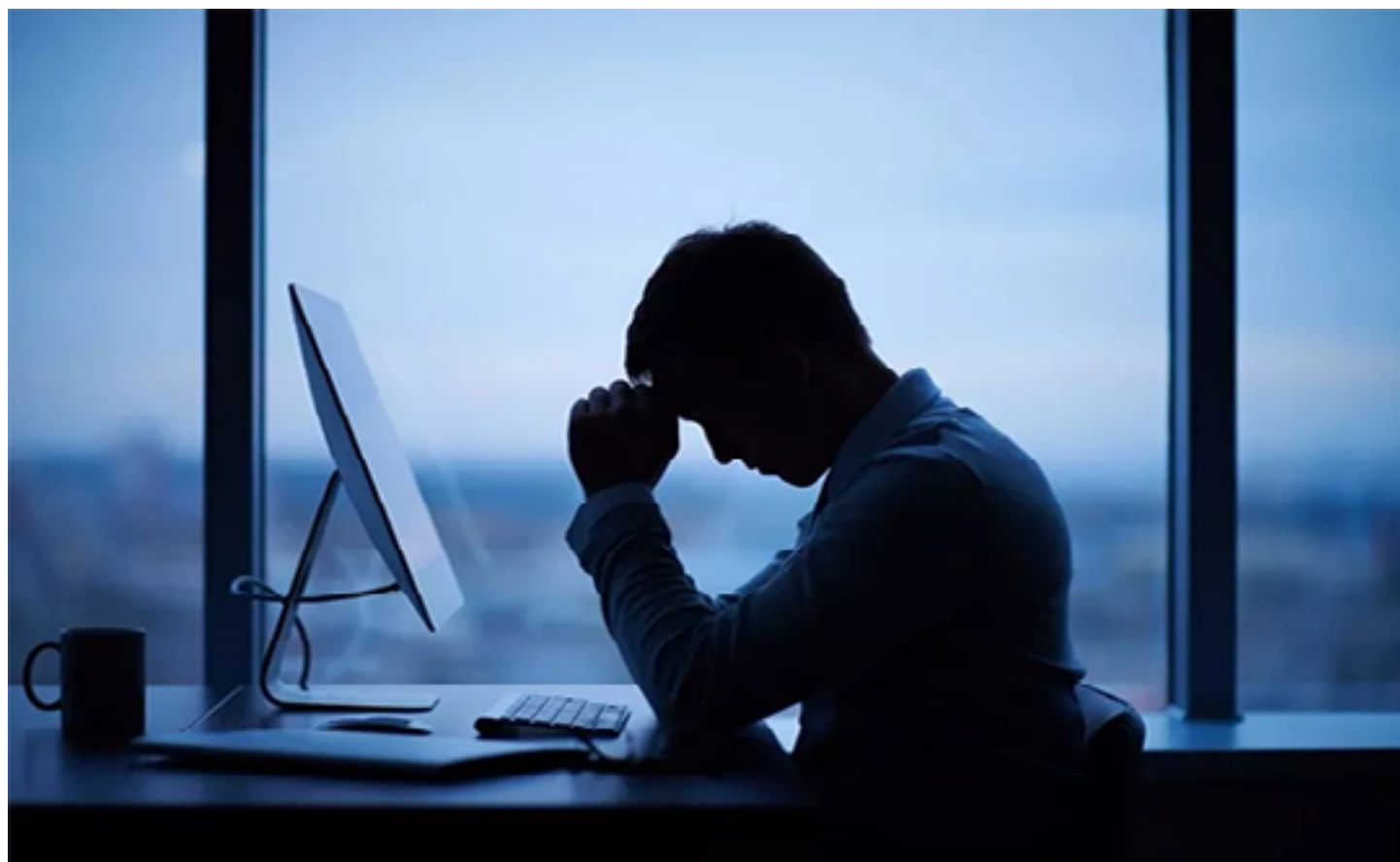
1. 假下班，真剥削

消息一出现在中国网络，有无数劳动者拍手叫好，声称“欧盟才是我们的总工会”，这无疑是中国劳动者长期受本国资本家直接剥削压榨的不满的表现，但也有人为欧盟唱衰，说这是欧盟搞贸易保护，是要摆架子。当然，我们最要注意的一种声音是“实际上，工作根本没有减少，加班费也不用给了”——是的，所谓“强制下班”只是一种美妙的谎言，这些大厂往往会在“合法的上班时间”内增加更多工作量，或是“打卡下班，但工作照旧”。中国的资本家不会大发善心削减工时，或是给工人更好的待遇，而只会巧立名目地设法增加工人们的工作量，正如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所说的：

“既然他已经把他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他所创造的全部价值或产品，便都属于资本家，即他的劳动力的暂时所有者。资本家预付 3 先令，结果却实得 6 先令的价值，因为，他预付的价值是 6 小时劳动的结晶，而他收回的价值却是 12 小时劳动的结晶”

资本家本就可以靠非常高的劳动时长来获取不菲的利润了，现在将工时减到 8 小时，只不过是原有的高额利润上失去了很小一部分而已——资本家依旧在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何况所谓的 8 小时劳动只是个幌子，生产资料完全不属于工人，工人的劳动完全不属于自己；工人无论是生产 8 小时（如果算上加班则一般超过 10 小时）还是生产 12 小时，他付出的劳动完全是在给资本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利润，资本家赚得盆满钵满，而劳动者们在所谓的“减缓内卷下”却依旧没有获得任何的好处，只不过是心理上舒服点罢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

透过现象看本质，大厂强制下班是“假下班，真剥削”，给强制下班套上一层“减缓内卷”的保护膜是可笑的，资本家不仅不会让工人们“不内卷”反而是要让工人们更内卷，让业绩、指标层层加码到工人身上，即使有所谓的“强制下班”又能改变什么呢？不仅如此，由于所谓“强制下班”导致的工资减少，一部分人甚至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再打一分工——这是非常讽刺的，共产主义者的八小时工作制是为了工人能全心全意的投入为自身的劳动中，而在中国政府的实施下却又成为了压在普通人身上的一个重担，无产者一无所有，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维持生计，而不像那些企业家老板一样成天坐办公室就有无数的钱能花。



2. 中国政府和资本家的双簧戏

正如上文所说，所谓“强制下班”只是一种欺骗的手段，当中国政府的媒体在借此事大规模宣扬要减缓社会内卷的时候，无数个地区的无数个血汗工厂在运作着，无数个劳动者在经历了一天的被剥削后，回家看到强制下班的对象却又不包括自己，便感到十分的愤怒。但政府却说：“我们已经在改良工人的待遇了，我们一定会解决社会问题，我们一定会解决内卷问题。”于是可怜的劳动者们就再次相信了政府的鬼话，第二天再到血汗工厂进行劳动，好一出双簧戏！政府借此事向公众宣告“政府的努力”在背后却又支持着资本家剥削着工人，多么讽刺，所谓改善工人的待遇，就像习近平说中国已经实现了小康社会一样可笑。是的，政府在用无数的谎言来欺瞒群众，让他们接受着，工作着，屈服着，可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银幕后却享用着从无数人民中窃取出来的财产，欢呼着伟大领导，与资本家一起碰杯。这是可耻的，可笑的，事实上，中国的很多大型企业（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背后有着相当多的政府支持，这就是所谓的官商勾结，他们可以靠政府和自身的力量不断扩大生产乃至垄断市场，中国政府一直说自己支持着以小资产阶级企业家为主的民营企业个体户的发展，而事实上任何人只需要走到一个小县城看到街上四处关门的小店就能知道，民营个体经济在中国也活得

极度困难，他们被大型企业挤压着失去市场，最后赔光了本钱成为了一个无产者，这正是中国政府与大资本家勾肩搭背称兄道弟最有力的证明。

3. 扯下虚伪的荧幕，三大诉求，定要一应俱全！

我们不能也压根不会相信政府的鬼话，他们在过去的十几年已经说了太多了，纵使他们用社会主义的旗号向百姓们介绍着他们的宏伟蓝图，可这么多年来，工人的待遇却没有一点改善，在前几年的疫情中，工人们被迫失业，找不到工作，没有工资，在现在的难就业情况下，工人们要么接受资本家的无理条件，成为血汗工厂的一个零件，要么就失业在家，中国政府却绝对不会为这些人们出一分钱，一分力来帮助他们，我们受够了虚伪的所谓“宏伟蓝图”了，要改善工人的生活，只有这三点诉求才能达到：

1. 所有的劳动资料一定要归于工人，工人要为自己劳动，而非为资本家们劳动
2. 削减劳动工时，让资本主义的加班不复存在，我们不会忍受让工人们以各种方式长时间很显然，这三点诉求是中国政府做不到的，因为就算是“强制下班”的“施舍”也只不过是政府缓和矛盾的手段罢了，他们连让应届大学生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都做不到，我们还希望从政客和资本家手里要到什么东西？他们连一个枣子都不会给我们！
3. 提高工人待遇，让工人当家作主，改善工人的生活，让内卷的现象不复存在

在当下体制下，所有人都能深刻地感受到：好日子根本不是我们能够自主决定的，而是命运早已被整个利润体系牢牢掌控。我们在厂房里日夜辛劳、在办公室里默默加班，所有这些努力都可能只是在为资本家的更大利润贡献一份力量。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那样，资本家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决定了劳动者的工作内容与生活质量，而我们却始终被束缚在一套不公正的分配体系之中。

这种现实让人愤懑不已。我们看到，那个富裕阶层不仅拥有超乎寻常的财富，更借此操控着国家的政治方向、文化走向和媒体舆论，把持着话语权，使得阶级不平等看似合理、甚至被默许。面对这样的现实，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劳动者都不会甘于现状。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只有工人们自己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做到！只有推翻这个“官商勾结”的政府我们才能实现三大诉求！工人们总有一天会接管工厂，接管国家，接管整个世界，彻底撕开资本主义双簧戏的荧幕！我们不会再为所谓“伟大复兴”而卖命了。

IV

美国发生“群聊门”事件 - 阶级国家官僚的厚颜无耻

《大西洋》月刊总编辑杰弗里·戈德堡于 24 日在自己月刊的网站上发文说，他 11 日在国外通讯应用 Signal 中收到名为华尔兹的用户的邀请，加入到名为“胡塞 PC 小组”的群聊，目睹包括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国务卿鲁比奥等多位美国高级官员讨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计划，并且通过在 15 日目睹赫格塞思提前两小时公布打击计划的“预言”确信这是个真实的群聊。消息传到中国后，中国网友们戏称美国领导部门是“草台班子”。美国高级官员的神秘面纱被撕开一角，在群聊中与常人并无不同的表现造成的反差感“赢”得了世界网友的笑声。

阶级国家政府总是给自己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关起门来讨论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国家事务，使之远离于社会的监督。当面纱偶尔被撕开一角，官员的愚蠢行为暴露在公众视野，人民却只能付出笑声而不能予以追责乃至罢免时，再漂亮的民主神话也显得软绵无力。显然，人们并没有什么理由去支持保留这样的政府，只有需要愚蠢又肮脏的刽子手的资产阶级不吝嗇于为他们提供数百万的美金。

事发之后，这些高级官员们的本能反应是编织谎言。在 25 日美国国会参议员情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面对多名民主党参议员的质问，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含糊其辞地回复“据我所知没有涉及打击的机密”“不记得提及具体武器系统和打击时间”。26 日，面对这些高级官员矢口否认并且倒打一耙的指责，戈德堡公开了群聊的聊天记录，从中清晰可见赫格塞思提出的“12:15 F-18 战机出动”“14:15 攻击无人机击中目标”的任务方案。一日之内，这些高级官员的谎言就被揭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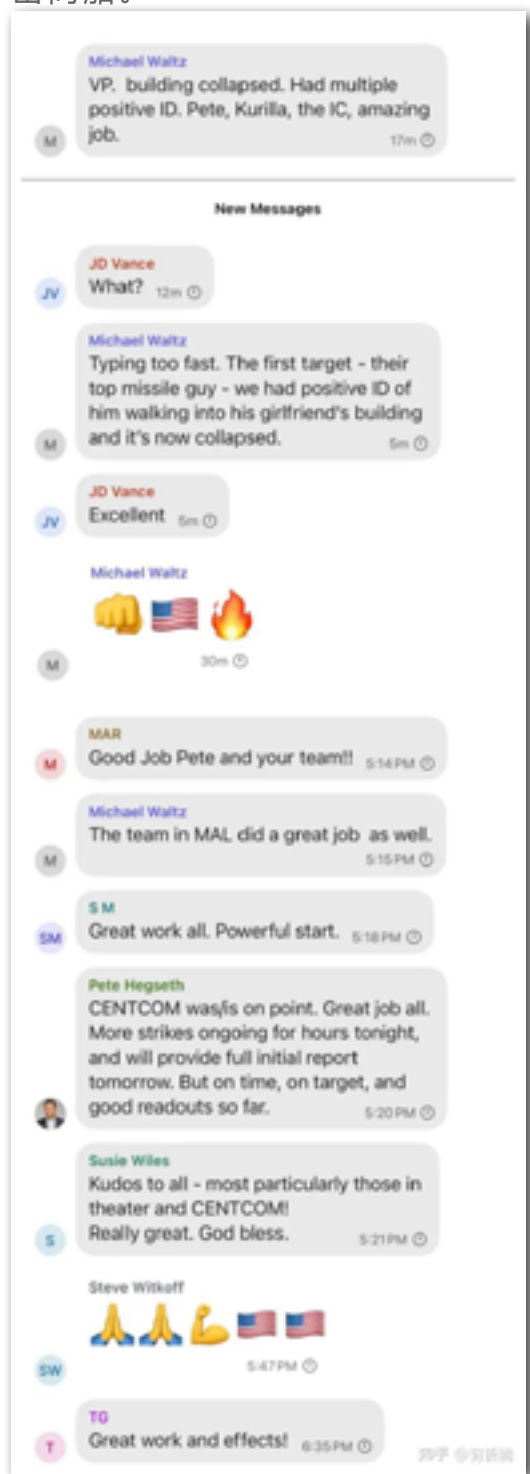
高级官员们幼稚的野心

通过聊天记录，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群凶手不远千里去杀害别人的目的是什么。首先副总统万斯表达了他的疑虑。胡塞武装的影响主要是攻击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西方商船，给商业家们造成不小的损失。策划打击胡塞就是为了保障航道安全。万斯认为“与欧洲贸易的百分之四十

要通过苏伊士运河相比，美国贸易仅有百分之三””美国民众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应该打击胡塞武装”，他建议推迟一个月，以待油价上涨造成形势变化。

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华尔兹对万斯进行了劝说。赫格塞思认为推迟打击会错过时机，可能以色列先采取行动，显得美国过于软弱。关于劝说民众，他提议将宣传重点放在和拜登政府进行对比、强调伊朗资助胡塞。通过造成新一届政府与拜登政府的比较，收获民意的支持。华尔兹则谈到欧洲海军无力抵御胡塞武装的袭击，只有美国能够出手保障安全，如此能够事后向欧洲收取费用，并督促欧洲增加国防开支。万斯决定服从集体的意志。

美国老爷们对打击充满信心，好像真的可以通过一次袭击就能让商业家们的金船通航无虞了。在打击过后，华尔兹为庆祝还发了”👊🇺🇸🔥”表情，意为”愤怒的美国重拳出击”，这种干脆的情绪表达让人不禁莞尔一笑。可惜结果不尽人意，打击过后胡塞武装表示仍将继续攻击商船。



阶级国家的统治机关，剥去民主大选的外衣，便是赤裸的独裁。仅仅是通过几位高级官员的协商一致，就可以督促军事系统耗资去袭击他人，而只为了服务商业家的利益——商船上装得多的是企业的货物，而工人的利益早就被几两货币结算完了。工人阶级完全没必要为老板的货物怜惜，正相反，应该厉声对老板说：“把你的利润拿来！我们不会为你的远洋利润哭泣！如果我们反对胡塞武装将货物击沉，那也只是因为你们应该立即把他们交到我们手里！”

特朗普的团队急于践行他们的主义。这次事件只是其中一个焦点。无论是这一次他们盘算敲诈欧洲，还是过去一段时间里粗暴对待盟友加拿大，与中国进行更高强度的关税战争，都不外乎想要世界向美国让利。敲诈盟友减少的支出，最终服务于企业减税和补贴计划。鲁莽的关税提高，除了配合其他政策保护资产者的产业，对美国人民并没有什么利好。在行业调整期，可能的新岗位与工资收入都可以由物价上涨和为了补贴而挪用社会开支来代偿。统治阶层将不遗余力地这样做，而人民没有权力去阻止，就像这次事件中他们只能发笑而不能追责一样。

阶级国家的问题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用小标题直接阐明”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阶级剥削的工具”。资本主义体制下少数资产者剥削广大的劳动者，为了保护自己的资产和地位不会受到广大的被剥削者武装侵害，他首先要彻底剥夺被剥削者的武装。国家就是那个垄断武装的角色，它收缴了社会成员的武装，只允许军队、警察等武装形式存在，这就意味着国家成为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存在。同时，经济上占优势地位的阶级也会使自己在政治上占优势地位。无论国家机关官员有

多少自己的野心算盘，他首先不得不维护这个社会占优势的主要生产方式，因而也不得不使在这个生产方式中占优势地位的阶级的意志取得优势。为了实现国家能够服务少数人的利益，与最广大的人群对立，便需要赋予国家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权威，赋予国家权力行使者——官僚不可冒犯的神威，剥夺最广大人群与官僚系统相对立的权利。这首先表现在人民对官僚系统没有任何任免权。美国人民无权去追究特朗普团队在这次事件中的责任，而只能由闭门开会的国会去追究，可这早就被党争的利益取代其原本的性质了。在听证会上，共和党参议员不提及这次事件。民主党参议员愤怒的问责，不外乎是抓到政敌的话柄借题发挥罢了。

中国的宣传系统也无数次“揭穿”美国假民主，将其解释为“资产阶级国家必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怎么就解释这么少的呢？怎么只是将无民主权利的问题解释为统治阶层主观没有维护人民利益的意愿呢？因为一旦过多地解释，就会走向否定其自身的反面。

作为与美国形式民主的对比，中国标榜自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意志在国家的各方面、全过程都得以体现，而保障它实现的就是有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党来领导。然而但凡多看两眼宣传资料，却最多只能看到党委，政府大员们收集“人民”意见，以及他们夸耀自己既成的社会开支相关的工作。真了不起！一个国家竟然留一部分支出用于社会开支，总是出台调整一些程序、形式的东西的改革。看来这就已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最高成果了。宣传内容只有这种青天老爷垂怜般的形式，正是因为中国同样有着阶级国家的问题、同样是官僚系统有“不可侵犯的权威”、同样是统治阶层闭起门来就决定社会的事务，宣传工作者不能对此扯更多的谎了，不然就假得太难看了。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能通过旧有的国家机器来统治。无产阶级国家必须实行真正的民主即多数人的民主，那里不应该存在“权威不可侵犯”的官僚们，不应该存在暴力的垄断。我们坚决反对中美两国的国家体制，无产阶级革命将缔造全新的制度。

不停歇的遮羞布纺织厂

令人遗憾的是，比起认真解决社会所关心的议题，阶级国家的系统更善于雇佣笔杆子撰文颂扬自己的成就，把不好的东西说成无关紧要、条件困难导致的东西，把一般的东西说成意义非凡的东西，而真正不多得的好成就，则要让印刷厂反复印刷三十年也不停歇——因为没有别的能夸耀的了。特朗普团队事发后的本能反应就是这种劣性的体现。特朗普本人回应这次事件，首先就是撇清自己的责任，“我不知晓这次事件”，然后又反过来咬《大西洋》月刊是个“要倒闭的刊物”，还语言攻击了戈德堡本人。就像流氓忍不住吐出污言秽语一样，狐狸一样的政治家特朗普也是本能地甩锅，还愚蠢地语言攻击别人。听证会上，本应智明的国家高级官员倒是对群聊事件忘这忘那，一问三不知，恐怕“唯手熟耳”吧！

中国在创造歌功颂德的宣传材料这方面更是不遗余力。国家级文件，总是冗长而又不细，看似面面俱到，却都只有标准名词和传统理论语词，具体到下面的执行，只能依靠水平参差不齐的下级的智慧。往小看，地方党委创立的刊物，每日都要撰文评论中央出台政策。这些文章，不外乎就是中央出台什么就赞同什么，无论是什么，都要修饰一番好处。完全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见，在报刊上从不会找到这个党委提出了什么新颖的想法。好大喜功的地方官员们，却从来没有夸耀自己先前有什么提的意见转化为了政策，因为不会有这样一回事，他们不能想、无权想也不会去想。各种政府作为、人物作为的报道，则是粉墨无数。除此之外，那些拿着国家预算的专家，在政治经济议题上，也只能做官僚的喉舌。

一个社会形态越走近末期，他的社会文化也愈加平庸，因为一切大胆的先进想法都在否定这个社会形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碰到了瓶颈，正面碰上了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一切新颖的方案，如工人民主监督、剥夺敛财无数的资产者、实行计划经济、开放文化自由，都在走向体制的否定面。体制不愿投降，就只能禁止新想法，同时招募笔杆子编织谎言。中国的统治阶层，只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拈来覆去地反复看，不能有多大的创新。文人墨客，不能产出时代先锋级别的文化。文化的腐朽正反映着制度的腐朽！

再温和的人，纵使他可以包容上层的无能，也应对将一项不小的预算用于招募笔杆子写些没有营养的迂腐文章感到疑惑。我们完完全全没有必要豢养这样的一群人。

土耳其抗议的启示

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独立的政治领导

土耳其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领袖、地方首长伊玛姆奥卢于2025年3月19日因“涉嫌腐败、勾结库尔德人独立力量”等罪名被捕。这随后引发了土耳其全国多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抗议者指责埃尔多安以此对政敌进行政治打压。

在受新冠冲击后，土耳其里拉持续贬值，至今年三月里拉兑美元汇率从1:5跌至1:42，成为全球表现最差货币之一；通货膨胀率从2020年的11.9%飙升至2023年的80%，至2025年核心通胀率仍维持55%；失业率从2020年的8%升至2025年的15%，青年失业率更高达25%。外债规模高达4500亿美元，占GDP的62%，其中40%为短期债务。

埃尔多安的经济政策以中央政府对货币价值的直接干涉、大规模扩大投资和举债等民粹主义化措施为特点，他坚持在通胀高峰时降息：如2021-2023年通胀率超80%的背景下，央行仍然将基准利率从19%降至8.5%，导致里拉大规模贬值。埃尔多安本人坚持认为低利率能降低企业借贷成本、刺激投资和就业，同时增加出口收入。然而事实不尽人意，这种政策仅仅是极速加剧货币贬值，导致了央行净外汇储备跌至负值、丧失汇率干预能力。所有这些试图以民粹主义干涉手段“挽救经济”的幻梦都以工人阶级肩上苦难的加重为代价：无产阶级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无产”，在金融统治下好不容易积攒的积蓄，什么都不干放在那里都在贬值。奋斗不会有出路，因为即使找到工作，越工作手头实际拥有的财富的价值反而会越少。

自打着“为了人民”的资本主义民粹政府在经济危机前是如此无力。为了博得支持稳固统治，埃尔多安无比喜爱大规模举债，他于2025年计划上调百分之三十最低工资，推动大型基建和能源开发，代价却是财政赤字的扩大与国际信用的崩塌。旅游业和建筑业占土耳其GDP的百分之三十，其技术密集型产业基础薄弱，使得土耳其无法为债券国提供优质的工业品，未来埃尔多安推动高附加值产品的努力必会以失败告终。我们能清晰看出，在无理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经济发展与稳定和民生福祉资产阶级是无法两者皆满足的。

民粹主义的政治同样是悬在空中的楼阁。民粹主义政治家如同一个各阶级间的小丑，向社会

各团体献媚做出保证平衡他们之间的矛盾，喜好大张旗鼓搞些滑稽的操作博取舆论的支持。他为了地缘政治的利益、扶持一个受自己控制的叙利亚，支持反对派向大马士革的进军，然而反对派占领大部分叙利亚领土后却迅速形成名义上完全统一的新联合政府，反而让土耳其当局自己丧尽了对叙利亚局势的控制；他是一个穆斯林，喜欢高谈阔论“新奥斯曼主义”，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实施种族灭绝时，力图构建一个以土耳其为核心的抗议联盟，然而帝国主义的幻想却顶不住现实压力，埃尔多安当局仍需维持同以色列大规模的进出口关系、保障国内经济稳定，最终导致所谓的反以色列阵营也仅仅是喊喊几句口号，所谓的“新奥斯曼势力圈”更是无人在意。



土耳其因共和人民党与正义发展党（及其前身土耳其民主党）这一对老对手的矛盾而产生的内乱并不是第一次——2016 和 2021 年土耳其均爆发了失败的政变，这是由土耳其政治传统中由出身中间阶层军队和军官团为了保障世俗化与现代化，捍卫他们的“现代市民生活”而发动的——在整个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中出现过数次类似的军事政变。在整个西亚与地中海沿岸的诸多统治阶级曾严重或仍旧依赖伊斯兰教赋权的国家中，逐渐现代化、欧化的军官团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慢慢聚集了大量城市工人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中间阶层和受过欧洲军事和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集团，成为最坚定促进经济现代化发展、寻求铲除极端宗教元素的群体，并以军队、城市居民和先进工业地区的支持为基础产生了一大批小资产阶级政党，如支持社会民主主义改良派的土耳其共和人民党，同 1925 年的中国国民党左派如出一辙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和埃及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等等。然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乌托邦主义性质却屡屡让他们在需要历史进步的时期寻求与传统派与民族主义势力妥协，最终或是彻底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傀儡，或是丧失政治地位被保守派击垮、崩溃。在土耳其，共和人民党虽然一直反对极端反动、宗教保守的“正义与发展党”及其前身土耳其民主党，但其本质上仍然是捍卫土耳其资本主义制度、支持土耳其帝国主义的政党，其在库尔德斯坦与塞浦路斯问题上坚定支持土耳其的领土扩张，拒绝同库尔德和其他民族的民主力量合作并不断寻求镇压少数民族自治诉求——作为回应，许多寻求自决的少数民族加入了各类寻求革命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组织，共和人民党和各个土耳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主流政党更是难以收获任何来自少数民族的支持。在库尔德斯坦，具有鲜明亲社会主义态度、同共产主义政党合作的“人民平等与民主党”收获了大量支持，2001 年后新组建的土耳其共产党更是夺取了库尔德斯坦地区重要城市通杰利的执政权。尽管埃尔多安当局在 2025 年初同奥贾兰与其所领导的库尔德工人党革命力量达成合作，开始库尔德武装解散与和平谈判进程，给予土执政当局一定的喘息，但随着大量库尔德工人、学生在罗贾瓦的支持下迫使土耳

其政府因停火协定给予他们应有的言论自由权和民主投票权，土耳其的政治未来只会更加不稳定、更加接近崩溃边缘。

虽然随着土耳其以共和人民党 - 正义与发展党二元对立的政党联盟制度的尖锐对立愈发令其国家建制面临崩溃，但本次事件还远没有达到革命所需的临界点。学生和城市居民因共和民主党领袖被逮捕而发起运动，而机会主义的共和民主党尝试利用本次运动掌控学生的团体，使用埃尔多安当局惯用的民粹主义手段组织其产生更加激进的政治主张并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随着群众运动的目标升级为要求经济平等并抵制与政府相关的企业，在先前十年间持续阶级斗争后工人阶级由于缺乏革命性领导和组织陷入了迷惑与低落的情况似乎正在好转——但是这样的转变并非触及工人阶级生活与阶级意识的根本改变，其现象具有高度迷惑性——土耳其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造成了极端严重的通货膨胀、打击了全体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并鼓舞他们动员起来，但是由于土耳其国内反对派一贯的机会主义和妥协态度以及依赖军队政变反对极端保守势力的政治传统，土耳其产业工人和进步学生的运动并不能得到全国大多数人的支持——乡村和曾经的欠发达省份因为埃尔多安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政策与民粹主义经济措施获取物质利益，活跃于土耳其并没有经历过全面土地改革与去宗教化的乡村地区的伊斯兰教势力借机再次兴起，并巩固埃尔多安当局在这些地区的支持。随着此前无数军事政变和群众运动或是在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或是由于缺乏组织与团结被粉碎，土耳其工人的革命能量早已降到最低，而此次运动到目前为止仍然主要由学生、城市居民等具有鲜明小资产阶级政治面貌的群体参与，远远没有达到“全民”的水平，他们在政治上除了对埃尔多安逮捕政敌、破坏他们“现代民主生活”的行为心存愤慨外没有任何共识或方向；而库尔德人等少数族裔更是由于共和民主党和其他所谓的“左翼势力”此前数十年如一日的镇压和背叛而并未主动加入土族为主的全国性运动，而是希望以埃尔多安此前同库尔德斯坦的协议换取自身的民主地位与政治空间，“求得未来独立自主的机会”——一个立足于工人阶级的全国性革命党的缺失，使得各个本能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党的领导下投入革命运动的群体与阶级互相对立、冷眼相待，只能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随波逐流而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丢掉了革命团结与统一的可能性。

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独立的政治领导，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部分需要被组织起来，在无产阶级革命党的领导下促进受到压迫的各群体、各阶级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击垮资产阶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变革。土耳其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向我们提醒：无论我们主观意愿如何，经济发展的客观影响必然因为十分不起眼的次要因素突然引发大规模运动，而到那时我们需要有所准备。土耳其 2016 年，2021 年与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与中国自 1989 年天安门事件因自由派劫持而失败，直至 2014 年独立工人运动与各类工会被大规模镇压之间爆发的各种群众运动所展现出来的趋势是一模一样的——当时的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展现出唯心的机会主义态度，认为可以仅仅通过抗议与罢课施压就让中共妥协、换取更多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却在团结工人群众的时候展现出了极端的保守与自傲，不愿同首都与各大工业城市的罢工工人合流，而是局限于“学生社团”的范畴。1989 年的中国群众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革命党、统一的政治纲领与目标和全国团结的组织，因此这场属于中国的“二月革命”失败了，以“1905 革命”的样貌草草收场、令人惋惜。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运动失去了其最后一寸土地，强大的中国国家行政机器内高度自觉的反动官僚粉碎了一切可能让他们丧志执政地位的政治尝试。这一切都向我们证明：如果工人不能拥有自己的组织，不能以革命党的思想和领导武装起来，那么群众因经济危机和偶发事件所展现出来的强大动力将彻底丧失于机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妥协派与无法转换为自觉革命的自发倾向之间。

因此，我们呼吁，必须要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革命党！工人们，学生们，一切受剥削和压迫的人民，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

VI

关税、贸易战： 右翼民粹主义的无足之鸟

那一夜，特朗普思索良久。他想到了千千万万建设过美国工业的资本家：难道他们努力剥削工人，就换来这样一个去工业化的美国吗？他想到了广大的 MAGA，他们怎么办？他很不甘心。他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件事，哪怕是他摔的粉碎，即使失败了，他也不惧怕。因为他知道：“天佑美国”。

4月2日，特朗普从椭圆办公室中出来了。在召集新闻发布会时，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壮词：
“以前我带你们加关税，现在我又要带你们加关税了。”

2025年4月2日，川普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基础关税，并对许多国家收更高的关税。中国首当其冲，总税率高达54%。中国两天后还击，双方经过多轮互相加码，目前税率达到了145%（美对中）和125%（中对美）。部分商品的税率更高。欧盟和加拿大也有一些反制措施（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战三月份就已经在打了）。绝大多数国家则选择了示弱和不作为，同时不挑边站，也就是说对美对华两边都示弱，力求将经济损失降到最低。例如越南很快做出反应，要求和美国相互0关税，同时高规格接待了习近平并签了45项协议（内容未公开）。

关税宣布后，美股暴跌。金融资产阶级向来讨厌不确定性，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使他们的股市剧烈波动。关税宣布后的两天，道琼斯指数跌了4000多点，标普500指数跌了10%，纳斯达克指数跌了11%。6.6万亿美元蒸发，是有史以来损失最大的两天。股市反映了美国资产阶级寡头对川普政策的不认同，进而导致了川普选择将大多10%基础以外的额外关税冻结90天。

上任以来，川普放了很多狠话，但并没有取得什么实际的胜利。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在目前来看依然是天方夜谭；马斯克的政府效率委员会（DOGE）看似削减了很多离谱的支出（有水分），但并没有砍掉任何大头，而马斯克本人也心灰意冷，准备走人；24小时调停俄乌战争更是川普的一厢情愿；还有别忘了 Signal 群聊泄密丑闻。取得进展的方面，一是“文化战争”，具体来说为肢解“DEI”（多样性、平等性、包容性，即俗称的“白左”）议程；二是驱逐非法移民并加强治安。当然，这两方面也只是取得进展，而非取得胜利。在这在内

外都面临瓶颈的情况下，川普选择发动关税战。

这里值得提一下关税的计算公式。通俗来讲，左边希腊字母是关税，右边 x_i 是向某国总进口， m_i 是总进口，分母的两个希腊字母乘积是 -1 ，这两个项是人为赋值的。也就是说，逆差占进口多少，税率就是多少。笔者没有系统学习过经济学，但这个公式显然简单过头了，读者应该能体会到其中的荒诞。主流经济学界对这个公式也是清一色的负面评价。

$$\Delta\tau_i = \frac{x_i - m_i}{\varepsilon \times \phi \times m_i}$$

中美之间事实上已经开始了第二次贸易战。在讨论“贸易战”的细节之前，有必要探讨一下这场风波的成因。毕竟，在我们的视角看到的是美国和 2018 年一样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但实际上全世界都挨了关税。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川普竞选时就提出的政治议程，即制造业回流，美国再工业化。从他确定关税税率的方式（即上述公式）来看，确实有强烈的消除贸易逆差的意图。可以说川普的确想要落实这个纲领。逆差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次列几个数据给读者感受一下：从 2010 到 2024，美国外贸总赤字是 12.92 万亿，而 24 年底美国国债是 36 万亿；2010 年逆差是 6350 亿，24 年已经是 1.2 万亿。其次，川普想要通过关税创收。美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通过关税增加收入平衡赤字相比于关税保护重振制造业的 MAGA 理想，是川普更为现实的一层考虑。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种简单粗暴关税计算方式没有给盟友留下任何情面。这是川普的“美国优先”理念，即放弃政治利益以回收经济利益的又一反映。

随着对其他国家关税的 90 天暂缓，对全世界的关税大棒暂时演化成了新一轮的中美贸易战。（严格来说，在此之前美国与加拿大就已经开始贸易战了，但这超出了本文的范畴）



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几何呢？中国是美国最大逆差国。在 2024 年，美国对华逆差为

2954 亿美元，其中高端制品，例如无线电类设备（电视、广播等）贡献了 500 亿（是占比最大的门类），计算机类有 350 到 400 亿；当然，低端制品也依然占了不少比重，例如玩具占了 200 多亿，纺织品 150 亿、塑料类 150 亿。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越南逆差排第三，而且逆差贡献最大的门类同样是无线电设备，有 150 亿；计算机类也有近 150 亿。这过于蹊跷了，因此可以合理推测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商品是通过越南转口贸易到美国的。同样在 2024 年，美国生产的 51.7% 的大豆、29.7% 的棉花、17.2% 的集成电路、10.7% 的煤、10.1% 的天然气、9.4% 的医疗器械、8.3% 的汽车销往中国。两组数据放在一起，颠覆了我们传统上“发达国家出口高端制成品，发展中国家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认知。

从以上数据来看，中国对美的出口包含相当多难以替代的高端产品，而美国对华的出口则包含大量易被替代的产品。这便给了中共底气，在国务院在 4/11 日的一份声明中以一种近乎傲慢的语气宣布“鉴于在目前关税水平下（125%），美国输华商品已无市场接受可能性，如果美方后续对中国输美商品继续加征关税，中方将不予理会。”这句话固然有一定尝试降温的成分，但至少大豆棉花、天然气和煤确实顶不住 125% 的关税。

对于美国这一逆差国来说，关税首先意味着物价将显著上升。每一件难以替代的进口商品都会转换成通胀率实打实地砸向美国工人群众的钱包。通胀过高必然会激怒美国群众，包括川普的支持者，毕竟物价不会对 MAGA 意识形态豁免。从根本上来讲，美国大选还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这是 2024 年选举民主党学到的惨痛教训（他们的宣传始终在强调“现在的经济很好”）。中国商品也会尝试通过其他渠道进入美国，包括上文提到的转口贸易，以及更暴利的走私。漫长的美加和美墨边境在不久的将来或将成为走私犯的天堂。讽刺的是，禁酒令作为美国人自己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些非法贸易是黑帮犯罪的温床且根本无法完全禁止。川普承诺的边境安全和社会治安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如上文所述，大量低端产品会丧失出口市场，部分产业会受到严重打击。而且农业和能源行业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本身也是特朗普的基本盘。我们或许可以想像美国资本绝望地尝试向群众推销“美式爱国豆腐”来消耗那 51.7% 原本出口中国的大豆。

对于中国，尽管它的对美出口有相当多是难以（至少在短期内）替代的，但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经济依然高度依赖出口。2024 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30.3%，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占中国总出口额的 14.6%，当然不包括各种转口贸易。对于制造业工人来说贸易战无疑意味着失业。在裁员倒闭的浪潮中，可以预见更加频繁的“群众性事件”，失业工人有可能会被推向激进化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传统的失业蓄水池快被填满了，很难想象倘若量变引发质变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但是，由于贸易战是由一个咄咄逼人的川普发起，中共在政治上的威信不会受到直接的削弱，反而可能被危机加强。可以预见中国阶级斗争在经济与政治层面将变得更加激烈和复杂。

目前的情况依然是十分不稳定的。国内外压力有可能逼迫川普的冒险草草了事。早在 11 号美国便已宣布手机电脑豁免于新一轮关税之外。这显然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压力以及中国的供应难以替代。美国大量巨头都在中国有投资建厂，川普的盟友马斯克就在上海有一个特斯拉超级工厂。目前川普正在通过各种豁免来避免损伤与他亲近的资本的利益。经过各种豁免，关税会缩水很多。总之，推进关税意味着面临着资产阶级和群众的双重压力；但此时退缩又会进一步损害川普集团的政治声誉，川普就必须寻找新的方向去实现他的“伟大复兴”。右翼民粹主义的无足之鸟已经起飞，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也不情愿地买上了通往崩溃的单程票。

VII

中国的经济转型——资本主义的两头堵

最近，只要聊到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对国家反击的支持和对各类美国红脖子、共和党支持者的嘲讽这类话题，做自媒体的流量就不会少。抛开那些粉红自嗨的幼稚性讨论，我们能看到有大部分冷静的人在思考这次贸易战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会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人们的共识是，这肯定会短期打击中国经济，无论轻重；而谈到中国在实施对等关税后该如何稳住自己的经济，几个关键词就出来了：扩大内需、落实劳动法、提高劳动者待遇——经济转型。

“经济转型”四个字并不是什么新词。在十九大上中央就宣布了中国进入了所谓“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理解这个转型，则必须先知道所谓高速增长阶段的三十年中国神话的背景和基础是什么。

随着新中国基础建设逐渐完善，经济结构日益复杂化，缺乏工人民主和劳动者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出现了僵化、停滞不前的危机。这直接导致了工人阶级整体与蚕食工人国家的官僚层之间的激烈冲突。把持权力、不愿意失去特权的中共官僚层意识到，与其继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被工人阶级清洗，不如引入资本主义、创造能制衡工人阶级的社会阶级与阶层并暂时用快速的经济增长掩盖住不平等与社会矛盾；苏联经济的衰退直至解体则是压倒他们下定决心转变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们于是说了，“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于是改革开放让外资进来。中国自此逐渐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经济上的“新殖民地”，在世界地位上以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商品著称。极低的报酬和极差的工作环境、极其不平等的利率、监管的缺失和几乎无限可开发的市场让中国成为了全世界资产阶级投资的处女地。这直接为中国带来了生产力的巨额增长和工人阶级力量史无前例的扩张，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

但这样也就埋下了中国统治者利益与国内外资产者和国内无产者利益的矛盾。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取得了一定经济基础后，内部罢工和群众运动的危险也烧到了眉毛。此起彼伏，国外资本主义渐渐对中共不满，尽管能用金融手段操控全球经济、以低廉的价格从中国获取商品大幅度改善国内工人阶级处境以稀释阶级矛盾，但他们手上的“硬家伙”越来越少，去

工业化在欧洲和美洲由于亚洲强大竞争者的存在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世界第二强国后，世界帝国主义再也不能允许中国国力进一步扩张。

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关税就是更为极端的形式）因此成为了主流，中国商品不仅在国外销售遇到了越来越多阻碍，关键的技术和资源也开始被“贸易伙伴”们卡住脖子动弹不得。这样的矛盾交织，迫使中国的经济结构不能驻足于“世界工厂”，中国不能、也不可能驻足于低端生产行业。所以，“高质量发展”被提出来了，因为他们要想坚固自己的统治，必须敏锐嗅探社会的种种矛盾而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扶持什么，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中国共产党自己先前扶持起来的这批资产阶级儿子大部分反而开始不乐意了。那部分依靠低端加工生产出口的外贸企业，利益直接因为中共的经济转型政策和外交政策收到了严重打击。除非火上眉梢，不然资产阶级的个体永远在利益前面都先想自己而不是阶级整体，他们不考虑整体国力的发展，他们只考虑是否能方便找到客户卖出自己用中国工人阶级血汗制成的廉价工业品。这批短目的资产阶级的结局也很明了，很快一个个就在铁拳下不吱声了。



新能源、人工智能、高端芯片、航天等一系列非廉价劳动力无法完成的产品在中国被生产，不仅是超市货架上的商品还有机器。中国开始扩大了自己在海外的投资，搜刮起了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所谓的“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路不过是向帝国主义发展的路，是从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殖民地变成一个强大帝国主义经济体的发展。

这不值得我们庆祝。帝国主义国家越来越多，或是世界更加多极化，对于无产者来说被剥削的事实是一样的。帝国主义争霸受苦的不是政客与“机智”的资本家，而是被抽走剩余价值的无产者，他们是生产的主体。就像今天的关税战，不仅是美国工人阶级需要为关税买单，中国工人阶级同理。

而这就引入了我们现在讨论的“经济转型”。最近对于这个转型的讨论不仅是有益的，可以说是相当进步的；因为它不再是从中央的文件、教科书的文字的视角去要求一个“帝国主义争霸”的转型，而是工人阶级自己开始提出，中国经济要从吸中国工人的血转型为一个工人福利制度。

所谓的高质量发展事实上已经实现了，无论是从高端制造业还是从科技上说。但是中共当时只承诺了这一部分，对另一个转型闭口不谈：什么时候我们的工人才能停止作为奴隶一般劳作？什么时候中国劳动者才能有实在的法律保障和基本的尊严？为什么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经济殖民地，成为了一个帝国主义大国，而工人阶级的相对生活水平仍然是如此赤贫？

“现在和老美贸易做不成了，东西要卖出去，那我们就要增加内需。如何增加？说白了就是要让大家手里有钱，有信心消费。现在消费低迷根本不是你多放广告就能弄好的，大家不是不想消费，是没能力消费。多少人连消费的时间都没有。”

“那内需怎么增加呢？”

“提高工人工资，减少工作时长和压力，不就好了吗？”

这就是工人阶级本能式对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经济体制不信任的表现。这个经济转型，则是资产阶级百分之一百不愿意的，中共也犹豫不决的。没错，这长期看可以救活中国经济；但我不想冒这个险，还是多造点阳澄湖换个法子给国外老爷卖东西吧。内需就让它“无为而治”吧，他们说。他们是不可能涨工资的，顶多给你发点零头的消费券。

为什么？他们真的蠢吗？事实上，之所以对扩大内需天天喊但是一直没有作为，对于资产阶级和中共这个统治机器都是有原因的。对资产阶级个体，涨内需自己一份力贡献几乎微不足道，因为我给我的工人涨工资不见得他们多买我东西的钱能补回来，而且其他人涨工资他们的员工还会来买我的东西，那为什么我不静坐等着别人先亏我全赚？资产阶级内部的竞争性质导致了他们无法在这个问题上及时达成统一意见而永远都是更倾向维持现状，维持高强度剥削工人阶级、低迷内需的现状。中国共产党难道镇压资产阶级落实这个转型不正好可以获得民意支持维持统治吗？的确，他们去落实增长内需会让工人阶级短期内更加感激他们，支持他们。但长期来，历史上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在一个改革胜利后止步于此，每次胜利的改革，不论是工资上涨还是工作条件的改善，都会激起工人阶级更大的信心，给他们意愿去自发组织起来争取进一步利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不是静态的堑壕战，工人阶级如果拿下了桥头堡，则必会明白一个现实：我的生活可以更好，而我的敌人已经妥协。此时，他们只会让大部队跨河向资本主义制度发动总攻。

这就是中共做梦梦到会三天睡不着的噩梦。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前，他们自己的统治地位必然会提前倒塌。为了维持这个特权，他们就像明明引入工人民主可以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还偏偏要重建资本主义一样，做出了现在的决定。

他们会维持这个策略不变吗？不。工人阶级的客观压力在这里，它的内斗最终也会有一派胜出，而哪派胜出，也都无法阻挡住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起来的脚步。现实很清楚：即使这群人最后出于压力不得不做出改革，也不会是从我们的利益出发。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由我们来领导。统治阶级，劳动者将不会再求你什么，会大声地、愤怒地向你通知：

改善我们的工作环境，落实劳动法，提高工资水平。不然，我们就提前几年摘掉你们的皇冠，夺回你们窃取我们的财产！

VIII

中式教育体制下的口号文化：消费主义与政治冷感

进城风潮与高考制度

东城（注：化名）是华东的一座小城。虽说华东尚为富庶，但东城相对大城市却是实打实的穷。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与日益便利的交通引发了至今仍未停歇的进城风潮。“五色使人目盲”，人们渴望能较少受到金钱、人脉等资源的限制，获得一种消费主义式的自由，会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哪怕对它知之甚少。人们通常只关注大城市更多的高薪岗位，更丰富的物质享受，更优质的公共设施等，却常常忽略大多数无产者所面临的往往是更高的生活成本，更拥挤的公共设施，更短促的休息时间与更明显的贫富差距。即是说，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苦难与不自由（特别是它所提倡的消费主义式自由）乃是常态，深厚地根植于这种生产方式之上，不可避免；人们却依旧幻想自己能够爬上同伴疲惫的身躯，成为这场残酷竞争的受益者。

对那相对“丰富”一点的生活的追求从未被浇灭，人们依旧愿意相信相较于“乡村”（比如东城这座小城，几十年前它还是真正的农民们做梦都想削尖脑袋挤进来的地方，今天却又被嫌弃了），城市的苦难和不自由总归少一点。这种追求经由千百万次的重复和强调已经臻于狂热，因为向着消费主义式的自由哪怕多前进一步，都会被看做一辈子的乃至泽被后代的“伟大胜利”，因为在当前的体制下这样的一步就是如此困难，因为一个无产者的生活就是如此艰难。老一辈惜于境况只能呆在小城里，活在日复一日循规蹈矩的生活中，羡慕于早年能够抓住机会而成功“进城”的故人。但年轻一代有了更加易得的“进城”机会，这要得益于制度化的、“体面”的进城机制：高考制度。

高考制度可以说是被神化了。它的维护者常常声称它具有明显的公平性，是“寒门子弟”上升的“最轻松的”通道。然而，学生们首先感受到的反倒是不公平：当东城中学的学生在劳神费力背诵中国外交的措施时，北京的学生在开模拟联合国的会议；当东城中学的学生在为难以下咽的饭菜一筹莫展时，上海的学生在参与歌舞升平的联谊会；当东城中学的学生在几乎睁不开眼的困倦中上着晚自习时，那些大城市的学生可能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就已经放学了。而那些身居大城市常常在“玩”的学生们还有一个优势：他们所在的地区各类大学的录取率远远高于其它地区。如果有人能够将这样的教育现状也认作是公平的，那他就是脱离

实际的睁眼瞎。实际上，高考公平与否都没有关系，因为规训者强调公平的时候，便可以说高考是你们这辈子最公平的机会，只要提升一分就能干掉千人；强调不公平的时候，就会说它都不公平了，你要是再躺平摆烂，不就更没法“逆天改命”、更被人踩在脚下了吗？可见，要是因为认为高考公平就拒绝对它进行批判，那便是十分愚蠢的：因为高考并非依靠它的公平而运行的，不公平反而更能解释成千上万的人被驱动着参加它的原因。几乎所有人都对它的不公平心知肚明，只不过他们根据日常的经验认为其它领域的不公平更加剧烈罢了，但这远非为它辩护的理由。



除此之外高考还被宣称为国家选拔人才的工具。然而立志从事文史的学生何必证明自己的数学能力出类拔萃（事实上文科生数学好能占到十分强的优势），立志从事理工的学生又何必写得一手好作文呢？这不是说这些基础的教育不重要，但是这种“选拔人才”为何一定要采取和选拔内容相脱离的形式呢？对几百个专业、几千万人都采取同一个评价标准，难道便能选拔出适合不同领域的人才了吗？然而某些人比你更平等：他们拥有更高的录取率、更简单的试卷，有的还可以加分。高考的这个特征所能证明的并非它的“选拔性”而是它的“安抚性”，它试图提供一种绝对的形式平等、结果平等，然后又亲手破坏了这份形式平等，将更多机会赋予某一部分人，这正是为了掩饰对不平等的焦虑，掩盖不平等的实质。

不过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见，985 院校学生的平均薪资就是高于 211 院校，211 院校学生的平均薪资又肯定高于普通一本……以此类推。薪资，实质上就是劳动的价格；而那十几二十几年的教育经历，就是劳动力商品的增殖过程。一部分人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也即是说他们能够对教育本身进行更多的投资，这份投资中蕴含的价值便作为劳动的前置投入加入了劳动价值之中。而这份价值究竟是否是有效的价值，就需要经过高考的检验。虽然高考成绩的影响因素具有十分大的偶然性，但是说到底高考成绩是有效投入之间的比拼，而这份有效投入则会成为将来的收益。富有的家庭甚至可以花钱直接让学生海外留学“镀金”，也就是说，“有效投入”本身也可以用金钱代替。我们终于得出一个本

应十分明显的答案：高考是依据市场而运行的。或者说，高考本身的运行机制，与资本市场的运行方式有着十分的相似性，它是市场经济在教育体制内的投影。

而在全国性的市场下，高考制度使得原本局限于地域的社会系统再生产打破了地域藩篱。此处单论东城的中学阶段。初中的考试，比较范围放在一县即可，很少谈及整个市。高中的考试却不然，比较范围至少也是一个市，还常常和其它市的学校联考，毕竟同台竞争的是整个省的高考生。东城的县中，高考结束后，最优秀的一批学生不是去北上广就是去省城，多数学生也会去往距离家乡有一定距离的城市读大学。他们就业则可能会选择大学所在的城市，即使不在，工作的城市也遵循越大越好的原则。回东城工作，多少被视为一种进城失败的耻辱。人才的选拔和分配在全国进行，故那些人才的着眼点就是全国的大城市。小城市新一代的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失，他们的努力方向，或者说社会塑造他们的方式之一，就是要竭尽全力“进城”，给总是膨胀的城市提供必须总是增长的人力资源。但城市扩张的脚步一旦停滞，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成为了“多余的人”。至于他们的家乡，谁在乎呢？顶多在回乡探亲时，望着人口还不及原来一半的破败县城感叹道：“还好当初走了出去。”而被迫留在家乡的那些人，他们子女的教育所能指望的公共经费与教育资源随着县城的萎缩而进一步减少。在这个循环中，胜利不一定是持续的，但失败往往是持续的。结果，只有大城市与拥有更多资源的人成为了真正的受益者。

实事求是地讲，如此大规模的人才分配，本应当是合乎生产力发展需要的。但吊诡的是，事实在这里发生了倒错，即不是先培养、选拔人才再将其分配到合理的位置，而是先选拔出“人材原材料”，授予他们成为人才的资格，再到合适的位置培养其成为人才。对于某一领域的学问，非科班出身者即使能够自学得炉火纯青，想要受到市场认可，还是不如持有一张大学毕业证书。高考制度对人才的选拔与实际需求产生的差移与脱节使得它快要丢失最后一块遮羞布，几乎所有人都承认自己不是为了成为人才、建设社会，而是为了“工资”“话语权”“人脉”等等参加高考。但是从下文可以看到，这种目的又被许多人心有灵犀地秘而不宣。高考被宣称的作用，“选拔人才”，已经随着网课模式的诞生逐渐形同具文，并且往往只在有人替它辩护时才被想起。于是，就好像经常被批判的那样，高考制度的参与者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取得能够学习专业知识的许可上，并且他们将要学习的专业知识通常与他们在高考之前所学习的知识缺乏直接的关联，这无疑造成巨量时间和精力浪费。另外，被培养出的“人才”，虽然有了学习专业知识的资格，但是他们学习什么知识显而易见地受到市场调节，并且以达到消费主义式自由为根本要义，那么他们所学对于建设社会的实际需要就更可能脱钩，使得这套建立在知识垄断基础上的分配方式造成了大量道路选择的失误以及失业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又显示出这套体制即使作为社会资源的分配体制，也很难认为它不是失败的。高中告诉你“分数为王”，可到了大学才会发现，除开分数，还有专业前景、大学质量、导师素质等等许多因素继续影响他们，在这些表象背后，真正决定一切的乃是市场的黑洞。

高考体制施行的原因之一，通常被解释为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这种传统的困境显然在新的时代已经面临着更加可行的、有前景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更多地依托网络和自由讨论的教育形式。由于历史的惯性，传统的教学方式依旧在延续，但已然融入新的因素。为了更好“选拔人才”而实行的“强基工程”（事实上是更加偏向了“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需要对课本之外的知识点（难度大于高考）进行应试，以此进一步增加获取专业知识学习资格的障碍。2024年的高考，东城中学竟没有一个学生考入清北，这与往年的成绩是不符的，有一点原因就是**通过强基考入清北的学生比例增高，而这种相对进阶的课程则需要更多教育资源。**这并非个案，“强基工程”的运作使得优质大学的名额更多分配到了大城市的高中生头上，教育资源的影响力被进一步凸现出来。为了弥补几乎没有教师能讲授强基相关课程的劣势，东城中学选择使用网课的形式为主组织强基课程的教学。普通的学习内容却依旧在依赖教师

讲授，哪怕他们水平参差不齐，并且相互缺乏直接的协作。面向大部分学生的教学，又何以不能使用网络，并进行个性化的安排，而要将大量时间统一花在课堂？新的教育模式没有推广，甚至很少被意识到，这不仅仅是目光短浅的后果，更是积累在教育系统之内的深厚弊病。这种充满官僚的体制下的“教学创新”或“体制改革”前后总是大差不离，甚至连自身的要求都很难达到，只要高考制度还存续一天，那么这种教育就不可能距离自己的经典形态太远。底层的教师群体即使意识到问题，也会迫于学校的压力不会甚至不敢转变教学方式；学校因为政绩与家长的双重压力也很难推动改革；高层的教育局如果想要推动改革，则会受到“下有对策”式的暗地违抗。因为这种改良性的措施没有触及当下教育制度实行的根源，也就是制度化的进城需求与教育官僚间的政绩锦标赛。

可以见得，现在的教育制度，从教学的组织方法到高考，都已经成为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并且它正是因此从教育与选拔的初衷蜕化为完全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由上，中国的高考制度起到的作用是：给无产阶级留下阶级跃迁的幻想，提供政权合法性，滋生并巩固利己主义，加强知识垄断，进行社会控制，维护落后的教育制度，进而巩固官僚系统的统治。基于高考制度和应试教育体制的中国教育乱象已经被许多进步人士深刻地意识到，对它的批判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这预示了它必将迎来灭亡，而代以更加自由、民主、讲实效、以人为本的教育。但是它依旧在当下横行而没有土崩瓦解，其原因除了社会的强大惯性、国家机关的强力维持外，还有很多人都存有对“进城”的狂热追求，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丧失了主体性。



口号文化：我要进城

不过，需要明确的是，并非所有高中生都是中式教育体制的受害者。按照最粗略的划分，至少也可以划分为精英模式、县中模式与放养模式。精英模式自不必说，只有大城市里的“少爷”们才能接受。他们本就是“城”里人，享受着丰厚的教育资源与相对自由的作息时

则是从另一个方向给了学生自由，这些学生是典型差生，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未来是大专或者进厂，他们既然摆脱不了即将成为无产者的悲惨命运，那么只有在现在尚可以不用为生计奔波的时刻好好“放纵”一下，他们是最不想卷也没人敢逼他们卷的人。除了以上两种，剩下的可怜学生们，自然就是接受经典“县中模式”的学生了。他们幸而拥有比同龄人更好用一点的脑瓜，能够从小接受周边人的赞誉，但又不幸而生在了资源匮乏的县城。他们有望进城，但仅仅是“有望”而已，他们进城还需要艰辛的历程。如果说他们至少有收获的希望，那么县中“吊车尾”的角色们则既受到严苛制度的压迫，又难以收获真正的实惠，“一路向上爬”仅仅是极少数个例，他们中大多数人不过是“陪太子读书”，可以说使得大好年华白白浪费。不幸的是，这种人可能还占到多数。他们因身在县中肩负过度的期望，因为这份期望他们又继续受到伤害。

那些“进城有望”，或者说被认为有望的学生，他们受教育时除了被告诫要千方百计远离“朝五晚九”的工人阶级，而去做工人贵族“坐办公室吹吹空调”，还要被告戒以后一定要“进城”而不能返乡。这里的实质在于，学生虽然还未进入实际的社会生产系统，但他们已经被当作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看待和塑造了，学生的全部职责就在于使自己标价更高。笔者认为这才是“教育资本化”的真谛，资本进入教育体系不过是个表象，仅仅因为他们相对于政府的教育机关，更擅长生产商品而非奴隶罢了。由此观之，社会对人的异化从孩子上小学前那一声声“清华北大”的恭维就开始了、从孩子被迫遵从教师与家长“好好学习”的训诫时就开始了。

“进城”的愿望排除了尝试改革或者反抗社会制度的想法（尽管往往有人宣称“以后当官改变这一切”，可是哪怕有最基本的政治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样的改革方案是多么不靠谱，甚至给无产者们提供一个幻想“青天大老爷”来调和阶级矛盾的空间，实在是一种贻害无穷的观点），显示出消费主义的内核，即只有占有足够多财富以用于消费才是正常人生轨迹的观点。不过，事实是，多数人并不能够达到“消费”的标准，他们维持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已经实属不易，可能还要为此付出损害身心健康的代价。残酷的事实会告诉他们从前的期望是多么遥不可及，有些人还会因此成为“新穷人”。这种观点，自然而然地将一部分够不到“消费”标准的社会成员踢出了正常社会成员的范畴。这生产出社会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则必然经历激烈的矛盾运动后走向统一。

学校是组织化地宣传这种思想的先锋军。出于各种原因，比如舆论认为这种话语“功利主义”而隐隐约约地抵制，这种思想往往不能明说出来，于是包上一层“青春”“奋斗”“不怕吃苦”的外衣。这种看似理所当然的外衣迷惑了部分学生和多数教师，他们真的会把这种排除娱乐、侵吞健康、一元评价、单向规训的应试学习看作“青春激荡”的唯一方式。比如前段时间网上小火的“干呕哥”，喊口号过于卖力导致干呕。这本是规训得十分“成功”的一个例子，过于高昂的情绪和不为高尚的内核的冲突确实营造出了喜剧效果，许多网友却“笑梗不笑人”，认为他至少精神可嘉。实际上，什么“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或者“2025，一切有我”（说实话笔者一直不能理解这句口号的字面含义），都只是口号的形式，尽管花样各异，其真正内容仅仅是要求学生不断重复同一句话：“我要进城！”于是，“青春激荡”的内核被完全改变成了功利主义的。青年说：“我们需要生活。我们需要理想。”规训者便说：“世界是功利的，你们无能为力，你需要‘青春激荡’来获得更多功利的利益。”“青春激荡”便成了对社会规则的无限承认乃至认同，它的“狂妄”与“叛逆”的部分就这样被无害地用餐巾纸包裹着，扔进了垃圾桶里。我们看不到那真正生命的喷发，只看到一个个满目利润的、盲目狂热的犬儒。

青春当然应当是激荡的，这个时期作为人的精力、创造力都最为活跃的时期，实在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可是没有任何人论述过一个人处在黄金时代意味着时间必须全部花在一张书桌

前，为了几十本书的应试知识累到死去活来。在东城中学，上课从未感到困倦会被作为“正面典型”，学生之间会经常交流自己上课睡觉的情况——可见大部分学生明明是“精力充沛”的人，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却连基本的活力都消磨掉了。学生们是十分容易熬夜的，不光是学习时间过长，也是他们在向明天要时间。在他们看来，好似只有睡前刷手机的一两个小时，才真正由他们支配、属于他们自己，他们在这个时候似乎才遇到真正的自己（尽管是否是“真正的自己”有待商榷），而这些时间又由于学校对时间的无限挤占而十分短促，于是在这段时间内他们的娱乐也要像在学校里一般“强调效率”，事实上这段时间也是被重重限制的，也不能够显示出“真正的自我”究竟是什么样子。当然，学校会默认，他们既然是学生，那么他们“真正的自我”便是学习，校领导们为了让学生的这种“本质”得以实现，于是就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地控制每一分钟以用于学习。于是除了时间，学校又造成了一种空间的隔离，学生被集中在学校里，他们与真正的社会生活分割开来了，他们分数考得再高，也往往是满腹经纶的无知者。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作为一个人存在时，想要体验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只有到越来越困难的应试题目里去找了。

当你向教师们说“请送还我的青春”时，他们会愣一下，然后意识到你的意思是想要自由地发展个性。那可不行，至少熬过高中三年。但是能熬过高中三年就能熬过大学四年，就能熬过工作前几年，就能熬到退休——喔，连退休都延迟了。除此之外，青春还有“感恩”父母与学校的内容。而感恩的最好方式，自然就是“激荡”了，因为这正是他们的期待。青春不“激荡”，便是“躺平”“摆烂”：这句话从学生的口中说出，尚且是一句无奈的自嘲；若是从教师口中说出，那就是严厉的警告与批评。他会说你辜负了教师的努力，辜负了父母的养育，辜负了时代的培植。可是他恰恰忘了，三者共同扼杀了青春。青春在哪里呢？它已经被高考制度抹杀了，已经被虚假的消费主义迷梦提前消费掉了。青春这个近乎神圣的词被可耻地污染了，被硬生生塞进了消费主义的内核。不羁的青年应当学会服从，成为“合格”的、不会反抗的、为了迎合秩序而适度“自残”的社会成员、一个消费者。这就是为什么口号文化特别偏爱青春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已经从对美好的描述变为隐形的行为要求和道德绑架。

学校为了政绩，或者出于所谓的“教育情怀（事实上是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不完全以及对自我规训）”考虑，需要一种方式考察学生是否真的接受隐蔽的消费主义内核，也就是这种商品是否具有“质量保证”，形成了“口号文化”。“口号文化”并非学校独有，但是它在学校里表现出过强的双重规训特征，却是一奇景。激情的力量和敬畏的情感，是学校期望口号文化发生效力的主要方式。它假设：一个人的应试成绩不但与理性的能力相关，也和感性的激情相关；感性的激情可以通过外在方式培育和表现出来；感性的激情要培育和表现，就需要非理性的形式，通过近乎虔诚宗教徒的狂热和近乎原始人的野性，来为行为赋予“力量”。有时这种口号以宣誓或承诺的面目出现，它的作用就不仅仅是提供动力，还是把它的内容确立为不可侵犯的禁区，试图在学生脑里创制出一个“圣洁之地”，对此畏首畏尾，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它运用这种手法巧妙地摆脱了责任。因为学生既然“宣誓”，那么就好像学生是在行使自身的自由意志，就好像学生真的如此而想，并且必将如此而做。这种叙事麻醉了学校，但并不一定能麻醉学生。学生作为当事人，最清楚自己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即使他们也暂时被麻醉了，不出两天，他们由于承受的压力，便会重新认识自己。

学校才有权决定口号文化如何组织，规范它当中的一切要求。无论是跑操的口号（“清华北大，全都拿下”）、每周例行的口号（“我能，我行，我赢”），还是运动会、百日誓师等大型活动的口号，都会要求大声。学生喊出分贝很高的口号是“上进”的表现（至少在老师眼里），反之就是动力不足。口号声音越响，就表示学生越激情，对口号的内容越认同，越有动力完成他们的“承诺”。在下文可以看到，学生往往是意识到这一矛盾的，因此口号文化并不会得到全面的贯彻。学生在大声喊口号时，沉浸在“令人激动”的表象里，似乎也见

到了自己“金榜题名”因而“荣华富贵”的样子，成为这种体制的受益者，尽管真正的受益者少之又少。在这种景观中，大约只有站在台上发号施令的官僚才可能沉浸其中。



带有集体性质的口号，比如每班的口号，会带来集体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这种感觉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总体成绩、学校考核、外界评价。除了第三点与社会道德接轨，集体归属感、荣誉感的形成主要还是受学校的支配。单打独斗的学生们，少有真正的集体主义，评判他们最实际的标准还是考试分数。即使具有一定集体主义的精神，一般也是要求将它转化为应试学习的动力。学校正是期望通过这种本质上虚伪的“集体主义”加强校内的“凝聚力”，从而营造“努力奋斗”的氛围，以激励学生继续“精致地重复”应试知识，而不是全面发展自身。而且，这种集体，除了选了同样的科目，恐怕并无什么特殊的羁绊，亦无结成这个集体的特殊理由：它不过是被行政命令强制集合起来的一个集体罢了。虽说“日久生情”，但若分隔日久，这个对集体的情恐怕也不那么容易保存，这就是学校所期望的“凝聚力”。这种集体主义终究是个人的，它矮化、扭曲了人们对于集体的认识，便于学生以后适应每一种维护“现代生活”而在表面上宣称“为他们好”的“集体”，包括但不限于政府、公司。这些集体依旧是专制的、从无什么民主，更不要想每个成员对它“共商共建共享”了。在这种情况下，集体由“所有成员的集体”蜕化成了“集体的领导者”的集体，集体便失却了它的真谛，不再是所有成员的相加，而是一个拥有明显权力结构的群体，它不再代表所有成员共同的意志，它现在已经存在于一部分成员对另一部分的服从中，而那些服从的人便被异化为有权力者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

有的老师直接说出他们观念中口号文化的作用，提出“声音越响，成绩越好”的论断。这并未接受科学的检验，直觉上也不会认为两者有关系。甚至说，“理想状态”下专注应试的学校，也不应该过于关注诸如口号、跑操、规章等不直接增加应试知识的事项，它们实际上在“浪费”学生时间和精力，应该把几乎所有时间都安排给学生学习，口号等则可有可无。然而，学校的担忧在于，如果不推行口号文化，那么恐怕连学生维持应试学习的意愿都难以为继。这实际上反映了学校自身的“创伤”，也是学校试图让学生服从学校意志的一个尝试。因此，口号文化（包括跑操和规章）本质上还是一种服从性训练。这种逻辑的出发点是：越服从，

，成绩越好，至少总体上是好学生（但是这种逻辑已经被大量的事实证明不正确了）。口号文化（以及跑操、规章）的逻辑只是这种逻辑的衍生物，毕竟学生连可有可无的要求的都执行了，甚至充满振奋人心的“激情”（实际上是自我规训），“为他们好”的应试学习的要求就更应当执行了。特别是在许多老师都自豪地讲“上课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走”的时候，改进教育模式的可能就被忽略了。口号文化是学校的安慰剂，它通过确证学生的服从，进而确证社会现实被再生产出来了。它与整个“现实”构成一个看似逻辑自洽的外在景观，偏离这个景观便被视为取败之道，是无法理解的“疯癫”。于是，口号文化为了迎合整体的社会景观，连自身都异化掉了，它由激发学生应试学习意愿逐步变为服从性训练，渐渐丢弃了自己原有的内涵，从而逐步丢弃了自身存在的必要性。

由上，口号文化实质上发挥了双重的作用：重复强调消费主义的内核和进行服从性测试。其中服从性测试服务于消费主义内核，它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体的规训方向。它实际的成效如何呢？下面以一次特殊的口号为案例谈起。

乌龙口号：政治冷感

运动会的开幕式，是东城中学为数不多的“玩”的活动中为数不多的所有年级都会参与的，尽管高三最直接的参与就是表演跑操，两天的运动会有一天半上课。口号文化的影响下，开幕式自然也少不了大声呼号的环节。

往年这个口号中肯定要含有“x中，加油！”，今年却没有了。据说可能是去年很多人将“加油”替换成了“放假”，学校为了不扰乱秩序，将口号内容做了些调整。恰逢七十五年华诞，新的口号中有“祖国万岁”“人民万岁”。口号要喊两遍，第二遍的“万岁”要连喊三次。这种口号在通常的宣传口径中似乎并没有问题，实际上却引起了一些混乱。从这种看似是特殊情况的“混乱”中，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口号文化的影响力、实际的作用，以及学生对它背后的规训力量的回应方式。

据笔者调查，学生对这口号的反应方式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或者以为这是“好口号”，或仅仅当作完成任务而正常地喊。第二类，或认为口号“不正常”，或是因为以前便不喊口号，而未曾开口。第三类人，或出于自身政治理念，或是“好玩”、跟风，篡改口号，比如用德语喊或右臂向斜上方伸直，最多的是将第三个“万岁”改成“万万岁”。第四类人，则延续上一次的精神，矢志不渝地喊放假。据估计，第三类人最多，第一类人最少，以至于正式开幕式时第三个“万岁”的听感像是三个音节。由此向平常的口号延伸，也可划分出三类人：喊口号的、不喊口号的（有人称之为“老油条”）、篡改口号的。平时的口号中，可能第二类人居多。

从这次的“乌龙口号”当中学生的反应可以看出：政治性如此之强的口号，是为多数人所不喜的。这种口号没有消费主义内核（仅这两句而言，后两句的口号重又出现了“青春”之类的话语），“距离生活较远”，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他们不愿好好喊口号的现象更明显地表露出来。多数同学的反响，恐怕并非“不爱国”，而是出于政治冷感。

政治冷感者的人生是从未考虑政治的。哪怕选修政治，哪怕对网络政治模因滚瓜烂熟，哪怕天天高谈阔论国际局势，他们恐怕也从未了解自己的县有多少人大代表、他们都是什么身份、什么主张，甚至政府大楼在哪里、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这就是说，他们并不知道政治在

实际层面如何运行，而限于政治体制的专制与封闭他们也确实不大可能知道。如此产生的对政治活动的陌生更会加剧政治冷感。同样地，他们往往也不知道如何在政治层面表达自己的诉求。也就是说，他们从未把自己当作一个可以主动参与政治活动的主体，实际的政治世界与他们的生活世界是完全平行、几乎毫无关系的两个世界。进而，他们丧失了政治性的洞察力。他们或许能够从感性的视角出发，察觉社会中的问题，但他们往往从个人动机、原生家庭、“人性使然”等等较为偶然与狭隘的因素来分析这些问题，却忘了这些问题有其发生的社会层面的普遍性的原因，而这些社会层面的原因是不可能仅仅通过道德批判或应对突发事件的手段来解决的，它只能通过政治手段，通过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才有解决的可能。但这种路径一开始就被政治冷感者排除了。

谈到真实的政治世界时，他们甚至会展现出厌恶。这不同于谈一个他们从未接触的圈子时展现出的情感。其它圈子和他们确实完全没关系，但政治世界在实际上和他们是有关联的，比如政治宣传会以各种形式渗透他们的生活，法律法规也切实地规范他们的行为。他们也常常听闻政治腐败的现象，虽然他们并未直接参与政治，但他们肯定也会隶属于这个或那个社会组织。如果他们在这些社会组织的内部也能进行某种政治实践，那么也不能说他们就同政治完全隔离，但问题在于官僚主义几乎渗透了整个社会，一个社会组织，稍大一点就会有“党委”入驻，整个社会组织的事务几乎都是几个“大人物”说了算。因此，他们由于统治阶级对政治的垄断而难以真正接触到政治。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冷感的基础。也就是说，不是政治本身，而仅仅是政治给人的普遍印象，结合社会的风气，使人产生的政治冷感。既然如此，这种政治冷感的风气就绝不是不能够改变的，因为它恰恰是建立在一个人民群众普遍无法直接接触政治、经济上也愈发贫穷但也并非朝不保夕的历史条件的基础之上。它绝不像某些庸俗者所认为的那样“基于人性”，只要时代朝着斗争更加激烈的方向继续前进，那些人就会瞠目结舌地看到他们奉为根本的“人性”能够发生多么大的改变。

此外，人们对政治世界的厌恶可能来源于一种恐惧。他们能感受到的政治世界与生活世界这两个异质世界最明显的差别，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官僚式的绝对服从体制和相对自由的俱乐部式的平等生活方式的差别。政治是严肃的，而严肃意味着服从与不能娱乐。比如短剧《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受到严厉批判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对严肃的革命进行娱乐化的处理。学生们也认识到这种严肃，但他们的幸福又构建在享乐（或者说“消费”）之上，故而他们恐惧于自由受到无可违抗的上级的侵犯——实际上已经被学校侵犯，并且正是这侵犯以及学校同政治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们更加敏感——会拒斥充满集权与官僚的体制。同时，他们意识中的神圣领域——自己的生活方式，作为宗教教条被信奉着，他们也会因此拒斥“异教”，即另一种“宗教”的宣传，比如基于政治的宣传。口号文化就是对他们来说“洗脑”一般的宣传方式的直接表现。他们感受到自己信奉什么、对什么感到狂热的权利受到了侵犯。

同时，他们是理性、克制的现代人，即使有时“发疯”，也是用被生活世界接受的方式发疯。口号文化要求的那种近乎虔诚宗教徒的狂热和近乎原始人的野性，是与他们的生活根本不同的，他们相信理性的“正常”的现代人不会使用如此激烈的方式表达情感，因而他们对口号这种要求不满。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这个学生恰好喜欢用大喊大叫的方式发泄，他就会发现自己被允许大喊大叫的场合只在口号文化中，并且抒发的具体情感内容已经被规定好了。但是，任何一个人人都知道，现阶段的技术手段还没有办法控制一个人的情感，这种手段便毫无保留地展现出自身的荒谬。会有老师奇怪为什么很多学生不肯放开嗓子，那是生活方式的差异。有的老师到兴致处也可能喊两句，但是那全是出于自愿，学生们通常可不愿用这种“近乎原始”的方式自我规训了，并且放开嗓子的内容还是规训者强加的内容。

此外，口号文化处在一个尴尬的地位：“青春激荡者”似乎意欲不断地向社会索取，但他们“感

恩”时又宣称自己即将给予。学校宣扬“青春激荡”时似乎把学生看作自为的主体，是平等的合作者。但“感恩”的要求又必须把学生的地位降低，让他们成为受动的人。口号文化让学生们处于一种奇特的地位：他们的索取好像是为了给予，而他们的给予又必须以预先的索取为前提；他们似乎与学校处于同一地位，但是这又以学生被学校辖制为前提；学校又似乎总是试图抬高这些学生的地位，但每抬高一点，学校自己的地位就会跟着再高一点。这种定位本身的撕裂是口号文化无法解决的矛盾。站在学校的角度来看，他们不过是把学生当做受教育的客体，但新建成的消费社会可并不需要从全景敞视监狱走出来的模范的“一般人”，表面多样的文化消费品恰恰呼唤着个性，这是当下学生定位矛盾的本源。高中生活、大学生生活和工作生活之间巨大的撕裂让他们不断受到不同形式的塑造，这种生活的撕裂给他们带来的往往只有迷茫、失望、自我放逐与虚无主义。这种撕裂已经给整个社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它引发学生们对社会的相较于上一代更为深刻的反思，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它呼唤着对包括教育体系在内的整个社会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以摆脱由环境支配人而造成的对个人与社会的伤害。

中国有着步入低欲望社会的趋势，很多人期望的生活是“平稳的”（尽管他们也时常被消费主义蛊惑），对口号文化宣扬的“奋斗”并无过多的动力，这个角度也给了他们反对口号文化的理由。这就相当于说，“要保卫现代生活”。他们是怎么样保卫现代生活的呢？“反抗”口号文化是为数不多的行动之一，因为口号方面的监督最少，回旋的余地也最多。这种反抗在这次的运动会的乌龙口号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意识形态的强力和对可能失去自由的恐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对口号文化的拒斥和以个人力量对抗它的策略。他们或不喊、或解构，同学们对此开怀大笑或嗤嗤暗笑——这么“严肃”的活动就丧失了它的气氛。但是学生们没有更进一步，想着废除为很多人不喜的口号文化，至少只让想喊的人喊。一方面，他们并不相信自己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和权利，反对口号文化的理由又拒斥了政治式的解决方法（最直接、现实的解决方法），比如同学校协商（实际上他们也从未想过还能有这样的方法，大多数时候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组织和力量，甚至从未想象过学生有权利和学校对话的乌托邦），口号文化的要求就成了无法逃避的要求，“反抗”就永远只能在“地下”进行。另一方面，他们虽然不喊青春飞扬，可是也往往会主动“拓展”，更进一步学习应试知识，或者真的自愿自习，以致于东城中学的高一高二即使暂时实行双休，高三在星期六的晚上依旧能看到高一高二的教学楼大部分班级都灯火通明。这不是为了“自由”“解放”的暂时潜伏，而是自愿的行为，这表明了他们接受了“好成绩 - 好大学 - 好工作 - 好人生”的人生范式，这样的生活状态决定了他们不会完全地反抗消费主义的内核，而对其隐隐约约地认同——他们直接反对的实际上是服从性测试，但是直接的反抗行为是看不到的，是无法公之于众，或者用理性认识广泛揭示出来的。因为这种反抗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他们既已心知肚明反抗的存在，同时便也心知肚明它的隐蔽性。如果他们能在某个时刻共同发动这种反抗，那么它当然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但这种隐蔽性在隐约认同口号文化内核的人依旧存在的前提下，就不会消亡。他们好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可他们毕竟还是失语的。

篡改口号内容解构了口号文化，它标志着学校在学生脑中创制“神圣领域”的尝试完全失败，以及学生拒绝与学校合作的初步尝试，不能不说进步。无论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宣传，还是消费主义内核的狂热表现，一旦经由学生的解构，就从高居天穹的神坛跌落到了泥泞之中。这时大声呼喊口号，所呼喊的就不是外在的政治性的力量，而是经由主体建构出来的另一种东西。这可以主体的诉求，比如“放假”，也可以是一种玩乐（“万万岁”的口号引起许多人的笑声），或者仅仅是对压力的纾解——可以想见，这种解构将会有很强的生命力，一届一届的学生都会继承下这种解构，旁敲侧击地解开这种规训的消费主义面目。

口号结束之后

学生的口号环节结束了，不管他们是否对其进行了解构，运动会的开幕式仍在进行。可能不出一个小时，这个解构行为就会被尘封在记忆当中。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每周晨会、跑操的时候。他们确实没有好好喊口号，进行了形式独特的“反抗”，但学校各项制度也确实依旧有条不紊地运行着，反抗就这样与顺从并存了。即使学校似乎什么都没做，整个体系本身的运作便足以使这种小规模“反抗”被纳为体系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种“反抗”。它仅仅出于政治冷感，出于有意识地对“意识形态”本身的拒斥，尽管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没有对整个口号文化展开系统的批判，没有揭示它处在学校规训的场域，更没有明确它消费主义的本质。也正是因此，这种反抗仅仅处在自发阶段，毫无理性的认识，毫无明确的目标，也毫无切实的手段。这种反抗的方式也显示出一种与学校规训若即若离，但远不敢公开决裂的意识形态。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它只能永远停留在部分不满者的自娱自乐，用于缓解应试学习的压力，甚至一定程度上巩固应试主义的体制。如上文，这反抗的种种局限与政治冷感关系很大。学生们没有自觉地对现象背后的本质进行剖析，想不到总结出自己的诉求，想不到如何运用自己的力量，甚至想不到自己的境遇是可以改善的。

为何这种局限性存在？有一位同志认为，学生具有双重的阶级性，无产阶级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学生群体一方面在社会上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政治地位，这造成了学生的无产阶级性；另一方面学生又一直被教育要像一个小资产阶级一样生活（有的老师会直接向学生展示考入好学校、找到好工作后的学生的“奢靡”生活），再加上他们一直被作为商品塑造，这造成了学生的小资产阶级性。学生们没有直接参与社会的生产生活，因此会在无产阶级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出现摇摆。比如一个学生维权组织的组织者，创立组织的初期要“举起反抗的旗帜”，可几个月后竟然幻想和警察合作。笔者以为，学生群体的小资产阶级性是导致他们斗争局限性的主要原因。

学生的小资产阶级性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首先是他们期望未来成为小资产阶级。这是学校、社会规训和社会阶层固化的双重结果。他们因为规训而期望“尽力向上爬”，提高未来的收入能够支撑持续的消费水平，又因为阶层的固化而不敢期望更进一步成为大官僚、大资本家，更不敢坠入成为最底层无产阶级的“苦海”，笔者曾听一个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当时他的成绩至少能稳定上到“211”甚至“985”院校，这对于绝大部分学生来说是望尘莫及的，但是由于他在重点班，所以老师总是想方设法让他继续提高成绩，甚至提出过超过清北线的计划）说“如果我不好好学习，那以后我的家庭怎么办”，但是按照当下的分配制度，他将来的薪资将会超过绝大多数的无产者，毕竟中国收入在个人所得税起征额以上的人只有约八千万，这个学生的担心明显过头了——但是他就是产生了这样的担心，这与学校长期的规训与贩卖焦虑脱不了干系。其次，他们理论水平参差不齐，大多对整个社会的体制没有深刻的认识，没有认识到资本体制下剥削压迫的必然，又没有对于整个被压迫阶级的同情支撑他们求索，因为他们多少属于“进城有望”的人。对于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不关心，他们的人生规划就被学校影响，从而围绕消费主义而制定出来了。故而他们很大程度上仍会把学校视为合作者，进一步深信规训的内容。有的学生会说“应试毕竟是为自己好”这样的话，可见思维过于狭隘、浅显，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学校绝不会教授他们比应试所需更多更深的思维，自我学习的可能性被又学校削减过多所致。第三点是前两点衍生出来的一些观念，比如“平淡过下去就好”“考得好一些总归是好的”之类，标示着他们往往向往“现代生活”，又把目前的体制看作永恒的、无法更改的，甚至是仅仅关注个人命运而不关心体

制或者其他人如何，因而更加深信个人的力量而非集体的力量，于是认为不应该期待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着手从事它的变革就更是虚无缥缈，甚至会妨害“享受生活”。这些观念的直接结果就是政治冷感。

这种小资产阶级性充斥着学生思想的各个方面，进而对学生运动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有时网传成功的学生运动，可能多发生在比东城还要贫穷落后的地区，那里物质条件更差，进城风气更加浓厚，学校的规训和直接压迫自然更加明显和深重。一些令人愤慨的事件发生，学生连当下的生活都深感难以为继，更遑论幻想以后的“现代生活”，故而群情激愤，揭竿而起，形成暂时性的学生运动，比如打砸食堂之类。然而这也多是没有理论指导的运动，自发性占主导，形不成长久的潮流，等事件过去一段时间，热情消退，自发的组织变得散漫（甚至可能一开始就没有组织），学校象征性地让步，再惩罚几个为首的学生以示惩戒，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可能日后采取稍微温和的策略，学生争取到的本就不多的权利又被偷走了去。如果想办法在学生中传播先进的观念、理论，或许能更有改善。如果是市中乃至更高级的学校，他们的情况相较而言会好得多，具有民主习惯，即通过学生会等某种方式一定程度上参与过政治，情况会更加顺利些。此外，网络上也有一些学生为维护权益而建立的组织，但是也正是由于学生的小资产阶级性，找不到正确的道路，也形不成坚强的组织，所以一旦规模稍大就会被警察取缔，甚至自我分裂。但是，这些学生运动的各种形式看似在消磨参与者的斗志，毕竟迎接他们的往往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这个过程实际上却能够逐步筛选出真正合适的革命者，并且让他们看清楚，小资产阶级的维权路径是多么脆弱。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斗争开始自学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政治课本里那个充满谎言的体系），这正体现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可能永远占据人们的大脑，革命的歌声将会传遍每个角落。



另外，对口号文化的逆反也有一定的现实基础。首先是对口号的监管不力，不喊、篡改的情况只要控制在一个度以内就难以发现。其次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隔阂。校领导往往幻想整个学校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希望“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但整个学校仅仅是被行政强力聚在一起，不同的人之间并不会因为很多时间都在同一个围栏里面而有更多感情，即使是跨班跨年级的交往，也是私人情谊，而不会有人想到“东城中学让我们相遇”——那太矫情了。即使用最粗略的划分方式，也可以把整个学校分为两个社会：学生社会和教职工社会。两个社会即使很长时间相互接触，共处一室，也会因为两类人的权力差等关系而各有各内部的习惯，各自的运行方式，各自的秘密。就此来说，两个社会是异质的，甚至容易产生怀疑、警惕和对抗。这就显示出团结教职工的困难，因为两个社会除了上课，一切都不互相协

调，两侧都有不同的诉求和阶级意识情况。口号文化为学生社会所“吐槽”、所不喜，教师社会却因为用不着喊口号而有些支持这种文化，乃至帮忙监督口号文化的实施。同样盛行于教师社会的政治冷淡也同样局限着教师自身的活动。虽说很大一部分教职员工的生活确实如无产阶级一般艰辛，但至少说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在公办学校的教职员工拥有体制内的“铁饭碗”，相对稳定的生活为他们带来了另一种思想，亦即不愿做出过于出格的行为。随着地方财政的进一步崩溃，这份脆弱的稳定终将被打破，让他们也时刻处在失业的威胁之中，届时将是教职员工阶级意识真正爆发之时。学校内两个社会的分裂为学生的斗争提供了基础，但是在其它监管更强的领域，如何让“明哲保身”的学生也产生聚众反抗的想法，则是一条需要长期探索的道路，而在这当中思想启蒙必不可少。如果是到了教师也不得不加入斗争队伍的时候，那么在学校斗争就更容易取得更大的成果。

学生对口号文化的拒斥生发自政治冷感，反抗的方式和情况同样助长了政治冷感。虽说教师的监督不足，但毕竟还是存在，如果不改变现状，解构口号文化的行为就只能小规模存在，藏在人海里暗乐，做被粉饰的太平下的“暗流”——尽管这种暗流激不起大浪。解构的行为只能让解构者自己和身边的人“感到快乐”，然后什么都没有改变——他应试学习表明他在消费主义的场域依旧追求消费主义，他跑操表明他在更强的服从性测试中依旧选择服从。虽说对于不满于其制度者而言暂时服从是必要的，但是对于没有理论基础和坚定理想的学生来说，这反而更加表明他的反抗只能采取一种和扎小人没什么区别的方式。这毕竟不能接着助长反抗的情绪，也让人看不到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但是暂时没有方法不代表不应当前行，因为前文已经可以看出来，应试主义的高考制度被社会抛弃已经成为了必然的趋势，我们为了学生的福祉和削弱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链条，更应当继续促进这种趋势。

总体而言，对口号文化的解构还是必须的，这毕竟是在整个学校规训体系下最容易撬动的一环中踏出的第一步。但只有这一步终究是不够的。它必须成为开端，而十分重要的下一步的重点不在揭露虚伪，而是强调力量。利用学生内的“键政”风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雄辩，便可以发挥主观的力量，让学生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究竟可以改变什么——尽管并非一切。也切忌让学生产生“唯我独革”的想法，虽说学生运动是一件利器，但非“终极杀器”，造成学生苦难的根本原因毕竟在象牙塔之外；或者说，象牙塔仅仅是这个极其复杂体系终中的一部分。学生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但是说到底那只是一个有理想的个体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在这个阶段把他们直接连接在一起的还不过是共同的对于乌托邦的幻想。而无产阶级的力量，则是真正人民的力量，它直接植根于资本主义体系最直接最本质的矛盾上，因而是历史的力量，是真正能够打破表面统一的力量。

教育的出路在何方？

我们已经否定了当下的教育体制，那么我们就应当提出一种更加合理的教育体制。而这就首先要回应一种声音：“高考是最适合当下的制度。你不要高考，难道还能退回推荐制吗？那不是干部子弟们更容易获益，从而造成更大的不公平？”

第一句话倒是神奇地说对了，毕竟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不可能存在一个真正“理想”的教育制度，我们只能看到不公平在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高考制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虽说起初它确实对促进社会流动与推动教育普及做出了一些贡献，但发展到如今已经沦为不平等的遮羞布。我们确实对高考制度进行了批判，但是不能幻想像换零件似的就这样把旧的高考制度换成新的一套什么制度，无论这种新的什么制度又多么工巧、多么天才，它都必然会被

资产阶级侵入，然后异化。要寻得教育制度的改革，必须以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为前提。这个社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拥有一个真正合理的教育制度。

而他的第二句话则是大错特错——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人已经想象不出没有官僚制的社会了。这不得不说是官僚制度的巨大成功。然而，如果无产阶级革命带来的是一个充满官僚与专制的政府，那么这样的革命就是失败的，就没有完全完成历史交给他的任务。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曾说过，旧式的国家，包括官僚体系和旧式军队，都是无产阶级应当打倒的对象，在那里藏着资产阶级复辟的根。如果建立了真正的新式民主，在无产阶级锐利的眼睛下，又怎么可能像官僚制的国家那样普遍地存在着不公平呢？

也有人会说：难道你要搞素质教育吗？素质教育只有在那些发达国家才可能搞起来，在中国只有少爷们才能享受素质教育。这又是大错特错了，这些人以为教育的模式好像就只剩下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模式了，可能顶多再加一个所谓美国式“快乐教育”。素质教育说得很好听的，它要求发展学生的各种素质，比如艺术的、科学的、人文的素质等等。这会让人们联想到“全面发展”，但是，这真的是“全面发展”吗？在素质教育的方法下，我们只看到被资产阶级青睐的各种素质才被称作素质。按布尔迪厄的说法，这种“素质”根本上是一种文化资本，使得这些学生更能够融入资产阶级的“上层社会”，而非无产阶级当中。那么这种素质，归根到底不过也是劳动力增值的途径。而且相较于更大众化的应试教育，这种素质教育还沾染了精英教育的模式，因为学习各种素质的高昂费用只有富有的人才能承担，普通家庭不“因材施教”就很不错了。所以，素质教育也不是我们所想要追求的教育。

要回答我们的教育应当走向何方，就需要回答教育究竟是为了干什么。一种看法认为，教育是财富分配的途径。这种说法似乎并没有问题，因为当下教育确实发挥着这样的功能。但是，教育的这个职能并非它的主要职能，这只是教育资本化后附带的结果，在这里真正分配财富的是市场而非教育，就好像在官僚制计划经济的国家里真正分配财富的是权力而非教育一般。教育所具有的分配财富的这个职能应当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而趋向消亡，因为这种过于悬殊的分配本身就在走向消亡。人们常说教育是无价的，转头便又用功利的视角衡量教育，毕竟“这就是现实”。那么，再多的风气引导、文化宣传，就不能根本改变这种附在教育身上的功利性，只有当这种“现实”消亡的时候，人们的这种观念才可能消亡。

教育真正不可替代之处在于，它有助于回答“培养什么样的下一代”的问题，也就是社会如何再生产出它自身的问题。教育可以看作社会维持自身观念一致性进而维持自身存在的一个主观因素，那么一个社会的教育如何，首先就要看这个社会的统治阶级认为什么样的观念能够维持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教育，应当培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全面发展的人。无产阶级要使他们的子女接受这样的教育：他们在接受这样的教育后，应当认为劳动是光荣的、个人与集体是统一的、他们除了是生理上的人还应该是政治性的人。

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那个社会中，无产阶级把控了国家政权，他们一方面要尽可能提高社会生产力，这就要求提倡崇尚劳动的风范。这种风范是关在教室里、只会不断重复“弘扬劳动精神”的教育养育不出来的，必须把课堂开到工厂里、开到田野里、开到大街边，开到任何可能接触到实际的劳动的地方，在这里学生能够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能够亲身感受到用自己的双手改造世界的成果。他们在学校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便不会再局限于仅仅是解开几道题、写完几张卷子，更不会再让在解题中感受不到乐趣的学生们陷入精神的痛苦乃至抑郁。

之中。当然，这种劳动教育是和现在资产阶级推行的所谓“劳动教育”根本不符的。现在的劳动教育大约有两种：一种是形式主义的，重在走个过场；另一种则是直接把学生当做廉价劳动力，当做资本增值的工具，这都不可能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所接受。为了避免第一种，就要搞清楚：不是“劳动进校园”，而是“学校进劳动”，逐渐消灭学生和社会相隔离的状态，让他们接收到无产阶级的教育。而第二种，只要在社会上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全民所有制代替之，便能够避免。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往往比个人单打独斗有更高的效率，但是现在的教育体制却过于强调学生的个人能力。事实上，也正是学生这种分散的状态，让他们往往难以认识到集体的力量。让学生认识到集体的力量，必须让学生处于同甘共苦、相互协作的真集体中，而非由行政强力捏合在一起的假集体。这就要求给予学生一定的结社自由（这在许多县中是闻所未闻的，那里的学生从踏进校园的那一天起就被宣布成为做题机器了），并且这种结社不限于一些大城市的学校中的社团，从兴趣爱好、到自主的学习探究，乃至于政治性的组织，无论是什么样的结社，只要有建立的可能与必要，都应当让学生去大胆地尝试。他们会发现，自己是需要集体的，比如他如果在一个搞调查研究的社团，就会发现一个人不可能取得足够的样本；他如果在一个学习知识的社团，有同学给他答疑解惑也会加快他的学习进程；甚至仅仅是一个读书的社团，集体也能为他提供相互交流的空间。在这种学生能够自由结成集体的体制下，集体的力量才会真正显现，在这种环境下接受教育的学生，对集体的信仰就远不会仅限于他所参与的那几个集体，而会随着他认识的不断深化，引导他认识到无产阶级这个大集体。他会感到自己应当成为集体的器官而不是只图个人的享乐与自由，他会感受到自己的真正价值会在为集体的服务中得到体现。

在学生参加的各类活动中，有一类十分重要，那就是政治性的活动。这里的政治性的活动可不是旧式学校的走过场与歌功颂德，而是他们作为真正参与政治的、平等的主体进行调整社会关系的实践。学生以及学生组成的政治团体应当对学校内部的事务有一定话语权。如果达到一定的影响力，那么经过一定评估，他们也应当对社会上的政治性议题有发言的权利。学生应当在实际意义上参与政治事务，这是打破政治冷感最直接也最有力的办法。从社会风气的角度来讲，只有当人人都把自己与他人视为相互平等的政治人，对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或主张并且这些意见能够平等地被其它政治主体所看见与思考，有能力、有希望借助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来使得自己的意见从众意走向公意，进而被实践、反思、再实践，那么这些人才是政治性的人，他们才能成为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才能成为人有意识地操控环境的社会的一份子。学生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打破自己身上“脱离社会”“不食人间烟火”“脱离社会生产实践”等种种标签，真正地融入社会。千方百计把学生与社会隔开，只会让脱离实际的思想毒害他们的脑袋，以巩固那个与广大人民相分离的阶级的利益，但是当学生成为积极参与改造社会的一份子时，他们就能和人数最多、最先进的那个阶级相互接触，进而同时改造自身与社会。

当然，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不像以前的社会拼命地维护自身当前的形态，它在自身中就包含着向下一个社会阶段过渡的要求，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应当能够容纳，或者说必须促进不断的革新与发展，那么它再生产出的自身的组成部分，也就是由它教育出的学生、它的下一代，就不能全盘接受上一代的“遗训”，就必须有探索的眼光与勇气。那么，在这个时候教育所要求的就不仅仅是“培育出合格的公民”，因为这个说法是消极的，它暗含了人只能被动适应社会的观点，好像社会变成了一个审判个人的君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则是要人的意志逐渐战胜那些看似“不可移易”的规律，这就要求这个社会的教育不能只教育人如何去适应社会，更应当教育学生如何去发现自己的特异点，以及如何去改造社会。那么，这种教育就不能让某个“风向标”（无论是它是高考还是就业）来指挥一切，因为人的全面发展

中必然要包含着扬弃掉这种所谓“普遍标准”的要求，不然，教育就只能是异化的工厂。而要推进个人的发展，以及个人利用这种发展成为改变社会的助力，就需要允许，以及鼓励学生的自由探索。教育的指标不能超出一些公民必备的基本常识，剩下的则让学生自行决定他们学习什么、如何学习。同时，利用网络系统尽量普及各类学习资源，让学生们能够自行使用。

有人 would 认为，交给学生过多的自主探索权，不就会让他们“荒废人生”吗？这种观点和人性论是一丘之貉。目前出现的大部分厌学现象，与其说是学生自身的懒惰，不如说是教育体制对学生的压抑导致的。它把教育的内容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并且它的知识传授系统还因为充满了腐败而常常失灵。是的，教育包含着知识的传授，这包括了教师与学生双方。但是学生不是电脑，不是只要考虑如何把一串串数据输入进去。学生是人，是接受知识的主体，只有当学习成为发自内心的行动时，他们才有可能进行教育官僚们梦寐以求的“不用扬鞭自奋蹄”，在这个时候，学习就不是异化的准备、不是为了物质利益的享受进行的竞争，而是为了让自己在劳动中发现与实现自身价值的必要前提，事实上他们仅仅是朝着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向迈出一步、积累了知识，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些成就就足够他们雀跃了。

总之，新式的教育不能像旧式的教育那样成为资产阶级掩盖不公、官僚阶层训练仆从的工具。它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用以改造旧社会、迎来新社会的武器。**只有在这种新式教育中，“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等各种教育的理想才能够真正得到实现。**

IX

“左派之主体性”——为何要纠结“网左”与“真左”？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首先向同志们阐明几个事项：这篇文章如果冒犯了同志，请不要情绪化反应，我们不能让怒火吞噬了理智；这篇文章是主要分析中国左翼先进分子内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我们当下革命路线的讨论，不是针对任何同志个人，因为大概率读这篇的文章和作者此前也没有过任何交流更不认识；如果这篇文章让同志注意到了自己或者周围人身上的问题，那它就起到了最好的作用，因为这个文章的目的就是将平时不谈的东西摆上台面来，我们需要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继续进步。革命者或者革命组织如果缺乏良性的自我批判与批判，则会沦为寻找安全感与自信的巨婴，这是我们必须避免的。

唾沫星子比不上实际行动

在任何场合进行政治讨论时，我们永远会遇到无礼、粗鲁、水平十分底下的人，与其交流如果说不是对牛弹琴，就是单纯的惹自己生气。他们不具备政治讨论基本需要的标准，比如严肃性、专业性和针对研究话题的了解，所以也自然无能力从理论、逻辑或者直接的政治立场上反驳你的观点。往往这时候他们就采取人身攻击的方式，以个人身份出发、情感出发、断章取义、“道德原则”出发等等贬低自己的对手，尽管这不会把自己抬高。

举一个例子：如果你和一个立场坚定的右派讨论公有制经济，很多时候他只能说两句“历史上计划经济都吃树皮”或者“你这么喜欢为什么不去大吃饱”等等咒骂，最后以“你说再多有啥用就是个网左”结尾。对于这种阶级立场、革命利益完全不同的反对派，很多同志就陷入了他们低水平的骂战，转而用同样低劣的方法与他们互甩唾沫星子。

我们先问：与他们讨论的意义是什么？不是完全无意义的，比如说我们要指出他们观点的可笑揭露他们的政治思想的虚伪，或者认为可以“抢救”想改变他时，我们就不该高傲的让他们自己骂自己的然后自己假装听不见。但也要意识到，他们以那种立场出发，目的是抹黑、攻击共产主义，如果自己的反动立场足够坚定，你任何反驳或者辩论都不会阻挠他继续抹黑共产主义的计划。我们如果向群众证明共产主义的可行性，绝对不只是和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们论战就足够的。

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和这些反动派证明什么。我们不需要向他们证明我们不是“网左”，管是用定义上否认、修改网左这个群体的存在或者自己去打工告诉他们“我在线下实践”，都是幼稚的表现。成熟、严肃的共产主义者不在意反动派的目光，更不会因为敌人的污蔑打击自己的士气、伤到自己的自尊。共产主义者明白自己的任务是什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更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什么：组织起来作为一个共产党行动，去提升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基层塑造工人阶级的集体团结、在行动中教育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根本性质的深入认知，并在运动中与工人们一起，推动他们得出必须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结论。共产主义者更应该清楚右派的性质，和他们在历史上的无力，明白他们不过是历史向前发展时碾过的一堆垃圾罢了。

我们的任务和工作都很明确，而其中哪项要求我们打造出一个“没有右派反对声音的互联网”了呢？这些资本主义卫道士对革命构成的威胁，不只是要用唾沫星子的，更要用实际行动证明。这是证明给工人阶级看，给群众看，给千千万万受苦的劳动者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是可行的；而不是给右派证明看，“啊，我骂过你了，你是错的”。

所以我们要稳定地推进我们共产主义者的实际工作，让这些资本主义卫道士空喊自己的咒骂吧。我们有精力应该用于培养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干部，发展我们的群众组织，扩充我们的人手和队伍，而不是从他们对我们攻击的创伤中找方法安慰自己。我们唯一能打败右派宣传的，只有我们自己的行动！我们面对敌人的攻击不仅不能乱了自己的阵脚，更要系统性、有组织地做出回击，并集中精力于我们自己的革命工作。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我们首先先对我们对手有清晰的认知，才能采取正确的战术，比如上文讨论到的那种妄图把我们带到他们那种低能水平的右派；我们更要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才能及时反思自己的不足和错误，做出改正并进步，而不是为了捍卫那虚伪的脸皮找出各种欺骗自己的理由。

真正自信的人，不是靠别人夸出来的，而是真心了解自己并对自己能力信任的人。有了这种自信而不是狂妄、自欺的自信，我们才能在进行革命工作时体现出自己的专业性、严肃性和各类能力的突出，不然那种自信就是幼儿式的、不成熟的，让我们不是在为图全人类的解放投身革命，而是为了自己的脸皮投身革命。

我举个也许不是很恰当的例子：有一个国外的电台项目专门做针对约会失败的情侣的采访，其中被甩掉的一方会追寻另一方跑路的原因。有一个女生被询问时，解释是不喜欢那位男性的“生殖器过大”，结果男生高兴的感谢“这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一天”，笑着化解了此事两人之后仍然是朋友；另一个嘉宾的理由是另一位女性的“臀部很大不喜欢”，然后女生直接没有控制住情绪失态，破口大骂并放言“你这辈子也找不到我这样的了你个混蛋”。男生表示非常不理解，单纯的不喜欢能有什么错而且本身这是一个十分性感、按理说算作正面的特征，是让人自信的而不是什么短板。

这里面就能看出来，同样对待约会时正面的身体特征，两个人尽管都声称自己是“自信”的，但只有前者的男生是打心里自信，后者女生的自信则是建立在“他信”的认可上，对自己的身材没有自信全靠他人的认可。男生的自信别人不喜欢他也不在意，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他约会时的正面特征，而女生一旦别人不给予认可就急了眼，因为所有对自己的评估她都缺乏自

我认知，只能借助于他人的评价。别人评价差了，她天就塌了。

这对我们革命者和革命组织不是同理吗？假如哪位同志被捕，难道警察问他“你就是个小屁孩过家家能有什么能力”套话，他就沉不住气张嘴开始列举自己干过的事、联系过的人、写过的东西好帮警察刷业绩？你自己是不是严肃的革命者，你自己有没有能力，你是过家家的还是真心被组织起来要改变社会的，难道心底没个数，只有向别人宣泄被别人认可了才是吗？这种自信是建立在虚空上的，这种急眼是暴露自己的无能的。

回到刚刚右派的例子。所以他们骂我们“网左”，我们就必须要急眼去证明什么我们才不是网左了吗？我们没有必要“Insecure”（缺乏安全感）一般面对他人无理的指责就动摇对自己的认可，成熟的人需要明白这点，自己的能力是自己的能力，不是他人的评价。我们更不需要否定“网左”这个群体的客观存在或者修改它的名字为更好听的称呼来与网左区分，或让自己“躲过”右派的这一枪。我们和只能用低劣手段辱骂他人的右派不同，我们是被组织起来、要严肃行动的共产主义者。我们有纪律、有纲领、有干部般的能力、有理论，我们自信，我们相信推翻资本主义的唯一方法是通过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革命先锋队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后，应当立刻施行最全面、彻底的、以无产阶级民主为原则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基于该民主原则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并在国际主义原则下推进全人类的解放。我们要让经济系统在现有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上根据全民的需求理性地运作，去发展每个人的潜能并给与人类真正意义上的自由——选择自己如何生活，而并非选择自己如何被剥削、被统治的自由。这足够了，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贬低自己！

网左

把问题都扔给敌人是不负责任、不敢正视现实的体现

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同志犯下的一个很正常的幼稚错误，就是不仅接受不了其他革命者的批判，更面对反动派对一些事物的批判自己不假思索就进行反对。有人说，“网左”这个群体就是

右派创造出来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反动派宣传导致的。

所以，这是要把所有在互联网上嘲笑网左、享受嘲笑网左的梗的人都打为右派吗？网左名声臭，就单纯是因为右派辱骂导致的吗？同理马克思算是经受右派歪曲、辱骂最多的革命者了，毕竟年头来看也是被骂的最久的。那为什么马克思的名声不臭？说白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网左之所以现在一提，绝大多数人都当成是个贬义词，就是这个群体他自己进行的抽象发言和操作给了右派趁此机会拿来否认整个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们的理由。网左这个群体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咬文嚼字争论“存不存在”。社会上这么一批人被归到同一类，那必然有相似的特征和行为，对于网左来说，就是线上低龄化、不严肃、无组织的共产主义思想同情者团体。我们今天贴个“大字报”，明天禁止使用这个词，主观上改变不了客观网左群体被用来指代一类人的事实。我们去争吵这个概念对于进行革命工作毫无用处，需要做的，就是意识到这群人的问题和他们相应的先进性，并对症下药进行教育、争取。

我们不该因为这群人有诸多不足就宗派主义式的排斥。要明白，共产主义者不仅是要自己组织起来，更是要将群众组织起来，提升工人阶级对于革命的觉悟的。网左这个群体的绝大多数人不同于普通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众”，而是已经在政治上得到启发、愿意去倾听共产主义者的声音而不是单纯过好日子的人，属于一个由群众到先进工人或革命者的过渡水平；我们必须让他们意识到现在这个状态的不可持续性，单单网上社交性质的聊天不算革命更无法改变现实，只有一同组织起来，革命的先锋队才能做出实际的工作。

这个群体的问题不是右派宣传导致的而是客观每个参与者品行、能力上存在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给他们划分为“群众”然后就搞出一种群众拜物教，只要是群众的，就不能批判、就不能揭露，仿佛群众不会犯错误、不会有落后思想，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迎合群众博取所谓的“支持”。我们即使是对真正的群众，也要明白手段和目的的连续性：我们的目的是提升工人阶级对革命的觉悟，任何达成此目标的手段都只有适合时才是正确的。“妥协”、“温和”不能让我们在针对需要指出的问题上唯唯诺诺，最后给反动派打工，或者面对困难就不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打击落后思想。在性少数议程上很多同志犯下了一模一样的错误，以“中国绝大多数人对这个反感”出发，拒绝对这个做评论或者干脆和反动派一起攻击性少数，最后沦为机会主义的路线。

看清楚现实吧，同志们！所谓“网左”，更是整个“左圈”，面临的低龄化、不严肃和无组织状态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就是我们需要改变的现实。否认局势的不利不会改变局势，只有看清了路，我们才能走出去。谁还为了迎合他们，去放弃我们严肃推进事业的路线，就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历史上俄国革命1905年的苏维埃主席在群众们欢呼革命“胜利”时，做的不是迎合而是当着千万人的面泼了盆冷水：胜利了？沙皇的宫殿我们占领了？农民起义了？军队倒戈了？不要急着乐，形势严峻！

“必须以最现实与开放的路线去统一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以最严肃的态度去破除任何散漫和胡闹，必须用最紧迫的速度去高效组织起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们，建立一个崭新的共产党。任何怯懦在这里都无济于事，任何犹豫在这里都是对革命的犯罪。”

进行政治工作时如何处理个人情绪

这又引到了一个十分值得讨论的话题：个人情绪主观宣泄往往是所谓“网左”群体弥漫的毛

病。很多时候引人嫌弃也都是因为这类同志完全无法做到不将生活中麻烦和压迫导致的脾气带到严肃的政治讨论里，最后能说成的说不成，能讨论的讨论不下去。

我们学的理论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只有实际行动中，和其他同志的交流中，能正确运用才是学会的。良好的态度是政治讨论的润滑剂，持久的耐心是争取革命者或群众不可缺少的反应酶。只有我们意识到任何辩论或者讨论不是给自己嘴硬或者捍卫那所谓自尊的地方时，我们才能让这个讨论为革命服务，产出我们有利于推进事业的结论。脾气爆或者“说话直”（指的不是论点清晰，而是语言辱骂且缺乏论述）不是个人特点，是个人缺点。革命组织不是给任何一个革命者撒野的地方，这里大家必须按照集体的方式进行讨论和工作。

到这里我想要问所有同志：你参与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想来当门学科学习的，还是个人生活中存在诸多不顺想来发泄情绪的，还是闲暇之余当作一种社交或者爱好消遣的？我希望同志都不是，如果是，我希望同志能理解我全文贯穿的“有问题咱就改，有不足就纠正”的思想。我们干革命，是意识到了资本主义体制已经无路可走，成为了“灾难的再生产”制度，在如此发达的生产力背景下仍然造成了无数的不幸与压迫，阻碍了人类情感、文化、艺术、科学等等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并屠杀生命、摧毁地球的腐烂体制，作为意识到的人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奉献一切去将它彻底清除，建立起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世界。这应该是我们的出发点！

所以，还在干等什么？组织起来！

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与策略

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现在很多心急的革命者认为，在中国组织一场新的革命早没有历史里那么合适的条件了。在这里，他们担心的不是客观物质条件，因为没有人会认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相比于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经济殖民地和农业国“更不可能进行革命”；他们说的是，中国工人阶级主观心理和反抗的意愿远不如以前了：大家都能吃饱饭，基本的需求都被满足，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永远塑造不起来。因此这批革命者采取了一个战术：现在不应该为工人阶级争取更好的待遇，反而要刺激、等待反动派加大自己的压迫，这样工人急眼了就会自动会革命。

这是一种极其机械且有害的思考方式，仿佛工人阶级只有在走头无路、就要饿死前才能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属性并被组织起来。俗话不假，官逼民反、狗急跳墙；但历史上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只会极端的压迫和赤贫下诞生，很多时候往往会在经济发展、社会改良后蓬勃发展。比如说俄国 1905 年后的白色恐怖并没有让工人阶级变得更革命或者增加他们的士气，反而让绝大多数人在恐惧中固守自己仅剩的一口气，对政治采取了完全的无感。相反，是 1910 年后的经济发展重新让阶级斗争浮上了水面。

这是因为，工人如不出卖劳动力就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存。在没有尝试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之前，他们不可能开展自我解放运动。右派讽刺左派时说，你们要推翻资本主义，却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电脑在表达这些观点。这种可笑的思想以一种隐藏的方式渗透进了共产主义者的队伍里，有人同理认为，工人不仅不该为提高待遇斗争，还不能以任何的方式“支持”资本主义，比如购买市场里的任何商品或给哪一个资本家一分钱，“网易云音乐剥削，给它充会员就是反革命”。这是可笑的，工人用货币工资购买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的关键因素，这个过程肯定会在工人的意识上产生某种影响。工人阶级得出必须推翻资本主义的结论、形成集体的阶级意识是不可能从石头缝里跑出来的，只能是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日常参与中得出的经验总结而来的。阻碍或旁观工人为争取更高的工资而斗争显然不是答案。就像马克思所看到的那样，**工人阶级如果太贫穷就没有士气推翻资本主义。**

另一方面，工人同时也是生产者，他们在工作场所承受着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从一开始，**工人运动就不单是为了维护和增加实际工资而斗争，同时也要求缩减每周工作时间和建立某种控制劳动过程的形式。**他们这么做，便没有帮助资本主义再生产，便是不仅在客观上，也是越来越自主地向资本主义提出挑战。作为敢于维护自身权益的消费者，工人可以与资产阶级社会在一条战壕；作为顽强地反抗从他们身上榨取一定量剩余劳动，甚至反抗榨取剩余劳动的人为结构的生产者，工人便不可能与资产阶级社会诉求一致甚至没有矛盾了。他们动摇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很明显，在这种斗争中，工人群众会逐渐形成阶级意识，**而所谓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是工人们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阶级，有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并意识到自己应该作为一个整体行动。这种行动的最后结果，就是工人民主专政的实现。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我们理清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会在什么客观环境下发展。那么，工人阶级又是又谁进行塑造呢？很多现在投身于工厂的融工者说，这个阶级意识只能由革命者从外部灌输进工人阶级。根据列宁所写的《怎么办》中的看法，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会来自他们自身，也就是说，列宁不认为工人阶级可以自己“造出”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阶级意识。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所处的环境使他们没有很多时间去思考、学习，真正能有效并广泛提升他们的意识的行为只能是实践，即罢工斗争、游行示威等，而这导致工人群众能产生的最高思想意识是工联主义。工人阶级真正正确的思想意识，即马克思主义，却要资产阶级中或是小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来“创造”。

这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一群人不参与直接生产，吸取并改造资产阶级创造的一切知识体系，工人阶级就无法获得一个科学的纲领，就无法把革命进行到底。**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工人革命家，马克思出生于条件还不错的律师家庭；恩格斯不用说，他为了马克思一家的生计还当过资本家；罗莎·卢森堡出生于一个相当富裕的、有文化的中产阶级犹太家庭；列宁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托洛茨基出生于一个犹太富农家庭；毛泽东出身于中农至富农家庭……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由知识分子从外部启发和“灌入”的。我们在《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也说到：

“在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运动没有能力建立与其敌人旗鼓相当的战略地位。这并不是说工人阶级只能听从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自上而下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不是来自天国的福音。革命意识欢迎工人阶级自发的创造能力，如工人在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下，形成各式各样的组织和机构。而是说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靠道德权威和理性讨论吸引并团结了无产阶级，他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无产阶级内部对行动的反思和推理，全部推演的成果又作为政治宣言，丰富实践的层次和范围。”

但是这只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后来1905的俄国工人运动让列宁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在《莫斯科起义的教训》（1906年8月）一文中表示：

“起义是自发的，斗争形式也是自发的……但自发性并不排斥计划性。相反，在革命时期，群众的直接行动会创造出最丰富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我们的任务就是认清这种自发性，将其转变为有组织的运动……党必须学会在起义中领导群众，而不是落后于他们的自发斗争。”

在《关于 1905 年革命的报告》（1917 年 1 月）中，列宁进一步阐释了他的观点的改变：

“工人阶级的直觉比社会民主党的理论预见更早地指向了武装起义的道路……群众在 1905 年以惊人的速度掌握了斗争形式，从罢工发展到街垒战。”

从列宁后来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列宁认为自发性是起义的起点，但强调需要一个工人政党通过灵活策略，才能将自发行动转化为有组织的革命。

工人群众的自发行动也可以取得非常大的成绩，如巴黎公社、1905 年俄国革命、匈牙利 1956 年革命、法国五月风暴、葡萄牙 1974 年革命、1988 年巴勒斯坦大起义等。（这些事件可以证明**工人阶级是本能的倾向于进入更高社会形式——共产主义的**）生产性工业的生产力提高、价格和利润率下降，商品的繁荣，这些的确或许能短暂迷惑一下工人阶级，正如今天也有人认为只要核聚变发电进入应用阶段，无限的清洁能源就会让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有希望、不需要革命、只需要资产阶级给自己一点残羹剩饭就能活得很滋润。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然没有变。如今甚至可以说多数人都买得起智能手机，可以随时随地直播、娱乐，这比马尔库塞说的“买凯迪拉克、打扮得和雇主女儿一样”不知道有趣了多少，互联网真是太精彩了，但是玩手机能当饭吃吗？当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失业到来时，即使免费的电还能做什么呢？难道这些电就可以满足所有失业者的一切生理需求？不只是经济衰退，就是经济上升时也是同样的，关键不在于穷还是富，而是客观环境的剧烈变化带来意识在经济政治层面从保守到激进的变化。

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抱怨工人意识如何。认为革命者的全部工作就和宣传机器一样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意识水平，才能号召长期停滞、丧失革命性的工人阶级重新进行经济政治上的运动、斗争乃至推翻资本主义的想法把事情颠倒了。这根本不需要额外的“推动”，工人自己的意识就是会在事实的推动下导致革命发生的——很多时候向工人做革命宣传的不只是革命者，更是反动派，就像让很多“兔兔”清醒过来的转折不是“境外势力”的渗透，而是祖国母亲和社会的铁拳。

在革命时期的很多时候，工人群众比工人先锋队还要激进。当然，这和工人政党的存在是毫不冲突的，因为即便是在最广泛，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工人斗争中，工人群众也很难对斗争任务获得决定性深入的理解，或者只是获得一些非常有限的理解。对于追求工人自我解放的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真正的任务在于把自己组织起来，并在工人阶级内部宣传他们的思想和目标，同时以无比的热情、忠诚和清醒投身到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的斗争中去，以激发工人群众的自我能动性和自我组织。历史证明这一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可行的。正如列宁说他所倡导的组织除了与‘自发起来斗争的真正革命的阶级’相结合外，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结论是：思想意识上的真正矛盾只有在实践中，通过实际的阶级运动的发展，才能求得解决。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的先进形式，以及更高水平的阶级意识的相应形成，有利于将群众行动转化为对资产阶级秩序的直接挑战，但是建设一个先锋队式的党，是走向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基本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根据革命意识把革命队伍内部分成这几个阶层：**革命核心**（一般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排除有真正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先进工人**（在每一个工厂、每一个街区，都有一些非党的工人积极分子，他们实际上在发挥先锋队的作用……党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先进分子，通过他们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工人群众**（这个阶层还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相对先进的部分，一个是相对落后的部分）。把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提高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水平，在先进工人中培养真正的政治领袖，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并把他们组织成一个集中的、纪律严明的政党是我们的任务。**革命核心和先进工人构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先锋队并不等于一个单一的政党，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当中的先进部分和效忠于工人阶级的各背景的共产主义者。它们没有独立于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指出整个工人阶级的共同利害，并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列宁还指出：**

“如果共产党真正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就应当学会把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为数不多的（最初是极少的）具有高度觉悟、忠诚、勇气和牺牲精神的优秀工人，同他们周围的、逐渐提高到他们的水平的广大工人群众结合起来。……党必须善于把无产阶级中所有优秀的、忠诚的分子都吸收进来……同时必须通过斗争和教育，把愈来愈多的工人提高到先锋队的水平。”

工人政党不能依靠行政手段控制群众来进行领导，**工人政党本身就是从工人运动中生长出来的**，它们通过**引发群众对现实有进一步认识、理论说服**实现领导。革命和解放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小撮人对大多数人的恩赐，因为革命和解放本质上就是**针对群众自己来说的**。如果群众不去真正参与解放自己的运动，他们就永远不可能对解放取得正确的认识，也不可能在“革命”后明白如何自己管理自己，而革命和解放的目的之一是要群众自治。

革命核心、先进工人和工人群众的行动逻辑和意识形成也是不同的。革命核心是先有意识，再因为意识的指导而去实践，并通过实践获得经验，随后再实践，再获得经验。工人群众是因为客观环境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从而进行自发斗争或是由工人组织领导的斗争，即实践，随后获得经验，并通过经验获得意识，然后根据意识继续实践。先进工人则是在实际工人运动中或者是对于社会状况的认识而获得经验，进而总结思考获得意识，随后参与实践。

工人阶级的党的建立就是革命核心的意识与先进工人的意识的结合的过程。革命的准备阶段的成熟是工人群众的斗争与先进工人的行动的融合。一个革命形势（即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只有在先锋队的意识和工人组织已经形成，先锋队和工人群众的行动结合在一起时才能产生。对广大的工人群众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矛盾所产生的初级的阶级斗争总是由于最迫切的物质需求而被激化。这样，工人群众的斗争发展为革命斗争就不只是一个量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质的问题。这需要在工人群众内部或者在工人运动内部存在一个足够进步的工人群众，在他们已经达到的觉悟的基础上，这些先进工人能够推动群众运动向着以挑战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方向发展。这也强调了革命长期的艰苦的准备的极端重要性（办报社、散发不定期传单、游行示威等方式宣传革命），在传播革命方面受过训练的先进工人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以及有一个革命的工人组织的重要性。因为只有这样的工人组织才能根据客观的历史条件和广大劳动群众主观需求制定出容易理解的革命纲领。只有在这些因素都结合起来时，一个成功的革命才是可能的。

革命政党一定会腐化吗？

上述理论中目前最有问题的便是先锋队理论。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表现了各种工人政党和工人国家的内在问题，从而让人怀疑工人政党甚至是工人先锋队是不是有独立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因为很多工人政党和工人国家的“群众代表”都体现了很强的自主性，并做出了很多违背整个工人阶级利益的事。这些机构的自我保护就成了目的本身，而不是达到目的（即共产主义的实现）的手段。受莫斯卡和帕雷托“精英循环”理论的启发，罗伯特·米歇尔斯提出了一个影响所有政党的寡头统治的“铁律”；另一方面，就在第一国际与巴枯宁斗争时期，无政府主义者发展出了一套类似理论，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被各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反对派（如德国人约翰·莫斯特，他后来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所接受。这两种传统都强调党的领导不可避免地具有“独裁”特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潘涅库克和戈尔特周围的KAPD和“委员会共产主义者”都这样认为，但是之后道路出现了分岔，至少有一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还有“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强调群众运动和组织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而帕雷托-米歇尔斯学派则声称工人阶级群众自身没有能力完成自我解放。

工人运动和革命党中的官僚化问题是从全日制干部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据常设机关的中上层职位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只要常设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包括但不限于工人学校、工会、政党）还仅限于一些小组，还不存在机关和全日制干部，这种现象也就还不存在，至多是有一个如何处理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关系的问题，后者是来帮助创立还处于萌芽状态中的运动的。很多业余性质、没有全职工作者的革命小团体、报社内斗时将彼此称为“官僚主义”因此也是危言耸听的，这顶多就是个人主义、办事作风和社交品质的问题。

但是，如果没有全日制干部和职员，那么任何群众性组织、工会或政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仅凭志愿劳动是不可能收集和集中管理几百万会员的会费的。机关的发展使工人组织具备了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社会分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被安排从事生产劳动，而文化的生产和吸收以及积累的职能，则几乎为其他社会阶级和阶层所垄断。后一种劳动的性质（这种劳动非常消耗体力，而且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决定了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能够获得和吸收最先进的科学知识，或者在生产和直接的物质消费活动以外持续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因此，**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工人阶级通常是处于文化欠发达的状况。**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随着由专业干部组成的机关的产生（这些专业干部的专业知识对于弥补现代工人阶级的文化欠发达是不可或缺的）就出现了工人组织自身分裂为执行不同职能的不同阶层的危险。**专业化会导致日益增长的对知识的垄断和信息的集中。**知识就是力量，对知识的垄断将会导致对群众更深刻的统治，所以，官僚化的倾向如果不受阻止的话，将会导致出现在新的统治者和被统治的群众之间真正的分裂。

如果我们认为群众性工人政党的彻底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等于同时假设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迟早会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至少永远停留在一个低水平上。显然，与官僚化问题相比，还有更多的问题事关重大。整个现代工人阶级的命运以至于整个人类的命运都与此相关。因为，如果工人阶级不能自我解放，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最多也只能依靠对资本主义不断改良来实现解决社会问题的需求，但是从历史和可以预测的以后来看，资本主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灾难，而且也由于自身固有的特点实现**灾难的“再生产”**。单靠改良不能阻止希特勒上台，也不能堵住通向奥斯维辛和广岛、长崎的道路，而这种改良也不能彻底消灭极少数人占据极多资源并且鼓吹注意气候变化、保护环境、勤俭节约的现状。长此以往我们势必逃脱不了野蛮状态或自我毁灭的命运。

因此，如果像无政府主义者和委员会共产主义者那样只将注意力放在政党的特殊性上的话，那么实际上便是在回避这个问题。工会，包括由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领导的那些工会，在群众运动衰退时更加容易官僚化，而且官僚化的速度更快。苏维埃组织也一样。事实上，**革命政党抵御这一趋势的时间通常最持久**，这部分地是因为它的大多数成员积极持久地参与运动，部分地是因为它对这一危险更加清醒。



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例子：乌克兰马赫诺运动（1918-1921）通过“自由苏维埃”实现农民自治，但在白军压力下被迫建立常备军。到1920年，军事委员会逐渐垄断决策权，马赫诺本人虽坚持反权威立场，但组织结构已出现等级化倾向；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CNT）作为无政府工团主义代表性工会，在1936年内战初期曾创造工人自治的奇迹：巴塞罗那80%企业由工人委员会管理，工厂实行集体决策制。但随着1937年共和政府加强集权，CNT被迫加入政府机构，其领导人加西亚·奥利弗开始接受政府职位。到1938年，CNT中央委员会已蜕变为官僚机构，基层自治被自上而下的指令取代；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后，德共（斯巴达克同盟）虽转入地下，但通过工厂细胞组织保持活力。1925年曼努埃尔斯基报告显示，德共65%成员定期参加理论学习，基层组织保持每周会议制度。这种持续的思想建设和组织生活，使德共在1929年经济危机中能快速动员50万失业工人，而同时期德国工会已完全被社民党官僚控制。

归根结底，只有摒弃简单的黑白划分，并用对具有矛盾和相互结合的各种过程的辩证理解，才能正确地提出并解决问题。可见，**形式民主≠实质平等**，“自治”的口号无法自动消除权力集中，配套措施（如指令代表制、轮岗、基层罢免权等）不可或缺，否定一切权威可能走向反面——无序催生强人，关键在建立受控的、可问责的权威形式。**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低潮的官僚化倾向确实不可避免，就像群众运动的周期性衰退那样**，但是群众运动周期性的

高涨同样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矛盾的不可避免的产物：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它以革命行动的形式爆发。

这一过程越是展开，官僚化的趋向就越有可能被制止，在官僚化早期所产生的后果就越可能被扭转。20 世纪中存在过的具体例证是：

1. 德国 1917-1920: 工人士兵委员会在革命中建立, 推动工厂自治。社会民主党镇压左翼后, 委员会被纳入议会制, 导致民主化尝试失败;
2. 意大利 1917-1921: 工厂委员会运动(都灵)由工人直接管理生产。但是后被法西斯镇压, 导致工会官僚与资本妥协。1969-1973 年间, “热秋”运动导致工人占领工厂, 通过基层议会争取工资与劳动条件自主权, 倒逼工会激进改革;
3. 比利时 1956-1962: 大罢工中工人成立行动委员会, 挑战传统工会官僚的权威。罢工失败后工会改革, 部分吸纳基层参与工会;
4. 捷克斯洛伐克 1968-1969: 布拉格之春期间工人委员会尝试企业民主管理, 但在苏联派兵镇压被扼杀;
5. 智利 1970-1973: 阿连德执政时工人建立“生产委员会”, 接管停工企业, 但皮诺切特政变后遭血腥镇压;
6. 葡萄牙 1974-1975: 康乃馨革命后工人委员会接管工厂与农场, 士兵委员会挑战军政府, 但革命失败后民主化进程中断;
7. 波兰 1980-1981: 团结工会通过全国罢工委员会实现工人自治决策, 独立于党国体系, 军管后转入地下持续抗争;
8. 巴西 1985: 民主化过渡中“新工会运动”(如 CUT)突破国家控制工会模式, 推动基层参与决策和直接行动;
9. 法国 1934-1937: 人民阵线时期罢工工人占领工厂, 迫使资方接受带薪休假等权利, 但是工会短暂激进化后被政府收编;
10. 美国 1934-1939: 大罢工浪潮(如明尼阿波利斯车队罢工)催生产业工会, 打破行业工会官僚垄断, 后遭麦卡锡主义清洗;
11. 阿根廷 1973: 总工会(CGT)与庇隆主义结合, 工人参与社区管理, 但庇隆死后工会官僚迅速转向威权合作;
12. 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 改革后期工人俱乐部和罢工委员会涌现(如库兹巴斯矿工), 要求经济民主, 随苏联解体进程中断。



最终，工人组织官僚化的原因就可以概括为这段话：**当工人群众越来越消极的时候，即他们不能积极地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从事革命的工人组织为了保证在下一次运动能有更好的基础和条件而尝试保存自身，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组织拜物教（即认为自身的保存和自身对于工人的领导成了最终的目的），从而导致官僚化。**但是这丝毫没有证明，在先进工人的活动不断增长的时候，革命组织不是带来解放的有效工具，尽管他们的“独断”可以而且必须被阶级的独立活动所限制（或被它的先进部分）。这也没有证明，在工人群众消极时，工人组织就一定会官僚化，**事实证明工人组织在群众消极时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避免彻底的官僚化的。**革命组织是发动革命的工具。而且，没有广大工人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活动，工人革命和防止工人组织官僚化是不可能的。事实证明因为过去的一部分经验而推断出列宁的先锋队

理论只会带来令人失望的官僚化的工人政党或是极权主义的工人国家是武断的，且不符合实际。

以集中化的工人组织有可能官僚化为由而摒弃一切这样的组织是一种拒绝科学的做法，他们就像是看到了现代医学有可能把人治死，就要求退回传统的巫医方法治疗病人。不管主张这种观点的人是怎样看的，**这种退回到原始状态的做法从根本上排除了工人自我解放的可能性，因为工人的自我解放只有在社会整体的水平上才能实现。**至少有一些反对任何工人组织的理论家们按照他们自己的逻辑最终将他们自己与资产阶级社会一体化了。同时我们并不把民主集中制中“集中”这个词首先看作是组织上的问题，而且它也丝毫不是作为行政手段所必需的。它是一种政治原则。“集中”到底意味着什么？集中是经验的集中、知识的集中和对实际斗争的总结的集中。倘若没有这种集中，我们就会再次碰到一种工人运动的巨大威胁，这便是部门片面化和陷入分裂的危险，这种危险使任何人对有效行动的问题都不能得出充分的结论。

如果妇女只参加女权主义的斗争，如果青年只参与青年人的斗争，如果学生只参加学生运动，如果移民只忙于移民的斗争，如果被压迫民族只参加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如果失业者只参与反失业的斗争，如果工会成员只参加工会斗争，如果工人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只忙于选举活动或出版报纸，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各自为战，他们就只是在非常有限的和零碎的基础上进行活动，从各自的经验中他们也得出不出正确的结论（从认识论上来说）。他们只有局部的斗争，零散的经验 and 片面的认识。你甚至可以先验地说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完全正确的。他们不可能对现实有全面的和总体的正确认识，原因是他们只能看到现实的一部分。这就是“集中”的全部内容。这意味着至少，各个国家以及世界范围内的那些受剥削、受压迫和从事实际斗争的优秀分子走到一起将经验汇集起来并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把这些经验教训做对比，据此用批判的方式对他们每个阶段的纲领和政治路线做反复的检验，以达到对整个社会、世界及其发展动力以及如何实现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全面认识。既然阶级意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阶级的活跃水平也是不平衡和间歇性的，那么上面所说的就不可能由群众作为一个整体来做到。那种想法只不过是民粹主义的幻想罢了。

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时刻保持原则么？

谁都承认，列宁是古今革命者中最看重原则的一个，他处处不忘原则，事事从原则出发。然而他却主张在革命斗争中我们不能不“**采用机动手段**”，即毛泽东所说的“纵横捭阖”手段；他承认应该利用敌人中间的利害关系，哪怕是暂时的矛盾。他还要我们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暂时的、不稳固的、动摇的、有条件的）有时通融一下，有时妥协一点。列宁不但这样主张，而且也在事实上实行了的。诚如他自己所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全部历史中，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都充满着它对其他政党，其中也对资产阶级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的事实。”列宁采取“机动手段”时，总是十分勇敢大胆的，以致让许多“坚持原则的、清白的”革命者惊惶得瞠目结舌。最鲜明的例子有如：1917年二月革命后，为了要参加革命，不怕那些庸人俗子骂他“俄奸”，决定接受德国军方的提议，坐了“密封火车”经德军占领区回到俄国。再如，为了要让俄国革命获得喘息时间，他竟排除党内党外的一切反对，坚决与德国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这些例子表示了什么呢？它们表示了：最坚持原则的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可以是而且必须是善于应用机变手段的人。有了前者而没有后者，至少好像是定了方向而不真实地踏上道路，那是永远抵达不了目的地的。

那么，是否任何道路都能到达目的地？是否只靠“纵横捭阖的手段”，没有正确的战略大计，或根本没有这种原则性的方针，也一样可以促成革命胜利呢？为了革命胜利，革命者可以无所不为吗？



布列斯特 - 立托夫斯克协议签订现场

当然不是的。“条条道路通罗马”，却不是**任何手段都能帮助革命成功**。“为目的不择手段”这个耶稣会派的格言，并不能应用于革命政治中。对革命言，特别是对社会主义革命而言，目的与手段是相互辩证依存的。**必须是何等样的手段，才能达到何等样的目的**。有些手段使目的接近，有些手段使目的远离。有些能达到目的，有些却能断送这个目的。完全相同的手段，只因采取时候的主客观的条件不同，以致在不同时候它可能是对革命的很好服务，也可能是对革命的最坏叛变。关于这方面，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里举出过罢工中的妥协为例。

“一种妥协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罢工者储金涸竭，没有外方援助，饥寒交迫，困苦不堪），这种妥协丝毫不伤于接受妥协的工人们之矢忠革命的精神，以及他们准备将来斗争的决心，另一种妥协是叛贼的妥协，他们进行这种妥协，表面上也借口客观原因，而实际上却是贪图私利（破坏罢工的工贼也缔结“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效劳，屈服于资本家的威吓或劝说，或为资本家方面的微利所诱，甘言所惑。”列宁还说过：

“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形，使人们要费极大力量，才能正确地决定某种‘妥协’的真实性质，——如在有些杀人案件中，很难断定这种杀人行为，究竟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行为（如必要的自卫），抑或是不可饶恕的粗野举动或甚至是精密布置的谋害。

在政治上当然有时因各阶级和各政党间的国内和国际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的缘故，所以有许多事件，若辨别起来，较之辨别罢工时的合理‘妥协’，或者是工贼及叛徒领袖等等背叛阶级的‘妥协’的问题，要困难得多。”

当那些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特别是列宁，采取“机动、通融和妥协办法”的时候，不论任何时候，或任何条件中，总抱着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借此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精神、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一般水准，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准。**”列宁认为这乃是“全部问题”之所在。所以当他应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时，不管其暂时的与立即的原因是为了它能损害敌人，或为了它能保全自己，或为了环境所迫无法不作的屈服，或为了避免一场形势显然于己不利的战斗，或为了使主要敌人孤立而对次要敌人让步，或为了要并力克敌而与某些动摇势力联盟……不管为了什么，他们心目中却始终树立着这样一个标准：**这样做会使工人阶级（国内的与国际的）的觉悟性及革命性提高呢，还是降低？怎样做可以提高？怎样做便会降低？**这样的问题永远在列宁心中占据第一位置的。当他采用一个手段时，首先他总要问：**它对工人阶级（包括全体劳苦大众）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应如何借此进行教育？以便提高他们的革命觉悟？**如果说，有一个手段，应用起来可以收得一时之利而却会模糊或甚至降低工人阶级觉悟的，他就决不采用。列宁是绝对主张用一切手段来打击敌对阶级的，但绝非毫无条件。倘能加害敌人而同时足以瘫痪革命者意识的手段（如个人恐怖之类），他就坚决反对，倘能欺瞒敌人但同时亦欺骗本阶级的那些手段，他更是绝不容许。在这方面，列宁的态度是大胆与精细相结合的最佳范例，是原则与手段决不割裂的最好榜样。

就拿我们上面提过的两件事来看吧。二月革命以后，亡命在瑞士的列宁，因为急于要回俄领导革命，而回国路程，除了取道当时与俄国处于交战状态的德国国境之外，别无它法，于是列宁便勇敢地向敌人申请过境，与敌人缔结条约，坐了“密封车厢”回去；但同时，一方面为了堵塞俄国政敌们诬蔑之口，另一方面（亦即主要的方面）要消释国内外无产阶级对于此事的疑虑，于是在动身之前，在瑞士邀集了几个外国革命家：法国的劳里奥与吉尔波，德国的保罗·雷维，瑞典的泼拉顿以及瑞典的左派代表，共同草就并签署了这样一份宣言：“俄国的国际主义者，他们……现在正要动身到俄国去，以便在那里献身于革命事业，他们将帮助我们唤起别国的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的无产阶级，去反对各自的政府。”列宁等借道德国，答允交付的代价仅仅是坚持释放同等数目（三十人）的非军事俘虏，他绝对不曾在事实上或形式上对德帝国主义者作丝毫让步。

布列斯特和约的情形则更清楚，为了俄国革命正处于无法作战的情况中，为了要取得喘息之机以待世界工人阶级，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及时起来，因此俄国工人政府不得不暂时屈服于德国强盗的军事勒索之下。这个立场、这个说法，非但在对内解释和对外宣传中不折不扣地明言实讲，而且在正式谈判的议席上，也不许任何外交辞令掩盖了那个痛苦的真相。因此，俄国革命的此一“屈服手段”，非但不曾降低了国内外工人阶级的觉悟与斗志，反而将它大大提高了。

毛泽东曾经取笑不懂策略的革命者说：“和蔡廷锴握手，必须同时骂他一声反革命。”按照这个的意思，跟那些原来反革命的暂时同盟者妥协，就必须至少在形式上要做出客气姿态，必不能揭人家的疮疤，一定要亲善尊敬。和蔡廷锴握手的时候，纵使不称他为革命者，至少得叫他一声亲爱的朋友，在人前表示一下亲热。其实，这态度与列宁态度根本相反。依照列宁，当我们有必要和蔡廷锴或蒋介石握手之时，我们的责任必须同时**以加倍力量告诉工人阶级以他或他们的反革命本质和原形，并向他们解释目前为什么要同这些敌人暂时妥协**，以此提高而非降低本阶级基本革命群众的觉悟与斗志。如果照毛泽东的做法，一旦有必要与可能和反革命者“握手”，那就必须做得亲亲密密，非常“老友”，那么试问劳动群众看了这个

表演将作何感想呢？知道蔡廷锴或蒋介石过去的人会发生莫大迷惘：究竟蔡、蒋进步了还是共产党退步了？不知道蔡、蒋过去的人则自会因此而相信他们真是很好的革命者。无论前一感想或后一感想，总之都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众的觉悟与斗志的。而且，这种态度就意味着**把群众排除出政治**，并认为**革命家可以完全代替群众做决定**，而群众不需要问为什么，也不需要现实进行批判性思考，群众就只管遵守命令就可以了。而这就是中国革命留给我们一个必须不盲从，要吸取的教训之一。

革命的斗争步骤与形式

上面我们已经论述了工人阶级若是想要革命成功，那么就需要工人先锋队组成政党来领导革命。那么一个成功的工人革命是怎么样走向**建立政权**的呢？

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工人的自发斗争，以及一些知识分子或先进工人先学习理论，然后写文章进行宣传。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工人党一开始基本上都是由先进工人、知识分子和革命学生组成最初的胚胎，因为党是工人运动的直接产物。在党处于胚胎时期，其成员的任务就是学习并宣传（即与人辩论、写文章和书籍、办网络报纸和杂志，甚至线下报纸和杂志），而不能将主要精力用于靠“融工”的手段扩展到工人群众中并领导工人从事改良斗争，因为不仅客观上缺乏能力这种尝试会变成一种拙劣的模仿，这会使得宣传工作无法正常运，比如为了宣传而收敛批判性质，这就导致容易落入改良主义。

这并不代表集中全部精力办报社或者读书会式的路线就是正确的。这种理论家高傲的小圈子，一定程度上都比不上鲁莽的融工者，因为后者尽管缺乏思考和计划，却仍有直率的赞扬的勇气和行动的能力。这些理论家停留在舒适圈太久，如果任何人想要让他们动起来，总能编出一万个借口说明不是自己害怕、没能力进一步推进工作，而是“客观政治环境不适合”的问题。这种人就在古书里做着自己的革命大梦，等哪天亲爱的自由主义者兄弟们推翻了中共创建了一个更为“安全”的政治环境后自己再露出头来，用“先进的理论”一夜见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

革命者自己一盘散沙的状况下，不存在“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带领工人阶级革命”。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和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向群众进行宣传和号召，也不是大开读书会研学理论，而是这两种手段应该作为我们的方法，用来统一服务于一个目标：统一起革命者、先进工人的力量，建立起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党，填补运动整个领导层的空缺，并在建设革命党中发动先进工人走进群众向群众宣传，组织理论教育培训干部。不能让成立党的手段取代了成立党本身成为了我们的目标。不能在手里没有斧头时想要空手砍倒树木，也不能静等着手里的斧头凭空变出来。

关于一个政党该怎么样设计党的制度，列宁有以下见解：

“在根本上，当然，它们的成功是由于，工人阶级——其最优秀的代表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出于客观的经济原因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其他阶级相比拥有更强的组织能力。没有这个条件，一个职业革命家组织将仅仅是，一场游戏、一次冒险、一个单纯的招牌。《怎么办？》反复强调了这一点，指出它所倡导的组织除了与‘自发起来斗争的真正革命的阶级’相结合外，没有任何意义。……尽管有分裂，但是社会民主党能够早于任何其他党利用暂时的自由去建立一个合法组织，这个组织具有理想的民主结构、选举结构以及根据组织起来的成员人

数形成的会议代表制。”

列宁又表示：“工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应当是统一的，但是，在这些统一的组织里，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方面，在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的反对派的权利方面，在每个党组织的自治权方面，在承认党的一切负责人员必须由选举产生、必须报告工作并且可以撤换等方面，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在党的纲领原则的范围内，批评必须十分自由……不仅在党的会议上应该这样，而且在公共会议上也应该如此。”



对于一个严肃的革命党，而不是中国几十年千千万万起个响亮名字的革命者小圈子，现在我们称呼的“组织”们。当多数意见通过民主程序形成决议后，全体成员就必须严格服从，中央的权威也应该被尊重，正如《怎么办？》指出党组织必须保持“统一的行动能力”。地方党组织享有自治权，但也必须服从中央的最终决定。但是必须保障一般党员有真正可以随时罢免任何干部的权力。**维持这个组织运行的，必须是民主集中制而不是个人关系、情感和熟人小圈子；统一这个组织思想的方法，必须是通过教育和讨论达成统一的政治理解，而不是用行政、组织手段强加思想于成员之上；这个组织要名副其实，则必须是建立在严肃的、专业的革命者上，建立在优秀的革命干部之上。**

一个政党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政党不是因为一个组织自认为是政党，而是因为这个组织在它代表的阶级中有着一定数量的支持者。但是在一个组织还没有组成政党时，也可以领导工人从事斗争。在革命时期尚未到来时，工人组织或者工人政党也可以从事斗争。具体内容是宣传和改良斗争，即为争取群众的直接利益（如拖欠的工资、工资水平、工作时长、男女同工同酬等）和对群众有利的政策（如政治权利在法律上的保障、社保体系的完善、取消就业歧视的法律条文等）。列宁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过一句话：“**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那里去工作。**”我们也可以说，**什么事可以提高工人群众的革命意识，就干什么事。**这便是工人先锋队的行动指南。这意味着工人组织的成员有的时候还去参与反动工会、议会甚至国会。原因很简单，有的时候群众的注意点就在这些地方，在这些地方最能取得群众的关注，而这丝毫不与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矛盾。等到多数群众对这些机构失去信心，工人先锋队就可以尝试鼓动群众组织自己的代表议会（即苏维埃）。

反对改良主义不代表反对改良斗争，因为改良斗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手段之一。而改良主义则是把这个手段当成了唯一的手段甚至是目的，所以他们错了。只要资产阶级国家一天没有被打碎，资产阶级就可以继续使用他们在社会上的势力来反对工人阶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算计着：‘只要我还拥有土地、车间、厂房和银行，只要我还拥有报纸、大学和学校——最重要的，只要我还控制着军队，无论你们如何改组民主的机器，它将仍然服从我的意志。我在精神上征服了愚蠢的、保守的、懦弱的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都在物质上臣服于我。我通过我的建筑物、我给的好处、我的计划和我的罪行压制并将一直压制住他们的想象力。在他们不满和小声嘟囔的时候，我就会制造数十个安全阀和避雷针。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召集反对党派，他们明天就会消失，但今天却会完成自己的使命，使小资产阶级能够在不损害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表达愤慨。我将用普遍义务教育制度束缚广大人民群众，让他们在完全无知的边缘徘徊，不让他们有机会把知识提升到我们的精神奴役专家认定的安全水平之上。我将腐蚀、欺骗并恐吓无产阶级内部的特权分子和落后成员。我同时利用这些措施，只要还掌握着必要的征服和恐吓工具，就能阻止工人阶级先锋队掌握大多数人民的意识’”

由此可见，改良主义是不可能胜利的。

有的人可能认为，这些改良斗争会导致群众误以为资本主义下可以通过改良主义的方式走向美好生活。因此除了单纯的宣传和武装暴动外，工人组织不能从事其他任务。但这只存在于理论上，实际上没有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罗萨·卢森堡和列宁都注意到了群众斗争对他们革命意识的提高有着辩证的联系。（可参考卢森堡的《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改良斗争会为群众直接展示他们的力量是多么强大。**

在1937年芝加哥“阵亡将士纪念日大屠杀”的硝烟尚未散尽时，美国产业工人联合会（CIO）已将目光投向华盛顿的国会山。这种从街头抗争到议会游说的转变，标志着美国工人运动完

成了历史性的政治蜕变。罗斯福新政时期，工会领袖们意识到单纯的经济罢工难以撼动垄断资本的权力结构，转而通过政治献金、立法游说和选举动员，在民主党内构建起强大的劳工派系。这也使得汽车工人联合会可以在1950年代推动《公平劳动标准法》修订。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期间，学生运动与工人罢工的意外合流，催生了法国总工会（CGT）与法共的政治联盟。当罢工工人占领雷诺工厂时，他们不仅在要求提高工资，更在车间墙壁上书写“想象力夺权”的政治口号。这种将经济诉求与意识形态斗争相结合的策略，使法国工会成为左翼政治不可忽视的力量，直接推动了1981年密特朗社会党政府的上台。德国金属工业工会（IG Metall）的演变轨迹更具制度性特征。这个拥有230万会员的欧洲最大行业工会，通过企业共决制将经济斗争转化为制度性权力。在监事会席位争夺中，工会代表熟练运用《共同决定法》赋予的法律武器，将生产领域的议价能力延伸至企业治理层面。



1987年韩国的六月抗争期间，现代重工的工人们突破“企业共同体”的意识形态束缚，将提高工资的经济诉求与废除独裁统治的政治目标相结合。全斗焕政权倒台后，韩国民主劳总（KCTU）的成立标志着劳工运动正式登上政治舞台。这个拥有百万会员的工会联盟，不仅组织罢工，更推举工人代表进入国会，直接参与《非正规劳动者保护法》的修订。南非矿工的斗争史更是堪称反种族隔离运动的缩影。1982年马里卡纳铂矿罢工中，挥舞铁镐的黑人矿工同时举着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旗帜。全国矿工工会（NUM）巧妙地将提高矿工待遇的经济诉求，与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政治目标捆绑，使矿区成为解放斗争的前沿阵地。曼德拉出狱后，工会领袖西里尔·拉马福萨转型为政治家的人生轨迹，正是这种政治升华的生动注脚。印度茶农的抗争揭示了殖民地工人运动的特殊形态。在大吉岭茶园，采摘女工们

的“工资运动”始终与反殖民斗争交织。1942年“退出印度”运动期间，茶园罢工既是要要求改善工作条件的经济抗争，更是对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政治宣言。独立后，印度工会继续通过总罢工影响政策走向，2015年全印大罢工迫使政府修改劳动法草案，展现了后殖民时代劳工政治的影响力。

国家暴力机器的镇压往往成为工人运动政治化的催化剂。1980年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罢工中，政府军警的镇压促使团结工会从经济组织转变为政治反对派。同样，1990年代印尼苏哈托政权对工会领袖的迫害，反而推动了工人运动与民主改革阵线的结盟。当工厂大门被坦克封锁时，工人们意识到经济权益需要政治权力的庇护。同时，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将《资本论》的剩余价值理论与土地改革实践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占领-生产-斗争”模式。在菲律宾，共产主义新人民军与工会组织的联盟，使糖厂罢工升级为反对马科斯独裁统治的武装斗争。另外，2013年孟加拉拉纳广场工厂倒塌事件后，全球服装工会联盟（GLJ）推动的《孟加拉防火安全协议》，展现了跨国劳工政治的新形态。中国珠三角地区的“同乡会”维权组织，则通过社交媒体将讨薪纠纷转化为对户籍制度的政治批判。数字时代的工人运动，正在突破民族国家疆界，构建新型政治动员网络。

因此在总罢工或是武装斗争以前，长期的宣传工作与改良斗争工作很多时候是不可避免甚至是必要的。

此外，我们万不可认为军备竞赛和帝国主义战争是带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佳助推，相反，帝国主义战争大概率将摧毁工人运动成果，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避免这些灾难。社会主义革命是阻止战争的关键，不是战争的产物。在1890年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写道：“这场战争如果爆发，将是一场闻所未闻的流血和浩劫……所有现存的政权都会被这场战争的结果所摧毁。”恩格斯又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恩格斯揭露统治阶级会利用民族主义煽动战争：“沙皇政府和其他列强的扩军政策，正在把欧洲工人拖入一场为剥削者利益厮杀的战争中……这将使国际工人运动倒退数十年。”恩格斯在1891年批判德国军国主义时也指出：“常备军制度使资产阶级能够以‘保卫祖国’的名义镇压工人运动……战争状态是巩固反动统治的最佳借口。”

恩格斯预言的“毁灭性战争”在1914年成为现实，战争导致2000万人死亡。虽然俄国革命（1917）和德国十一月革命（1918）证明：战争危机可能加速革命，即可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但，其代价有多大呢？20世纪的历史表明：若无强大的革命政党领导，战争更可能助长法西斯主义而非社会主义（任何一个法西斯国家的法西斯主义上台前，必然有一场流产的社会主义革命）。此外，现代的核武器很可能使得战争必然威胁人类整体的生存，这进一步凸显了恩格斯“预防胜于利用”的远见。不过，对于落后地区的民族对帝国主义的反侵略战争，**马克思主义者支持落后地区民族的民族解放，同时支持落后地区的民族把帝国主义赶出他们的土地。**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在军事行动上支持**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领导集团的军队，一方面依然积极地反对民族主义领导集团的反动政策和行动，在反侵略过程中，一步一步地向群众**暴露**它（民族主义领导集团自己的反动



性也会暴露它自己在实际问题上的无能），教育群众，唤醒群众，提高群众的认识和政治觉悟力，发展群众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斗争），把群众组织起来，准备充分的力量，然后推翻民族主义领导集团，把反侵略的领导权握在工人政府手中，使这场战争转入一个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

另外，**革命与战争不是同一件事**（不错，阶级斗争在本质上就是阶级之间的战争，但是这里的战争**特指军队之间的暴力行为**），这是易明的，**它甚至和革命战争都不是同一回事**，这对许多人说就不甚明白了。按照德国兵学家克劳瑞维茨的说法，“**战争乃政策在特殊方法中的继续**”，革命战争便是革命政策在特殊方式中的继续。既然是“特殊方式”，既然是“继续”，那么很显然，本物及其继续之间，就该有形式的与实质的不同。革命战争是从革命中发生出来的，它却具有了自己特别的方式，而且具有了量的、因而也影响于质的差异点。一个革命发展成了革命战争，并不失去其革命性，但它主要将依照战争规律而非革命规律去进行。这不是两种相同的规律。革命是自下而上的，趋向过分民主的，群众意志占取上风的，破坏权威的，除精神的风气外不受任何强制力束缚的；而战争，即使是革命战争，则是自上而下的、集中的、少数领导者的意志起决定作用的，必须树立权威的，必须普遍行使强制力的。由于如此不同的规律，所以革命与革命战争即使为同一群人所进行，为着同一事业，趋向于同一目标，而其所得结果，却可能很为不同。生活决定意识，而到达目的的手段与目的的性质又有很大关系。



当然，革命可以不经战争而成功，或必须通过惨酷战争才能胜利，并不**视革命者的愿望而定**。革命战争永远是被迫进行的——为了确保革命的胜利，不得不跟武装的反革命作战。所以赞成革命而反对革命战争，不是傻子，便是骗子。不过这不是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要讨论的乃是：看不到革命与革命战争之间的差别，看不见二者可能造成的不同后果，也是不对的。至若以为没有群众的革命，单靠少数革命者的“起义”便能发动革命战争，而且这个革命战争又可造成革命，或代替革命，那是非常错误的。

在革命高潮到来后，就是工人组织鼓动工人群众夺权的时候了。一般来说，工人们都是通过罢工来建立工人管理社会的机构的雏形——罢工委员会。实际情况也证明了罢工委员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工人国家的机构的雏形，因为它具有立法权和执行机关（如工人纠察队和工人民兵）。当工人们有冲击国家机关的信心和武器（武器不一定要枪，但是枪总归是最好的），同时统治者因为认为自己无法继续照旧统治而惊慌失措，他们就会进行暴动（一般是以**全国总罢工**的形式表现），并且**有革命的工人组织领导工人们**，

工人们就可以把罢工委员会发展成完全的工人代表议会（即**苏维埃**），从而建立起一个工人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大量革命史实证明，**工人阶级不一定需要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常备军（一支民兵部队——是武装起来的人民，而非所谓代表人民的武装）才可以夺取政权**，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军队也是会因为革命而部分导向工人阶级的。

资产阶级军队作为国家暴力的核心工具，其成员的阶级属性与意识形态矛盾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议题。大量马克思主义者均指出：士兵和下级军官在经济地位上属于工人阶级，但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军队是“国家机器中最具压迫性的部分”，士兵的服从性被等级制和纪律强化，形成追求“秩序”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革命中，当阶级冲突激化，士兵可能因物质利益（如欠饷、恶劣待遇）倒向工人，但需工人政党将其不满转化为政治行动。

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退伍军人以肉身保护抗议者，但运动因无政党领导而消散；在BLM运动（2020）中国民警卫队少数族裔士兵同情抗议者，但军方高层压制其政治表达。

马克思的断言“**种族压迫是阶级压迫的延伸**”在此凸显，但运动未超越资本主义框架。在法国的“黄背心”运动（2018-2019）中，基层警察抱怨“被当作镇压工具”，部分士兵拒绝镇压命令，但马克龙政府通过分化策略维持统治。列宁的论断“国家机器裂缝可被革命利用”在此失效，因法国左翼未能构建替代性权力。在2010-2015年的希腊债务危机时，士兵薪水被削减至贫困线以下，但左翼政党Syriza放弃挑战欧盟，军队依旧服务于紧缩政策。”在英国反紧缩运动（2010年代）中，警察工会抗议薪资削减，却拒绝与罢工工人联合——他们本质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历史表明，仅靠经济危机或战争不足以让整个军队倒戈，例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埃及军队的投机性干政。

那经典的理论在21世纪依然闪耀：资产阶级军队的士兵是“穿着制服的工人”，但其解放需革命政党用阶级斗争的火焰熔铸其意识。现在很多左派得出自己理论的方式不是去思考、调查、分析，而是单纯的找到当事人“采访”，认为革命之路可以从任何一个基层群众里得来。在军队问题上，他们犯下了同样的错误。采访退伍军人后，退伍军人告诉这些年轻人：你们渗透军队是不可能的，军人是不可能支持你们思想的。他们于是将这个奉为圣旨，去学着恐怖主义者（拿着武器的自由主义者）研究如何从国外运输来枪支弹药，“武装革命”推翻中国政府。他们不知道，革命的日历不是循规蹈矩，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几年没有发生的改变和进步，可以在几小时内完成。长期以来沉默的军队，在革命的压力下，也会被唤醒制服下的身份。忧虑我们从哪里寻来武装力量而不关心我们最急迫的任务，是纯粹的浪费时间。没有政治上的胜利，就不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借助偶然因素或外力也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

当然，中国给出了一个不同于城市暴动的工人革命方式：农村武装斗争。在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道路后，中国共产党就相当大程度上撤出了工人群众的活动范围，它的群众基础成了农民和农民出身的士兵。理论上来说，这种极大强调农民群众的政党不太像是一个工人政党，而是一个民粹政党。但是事实上，在解放战争后几年内，一个工人国家被建立起来了。

理论上来说，革命的工人组织或工人政党应该与工人群众同甘共苦，深刻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与感情，工人政党必须以工人出身的党员为基础并尽可能提拔工人党员参加领导机关；党必须不懈地参加与领导工人们的一切斗争，不管它们是日常的或不寻常的，属于经济性质或政治性质；为了做好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壮大自己的力量，党必须团结、加强或创造各种各式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只有这样，这个政党才能名副其实地成为工人阶级的政

党，也只有这样，这些工人政党才能坚定、清楚、始终不渝地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斗争。因此，植根在工人群众中，与工人阶级息息相关，和他们共患难，是一个工人政党存在与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它在存续过程中不致堕落与变节的重要保证。这个见解，过去证明是对的，今后也不会变得谬误。

但是上面我们说过了，中国共产党没有根植于工人阶级，却完成了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才能完成的任务，这是为什么？

我们可以再举个例子：德国社会民主党（SPD）。这个党根植于工人阶级，有很多的工人党员，也完全符合我上述的情况。最重要的是，德国的工人阶级力量强大，斗争经验十足。但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SPD却背叛了工人阶级，出卖了革命。

列宁在他的著作中（如《怎么办？》）强调了工人政党对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确定了先锋队与阶级群众之间的相互关系。依据这个关系，工人政党必须在工人群众中根植的命题，只有在原始与根本的意义上才能成立。在发展了的关系中，工人政党的行动（即其行动及其意识）决不是它所代表的阶级的直接与简单的反映，二者的存在也不是绝不容许有任何离开的。

但是工人政党在和它应该代表的阶级长期分离之时，会使政党失去其工人阶级性质。长期脱离社会职业、长期过着军事集体生活、长期处于落后的农村环境中并长期习惯于对上级服从对下级指挥的作风（这些都是长期从事农村的军事斗争必然存在的情况），“几十万”战斗员自能养成“集体意志”，但难于提高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他们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可能加强，但他们的民主性与首创性却势必减少，而上谄下骄、自命不凡的官僚主义倾向则一定会发生滋长。因此，当一个工人政党，倘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暂离工人群众，转移到农业的落后地区去进行长期武装革命之时，党的领导者为了保证不失去其工人阶级的性质，必须在思想上进行坚决的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同时必须采取具体步骤，不断反对官僚主义，设立明确的制度（主要是劳动大众的民主监察机构），以保证工人政党的纯洁性。再若这个全身武装的党革命成功了，以胜利者资格回进城市，与长期分离的工人阶级重逢，那时，党为了确保与巩固其工人阶级性质，更应如何面向工人，如何设法以工人民主来解决党内的官僚主义，那是不容说的。在所应采取的方法中，第一是要尽量吸收广大工人群众入党，藉以改变党员成分上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比例，第二必须尽速废止党内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军事统制，尽量创设党内外民主监察机构，使党内外工人大众真能发挥对于其阶级代表的督促、监视、批评与拥护的积极作用。

很多人问：那为什么现在要讨论这个呢？我们现在又不可能被打到农村搞游击。事实上，同等僵硬的思想在今天也有体现：很多原子化融工的倡导者所依据的重要理论，就是“如果我们组织上不贴近工人阶级，就不可能理解工人阶级，就不能懂得我们的任务”，最后沦为一种工人崇拜，只要花五分钟和工人聊天，就是大彻大悟了。这种学生式对工人阶级和革命组织的关系的机械看法的后果就是，我们不仅不能系统性的理解工人阶级和革命任务，更不可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另一类宣传要在“工人阶级之外建立革命组织”，因为中共早期就是由脱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精英组成，认为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心在海外搞一个秘密干部团体的，则和工人崇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理论家的空想。必须意识到，我们的革命路线不是融入工人或孤立工人，必须是组织起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将革命者与先进工人培养成能和资本主义卫道士交锋的干部，提升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领导整个阶级作为集体行动。很多人问：那为什么现在要讨论这个呢？我们现在又不可能被打到农村搞游击。事实上，同等僵硬的思想在今天也有体现：很多原子化融工的倡导者所依据的重要理论，就是“如果我们组

织上不贴近工人阶级，就不可能理解工人阶级，就不能懂得我们的任务”，最后沦为一种工人崇拜，只要花五分钟和工人聊天，就是大彻大悟了。这种学生式对工人阶级和革命组织的关系的机械看法的后果就是，我们不仅不能系统性的理解工人阶级和革命任务，更不可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另一类宣传要在“工人阶级之外建立革命组织”，因为中共早期就是由脱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精英组成，认为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心在海外搞一个秘密干部团体的，则和工人崇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理论家的空想。必须意识到，我们的革命路线不是融入工人或孤立工人，必须是组织起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将革命者与先进工人培养成能和资本主义卫道士交锋的干部，提升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领导整个阶级作为集体行动。

不能光说，要做。现在一同组织起来，是我们每人都不可推卸的责任。

唯物主义辩证法简论

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唯物主义辩证法

哲学？一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嗤之以鼻：学究的东西！作为现实的革命家，我们现在应该干实在的工作！一些人就这么喊着喊着，最后不加思考地接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为其存在作辩护，说这是什么“符合现实国情、符合时代潮流”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实践”，或是只是单纯的表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对，又可悲地沦落到称呼假期打个工或者街上贴张海报就大肆宣扬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但是，共产主义者需要学习哲学，在我们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地是失陷的如此悲惨，以至于反对都成了上风了。

问学不学哲学前，必须理解不管你是否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这归根结底是理解世界、思考问题的一种方式，一套思维体系而不是什么“学科”。如果认为自己不需要研究哲学，跟着感觉干就足够革命的人，往往是直接拿目前社会的主流哲学——资本主义制度下推崇的哲学不假思索的实践了。

哲学不该悬在空中，和那些读一辈子书的胆小鬼一样当成自己高高在上看不起人的“本事”。这该是我们组织起革命者、教育同志们的思想武器，让我们理解当下的政治任务来更好的建立起一个革命党的工具，这该是我们分析一切理论的基础——不只要结论，而要能得出结论的过程。而正确的科学理论，则是我们进行革命工作的基础。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话：“一步实际运动胜过一打纲领”，似乎是在说实践比理论重要。然而这是曲解。列宁曾经很清楚地解释过这句名言的原意：“马克思严厉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所抱的折衷态度：如果要联合的话，马克思当时向党的领袖们写道，——那末为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起见，尽可缔结条约，但决不要拿原则来讲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紧接着这段解释，列宁便提出了他自己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代表一个人只能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得到真正的认识（不过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我们要明白，前人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再犯

了，而理论是对于过去的实践的总结，通过理论，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未来怎么走才能成功。没有总结与反思，并指望只通过当下的实践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打算把前人走过的错误道路全部都再走一遍吗？用**科学预见来预防错误，远比盲动犯错后改正更容易取得最终的成功**。那理论从“古书”（即马列经典）里找然后强行套在今天吗？那就是一些教条主义者最狂热的幻想罢了。我们需要的是历史革命者的经验而不是指导，只有有了哲学，才能分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

1. 物质一元论

如何理解唯物辩证法中的“唯物”二字？

一般来说，人们根本不会想到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外部世界是否客观地存在着。人们“相信”外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不过这里面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这种信念从何而来？很多人只是根据一般的经验断定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的，而它只是从常识的观点，即最琐碎的非批判的意义上采纳了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现实性的观念，它根本不怀疑它会遇上什么反对意见，事实上它早遇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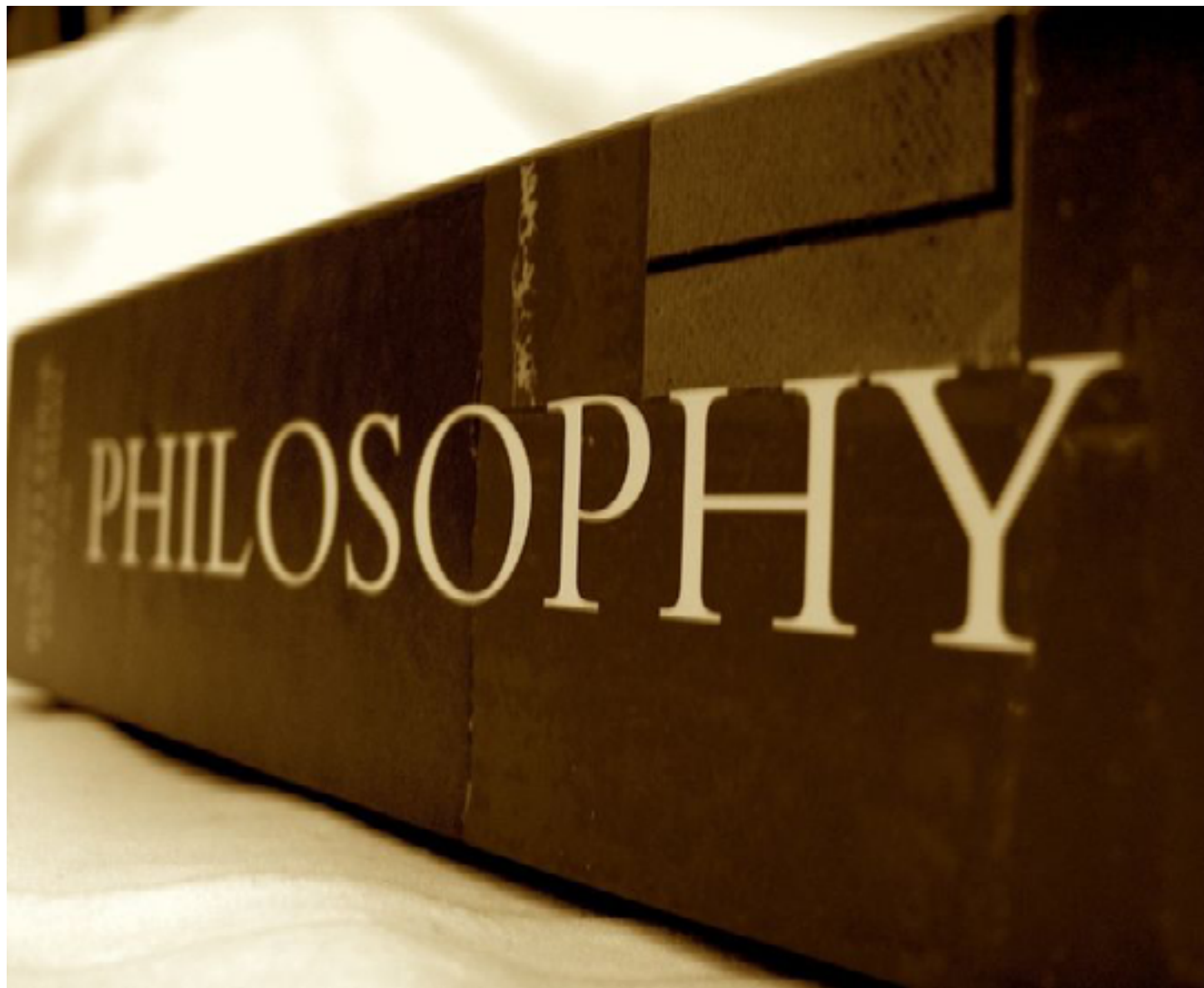
如果对这种观点加以分析，就会发现，要为这种按这种方式去理解客观的外部世界观点进行辩护是很不容易的。似乎有可能存在一种超历史和超人类的客观精神。可是这种客观精神的判断者是谁？谁能够把自己置于这种“自在的宇宙观”中呢？这种“自在宇宙观”又能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这只能被认为，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正是**上帝概念的残余**，是不可知的上帝观念的一种神秘形式。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早已瓦解了绝对时空观（这也就是“神”和“自在宇宙观”在自然科学层面上存在的根本基础）的基础框架：狭义相对论揭示时空测量具有相对性——高速运动观察者的时间流速会减缓，空间尺度会收缩，这种效应已被全球定位系统的相对论修正所实证。广义相对论更进一步将时空几何与物质分布相耦合，证明大质量天体引发的时空弯曲使“自在的统一坐标轴”失去存在意义，正如黑洞事件视界附近时空畸变导致传统坐标系完全失效。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也在量子层面给予“统一坐标轴”决定性打击：粒子位置与动量的不可同时确定性，本质是时空量子化涨落的必然结果。当试图以普朗克尺度（米）定位粒子时，其能量涨落将自发形成微观黑洞，使“精确坐标”概念在物理意义上自我消解。相对论从宏观结构否定了绝对参照系的存在，量子不确定性则在微观层面摧毁了精确坐标的操作可能，二者共同证明所谓“统一时空坐标轴”不过是经典物理学的理想化幻象。

那么又如何能在哲学上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先看一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过的话：“……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如果要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它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包含着下列正确观念的起源：要想证实客观现实，**必须求助于历史和人**。所谓客观，总是指“人的客观态度”，可以把它看作“历史的主观”。换句话说，客观将意味着“普遍的主观”。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只有在存在于没有分化的人类，从而使人人认识变得完全一

模一样的情况下，才能避免陷入武断的相对主义的迷误。要证实客观现实，**只能靠实践**。（生活本身就是实践，证明历史的实在也得靠实践证明）因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同时，马克思又说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



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 [gegenständliche] 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这一活动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旧唯物主义忽视了人的主体性与社会关系的互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反映论。将认识简化为个体经验的累积，是割裂实践活动中主客体辩证统一的关系的结果。**实践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不同的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相互作用的过程。**

因此，**认识实践必须超越本阶级的局限**，例如，马克思主义者既要研究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也要深入剖析奴隶主、资本家等阶级的实践活动，因为这些剥削阶级的实践恰恰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客观环节。只有通过批判性考察对立阶级的实践，才能揭示其历史暂时性与内在局限性，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作出真正的**科学预见**。

对于人类来说，如果在世界上不存在人，也就无法想象“思维”和对世界万物的命名与其概念，同时根本不可能设想任何事实和关系，因为它们只是有人存在才存在。我们可以以语言表达为例。假设没有一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而创造出英语这个语言，那么就不可能有人用“world”一词代指世界。的确，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意志存在（所谓**物质**就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但是若是人不存在，即缺少一个对于世界的意识，那么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世界就是无法想象的。没有人的意识的世界对于人来说就是一团混沌，而这团混沌完全无法被描述，因此它也不能被视为“一个东西”。只有人赋予了“混沌”意义，它才能被人所认识。当然，没有人的意识，这团混沌仍然存在。因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表示：“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所是，尽管世界的所是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是”“某个东西”**，然后才能**“是”统一**的。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所是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这里恩格斯的意思是：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什么东西，是在于世界的“所是”是什么，由于实践证明世界的“所是”是存在，即物质，所以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

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也引申出了马克思主义对无神论的批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宗教从一开始就是超验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从现实的力量中产生的。”无神论在历史上否定宗教意识超验性，对肯定人们自然界和人的实在性起到积极作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说明了自然界和人的实在性的社会物质基础之后，无神论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马克思主义不需要这个理论中介。既然自然和人已经成了一切研究的前提，那么其实就直接排除了神的存在。因此恩格斯在1884年总结说：“无神论只是表示一种否定，这一点我们自己早在40年前驳斥哲学家们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但是我们补充说。无神论单只是作为对宗教的否定，它始终要涉及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因此它本身还是一种宗教。”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把宗教批判视为一切批判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是把政治批判视为一切批判的前提，而宗教批判从属于政治批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的“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实为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立场的转述。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只要破除宗教幻想就能解决现实问题，而马克思强调宗教异化根源于现实的社会异化，必须转向对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可见，**当某些人将马克思主义类比为宗教时，其谬误源于对批判前提的误置**。当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确立为根本方法时，其理论体系就获得了与宗教完全异质的内在结构。宗教的本质在于彼岸世界的超验维度，而马克思主义始终将现实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决定了其批判路径必然指向现实政治经济结构而非精神领域。宗教批判预设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对立，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消解了这种对立，将人的解放理解为物质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结果。政治批判作为一切批判的前提，意味着所有意识形态问题最终都需还原到具体的阶级关系和物质利益分析，这种彻底的现实性取向与宗教的超越性本质形成根本对立。

马克思主义者向其他人论述自己对于宗教的态度时，可以用“唯物史观”这个词代替“无神论”。

接下来我们详细讨论一下“物质”和“意识”。

从神经科学视角看，**人类意识本质上是高度组织化的物质运动形式**。大脑作为有机物构成的精密器官，通过 860 亿神经元及其突触连接的电磁活动产生思维。即便是最抽象的哲学思辨，本质上仍是前额叶皮层与边缘系统协同运作的产物。2025 年《自然 - 神经科学》关于意识本质的研究表明，主观体验的核心特征在于默认模式神经网络与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动态耦合，这种物质结构使人类具备反事实推理能力，能够构建超越当下时空的可能性世界。正如南非早期智人岩画中对未捕获猎物的仪式性描绘所揭示的，符号创造能力正是区分意识活动与机械反应的关键判据。

在生命起源领域，现代生物学通过基因编辑和合成生命实验，证实了生命现象的物质基础。2025 年“合成细胞 3.0”项目通过自组装脂质膜与 RNA 分子，构建出具备代谢功能的类细胞结构，证明生命完全可能通过自然化学过程诞生。跨物种基因比对显示，所有生物共享遗传密码，基因突变速率与化石记录的时间线高度吻合，这为自然选择学说提供了坚实证据。即使是看似神秘的利他主义行为，2025 年对原始部落的基因 - 行为关联研究表明，其与特定基因变异存在显著相关性，完全可通过物质层面的自然选择机制解释。

关于**物质不灭**问题，爱因斯坦质能方程（ $E=mc^2$ ）早已揭示质量与能量的统一性。2025 年引力波观测数据显示，黑洞合并时损失的质量精确转化为引力辐射能量，总质能守恒定律在时空弯曲条件下依然成立。至于量子力学中的“量子涨落”现象看似违反守恒定律，**实则反映了虚粒子对的瞬时产生与湮灭，在足够时间尺度下仍满足整体守恒**。这些发现印证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论断：“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既不能凭空创造也不会彻底消失。

就人类独特性而言，神经进化研究揭示了关键差异。2023 年《自然 - 生态与演化》研究表明，**切叶蚁群体虽能展现复杂协作行为，但其应对范式完全受化学信号和遗传程序支配，无法突破进化形成的固有模式**。相比之下，人类通过前额叶皮层构建多维未来情景模拟，形成超越当下的改造方案，再通过工具迭代实现目标。这种基于物质器官的认知飞跃，使人类成为唯一能系统性改造自然界的物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种意识本身仍是物质长期发展的产物。

针对量子力学引发的哲学争议，则需明确区分认识论局限与本体论问题。微观粒子的概率性特征反映的是人类观测手段与微观客体相互作用的阶段性局限，而非否定物质第一性。正如经典力学在高速领域需要相对论修正，量子现象的特殊性恰是人类实践能力历史性发展的印证。将测量过程中的主客体相互作用曲解为“意识决定物质”，实质是将认识论问题错误上升为本体论判断，这种观点已被 2025 年柏林自由大学量子引力研究组的最新成果证伪——**他们发现宇宙结构自组织过程中表现的“伪目的性”，实则是能 - 质转化方程在非平衡态下的涌现特征，与意识活动存在本质差异**。

在自由意志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强调其社会历史性本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精辟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种自由建立在掌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现代认知科学证实，**人类决策机制包含前额叶皮层的理性计算与边缘系统的情感评估双重过程，这种物质基础的复杂性使人能够超越即时本能，进行跨期价值权衡**。2025 年对乌鸦工具使用行为的研究显示，其决策过程始终围绕即时生存需求，缺乏人类特有的价值抽象能力，这从神经机制层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意志历史性的论断。

关于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区别，关键在于物质组织形式的复杂度。金刚石与石墨的同素异形体现象已揭示物质性质取决于微观结构。人类意识的特殊性正源于神经网络的特殊组织方式：大脑皮层 160 万亿突触形成的动态连接模式，使信息处理具有非线性特征。这种物质组织形式量变引发的质变，在 2025 年麻省理工学院全脑连接组图谱中得到可视化呈现。正如工业革命从蒸汽机到超级计算机的发展历程，物质组织形式升级带来的可能性突破，不能简单等同于本体论层面的本质差异。

马克思主义对自由意志的理解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人类通过劳动改造自然的过程，本质上是将主观认知转化为客观存在的物质过程。这“对象性活动”既受制于物质规律，又通过规律运用拓展自由边界。正如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NSS）必须修正相对论效应才能确保精度。可见，**人类自由的实现始终建立在对物质规律的认知与运用之上，而动物行为受限于遗传编程的应对模式。**这种区别不在本体论层面，而源于物质组织形式的演化差异。

最后我们再提一嘴：不同的哲学家对世界的“所是”（即世界的本质或统一性基础）有不同的理解。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所是”是存在，即物质。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所是”是思维。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本体论意义，才有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意义。**这种区分在哲学史上始终具有根本性价值。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与柏拉图理念论的对抗，近代机械唯物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中先验观念论的角力，本质上都是对世界本原问题的不同解答。**但必须警惕将这种本体论分野简单等同于进步与保守的对立**——如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中的庸俗化解读实质上消解了哲学史的丰富性。它既忽视了唯心主义体系内部存在辩证法的革命性（如黑格尔），也遮蔽了唯物主义阵营中机械论的局限性（如 18 世纪法国唯物论），更是完全否定了笛卡尔、康德等二元论者的哲学价值。

本体论的划界意义在于确立不同哲学体系的基本坐标。当我们说贝克莱是唯心主义者时，是指其本体论承诺将感知作为世界存在的依据；当我们称费尔巴哈为唯物主义者时，则是基于其将感性自然确立为第一性存在。这种区分不涉及价值评判，而是哲学立场的定位方法。正如石里克所言：“形而上学的决定不是关于真伪的判断，而是关于采用何种概念框架的决断。”

在认识论层面，这种区分指引着不同的方法论路径。唯物主义强调经验观察和实证检验，发展出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唯心主义注重逻辑分析和先验演绎，为数学和形式科学提供哲学支撑。二者在人类认知体系中实为互补而非对立的关系。**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正是要突破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并将实践确立为联结物质与思维的枢纽。**

2. 自然、社会和个人

首先，**人类社会中不存在个人和社会的对立。**所以，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手稿）中写道：“甚至当我从事科学这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物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他接着说，应当避免把“社会”作为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因为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在人类社会中生活却又在客观社会经济条件之外的人不可能存在，即抽象的生物个性（即“不变的人性”）并不存在。一般不会有人把一个从出生就生活在人类社会之外的人视为一个健全的、具有人性的人，因为这种脱离社会的人只会存在动物的意识，而这种意识不会是所谓“邪恶”或“善良”的，因为邪恶与善良也是相对于人的东西，**邪恶与善良也只能在社会中才能被理解。**人性只能是社会总体的一部分，他是历史的一部分。动物只有生理上的出生，而人类还有社会出生。人的出生不只是单纯的

诞生了一个生物体，而是说明降生了一个带有**具体社会身份**的人。任何回避社会出生的企图以及单纯由机体生存的生物学前提演绎出的一切“人性”理论都是不可信的，并且注定要破产。因为无论一个人的每一举动，无论一种具体思想意识的形成（想法、艺术形象、甚至是梦的内容）都不可能脱离社会经济条件来阐释和理解。甚至即使生物学的专门问题，如不充分考虑被研究的人的社会地位，也不可能得彻底解决。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所说的那样：“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马克思主义反对这个观点：“人仅仅是存在于世界中，而不是与世界或其他人一起发展；个人是旁观者，而不是再创造者。”当一个人思考矛盾时，这个人也处在具体的矛盾之中，其思维本身也不会超脱这些具体矛盾。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因素就可以洗脱个人主观因素导致的罪行与错误，因为这贬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只是强调个人的行为不可能脱离客观历史的限制，历史只是奠定了个人主观的基调与大环境。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完全可以能动地创造自己的环境，这种新的环境反过来又会产生各种新的意识。（考虑人的躯体和大脑对人意识的影响时，要明白躯体和大脑是物质组成的，因而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外部的客观因素”）实践唯物主义一向反对将复杂的社会运动简化为单一物质要素的机械决定论倾向。例如，机械唯物主义将历史进程等同于齿轮传动式的物理因果链，认为社会变革仅由技术工具或地理环境直接触发，例如认定“蒸汽机发明自动催生资本主义”而忽略生产关系、阶级斗争等环节。**这种思维方式剥离了事物的普遍联系与矛盾转化**（正如种子发芽既依赖基因也需光照、土壤的多维作用），如同将人体代谢仅还原为细胞分裂而漠视神经、循环系统的整体协同。机械唯物主义将多维动态系统降维至线性决定模型，既无法解释文艺复兴为何未在更早发明印刷术的中国发生，也难以剖析现代算法垄断背后技术、权力、文化的交织逻辑。实践唯物主义超越了这种形而上学框架，它在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同时，以矛盾分析法把握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历史的具体性。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所说的那样：“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另外，**社会同自然界不分割，人类被认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通过劳动和繁殖来生产和再生产，所以**既是自然关系，也是社会关系**（参看《1844年手稿》）。马克思主义不把社会看作独立存在的现象，并忽视它和自然界的关系，**人类社会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就已指出资本主义工业的扩张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各种破坏性的后果，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指出“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历史”，而且“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技巧的进步”；从长远来看这种进步将“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出自《资本论》第一卷，第552—553页）。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又明确地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由此可见，生态保护从一开始就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议论中。人类有为后代保护人类生活的生态先决条件的义务。人类应该在保持并大力发展大工业的同时注意生态问题。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自然科学是以人为中心的，以自然科学为依据所谈论的自然也必然具有人的因素，自然科学和自然本身因而也就具有历史性：“天文学中的地球中心的观点是偏狭的，并且已经很合理地被推翻了。但是，当我们在研究工作中愈益深入时，它又愈来愈出头了。……我们只可能有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而这些科学并不因为说它们只对于地球才适用并因而只是相对的，而损失了什么。如果认真地对待这一点并且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就会使一切科学都停顿下来……永恒的自然规律也愈来愈变成历史的规律。”这其实也是自然和人在“实践化”。这种相互作用也说明作为主体的人的研究对象也并非是单纯的客体，人的研究对象也是主体，实践是**主体与主体间的相互作用**。

自然和人的“实践化”不仅意味着实践对自然和人的决定性以及自然和人在实践活动中的相互作用，而且也意味着自然和人在实践活动中的相互统一。正是在实践活动中，人不仅“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自然辩证法》）。对于人来说，真正未知的“自在之物”（即没有认识的事物）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只能理解经验和由经验组合而成的“为我之物”（即已经认识的事物）。例如龙，它本身就是人类已知的事物拼凑起来的想象物，它的一切内容仍然没有超出人类的经验。

3. 逻辑学

对于如何描述客观世界里的的事物，人们就需要逻辑。逻辑学是观察思维定律的一门科学，无论我们在思考什么思想，无论表达什么语言，都必须满足逻辑的要求。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我们至今仍沿用的**形式逻辑**系统，该系统是我们今天教育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对以下方法进行了分类：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推理，如何将陈述合并以得出判断，并从中得出结论。他提出了三个基本的逻辑定律：同一律（A 就是 A），矛盾律（A 不能同时又是 A 又不是 A），以及排中律（A 要么是 A 要么不是 A，没有折中的可能）。

形式逻辑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科学实验的基础和现代科学的巨大进步。形式逻辑看起来似乎是常识，它负责执行千万个日常事物，但是，尽管它很重要，但它仍有其局限性。当处理长远过程或复杂的事件时，形式逻辑就变成一种完全不足的思维方式。在处理运动，变化和矛盾时尤其如此。形式逻辑将事物视为固定的和静止的。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形式逻辑的日常用处**，但我们需要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在用辩证法分析问题，时必须搞清楚什么东西**相对不变**，否则我们会落入一味强调无条件的变化的诡辩当中）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辩证法不过是自然，人类社会和思想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简而言之，这是动态的逻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显然不生活在一个静止的世界中。实际上，自然界中的一切都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只有变化本身永远不变）。恩格斯说：“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和

没有物质的运动。”，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注意什么东西在运动、转变和联系。这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一个动物是活着的还是死的。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反而不是一个简单直接的问题。直到今天，关于母亲子宫中生命何时开始的争论仍很激烈，同样，很难说确切的死亡时刻是何时发生的，因为生理学证明了死亡并非一个单一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解释道：“对我们来说生命与死亡、睡眠与清醒、老与少，都是同一件事；每个都互相易位、转换。我们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们同时是，也不是。”不是每个事物都是事物表面上出现的事物。每个物种，有机生命的每个方面，每时每刻都是一样的，并且是不一样的。它是通过从无到有地吸收物质而发展起来的，同时也丢弃了其他不再需要的物质；一些细胞不断地死亡，而另一些则被更新，随着时间的流逝，身体被完全改造，从上到下更新，因此，每个有机实体既是自身，又是自身以外的其他事物，

那么物质究竟是怎样运动的呢？这就得用辩证法的三个原则来解释：

（1）量变转化为质变，质也可以转化为量

大约 36 亿年前，地球海洋中单细胞生物的出现是物质演化的质的飞跃。大约 6 亿年前的“寒武纪爆炸”，复杂的多细胞生命爆炸性增长，是质变的又一次飞跃。在大约 400 至 5 亿年前的古生界后期，出现了第一条脊椎鱼类。这种革命性的进化通过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而变得占统治地位并得到了发展，最后分支成温血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这种革命性的飞跃最终导致了具有思考能力的人类。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生物体内部和外部的变化积累会导致飞跃，从本质上讲是更高的发展状态。

2025 年，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 的突破性应用印证了这一规律。科学家通过长期累积的基因序列微调（量变），最终实现 Casgevy 疗法的质变。该疗法已成功治愈镰状细胞病和 β 地中海贫血，并扩展至慢性乙肝等复杂疾病的临床治疗。量子计算领域同样展现了这一过程：谷歌 Willow 量子芯片通过数十年纠错算法迭代（量变），在 2025 年首次实现 24 个逻辑量子比特的稳定纠缠（质变），推动量子计算机进入实用化阶段。

巨大的地下压力积累周期性地以地震的形式突破地壳一样，劳工的阶级意识的逐渐变化也导致阶级斗争的爆发。工厂的罢工不是由外部“鼓动者”引起的，而是工厂内部积累的“量”的变化导致的，从而在最终导致罢工。罢工的“原因”也许很小，而且偶然，但以一句谚语来说，它已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已成为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催化剂。

“质”和“量”的层面在实际上代表一个具体的东西，而“度”的层面则是一个被抽象的东西。例如，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质”和“量”的层面，而商品的交换价值就是“度”的层面；资本主义社会、邦统主义社会、封建社会等社会就是“质”和“量”的层面，而人类社会这个统称就是“度”的层面；具体的生命体、建筑物、星球等物质就是“质”和“量”的层面，而得以让物质存在的物质世界就是“度”的层面。

（2）世界存在普遍的矛盾，矛盾辩证统一并相互渗透转化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矛盾的统一，也可以说是对立的统一：冷热、明暗、出生与死亡、贫与富、正与负、繁荣与低迷、有限和无限、排斥和吸引、左与右、上与下、偶然与必然等。互相矛盾、对立的两个极点可以在整体上共存的事实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悖论。悖论是认识到两个矛盾的或相反的考虑都可能是正确的。这是对物质世界对立统一在思考上的反映。若一个事物不存在，其对立面也会跟着消失。例如偶然性，若是不存在必然性，那么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偶然性呢？“只存在偶然性”本身也是一种必然性！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表示：“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但是，矛盾不总是一一对应的，一个事物可能有多个事物作为其对立面。

当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以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本源”时，便暗含了对立元素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法，亚里士多德更在《物理学》中强调冷热、干湿等对立性质的相互作用构成物质变化基础。这种对内部矛盾驱动物质转化的认知雏形，在近代科学革命中得到系统化发展。牛顿力学体系中，惯性运动与外力作用的矛盾统一构成经典物理学的根基，物体保持原有状态的内在倾向与外部作用力的对抗，精准诠释了事物发展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现更充分揭示了矛盾多重性对发展的复杂影响。达尔文进化论指出物种进化既源于遗传变异的内在矛盾，又受自然环境选择的外部制约。同一物种内部不同变异个体间的生存竞争，与外部气候变迁、食物链变动形成多维度矛盾网络。孟德尔遗传定律进一步证明，显性性状与隐性性状的对立统一构成了生物遗传的内在动力，这种基因层面的矛盾运动与外部环境压力共同塑造了生物进化轨迹。热力学领域呈现的矛盾多维性更为显著，卡诺循环揭示的热机效率极限，本质是系统内部分子运动无序性与外部能量输入有序性之间的矛盾，而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的熵增趋势与环境负熵流的对抗，构成了开放系统演化的基本范式。

在现代自然科学中，量子力学中波粒二象性表明微观粒子自身包含着波动性与粒子性的对立统一，这种内在矛盾特性在外界观测条件影响下呈现不同表现形态。相对论揭示的物质时空属性，在高速运动参照系与强引力场环境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矛盾表现形式，证明同一事物的对立面会随外部条件改变而动态转化。生态学中的共生演化理论显示，物种间既存在资源竞争的对立关系，又形成协同进化的统一关系，多重矛盾的交织构成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

系统科学的发展尤其凸显了矛盾系统的网络化特征。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证明，开放系统通过内部非线性相互作用与外部物质能量交换的协同，能在临界点实现自组织演化。这种演化过程既包含系统要素间的竞争与协同，又涉及系统整体与环境的物质能量交换，形成多层次矛盾共同作用的演进机制。当代气候科学研究更清晰地显示，地球系统演变是大气环流内在动力、海洋热盐循环、生物地球化学过程等多重内部矛盾，与太阳辐射变化、宇宙射线波动等外部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

可见，**内部矛盾是事物的发展根本动力，而外部矛盾是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自然界中，物质的演化遵循一定的路径，尽管这是如何，何时以及以何种形式实现的，取决于偶然的情况。例如，是否在地球上创造生命取决于一系列偶然因素，例如水的存在、地球与太阳的距离、大气组成等。恩格斯说：“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这个世界存在绝对真理，例如这篇文章是我用一台笔记本电脑完成的，这就是一个无法置疑的绝对真理。一般来说，从经验中抽象

出来的定理都是相对真理)

此外，A 性质的矛盾，只有用 A 性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句话的本身并不错。可是这个断言正和“A 等于 A，A 不等于 B”这个公式一样，其正确性是有限度的，是初步的，属于形式逻辑范畴。在较高级的逻辑上，即在辩证法上，“A 不等于 A，A 可以等于 B”，甚至“非 A 也是 A”的公式，非但不是荒谬，却是更加正确，更加符合于客观的物理和事理的。因此，**A 性质的矛盾，有时偏偏不能用 A 性质的方法来解决，偏偏要用 B 性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虽然不合于形式逻辑的思维，但完全合乎辩证的思维方法。

例如，当人类试图用抗生素直接消灭致病菌（A 矛盾），却发现其耐药性产生后，需通过恢复肠道菌群平衡（B 方法）重建生物屏障。这种矛盾转移机制在热带雨林研究中更明显：单一树种虫害爆发（A 矛盾）无法靠喷洒农药解决，科学家通过引入特定传粉昆虫（B 方法）重建生态网络，使系统恢复抗性。量子力学揭示的 EPR 悖论更本质地展现了这种辩证关系：两个纠缠粒子看似存在位置矛盾（A 矛盾），但解决方案不在局域性框架内寻找（A 方法），而需引入非定域性理论（B 方法）重构时空认知框架。

热力学系统演化同样印证该规律。19 世纪工程师试图提升蒸汽机效率（A 矛盾）时，单纯改进气缸结构（A 方法）遇到了瓶颈，因此卡诺转而研究理想热机循环（B 方法），通过构建温差与功的普遍关系破解困局。这种矛盾解决路径的跃迁，本质是把握了不同矛盾间的结构关联。就像石墨烯导电性缺陷（A 矛盾）无法通过修补晶格解决，却能在引入应力场（B 方法）诱导电子轨道重构后消除。自然规律反复证明，**表层矛盾往往是深层系统失衡的显影，唯有在矛盾网络的动态联结中寻找杠杆解，才能真正解决矛盾。**

近年来“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否定客观真理的普遍性，如福柯将知识视为权力关系的产物，德里达也强调文本意义的无限延异。然而，量子物理领域的最新研究显示，**尽管微观粒子的观测存在不确定性，但量子纠缠的普遍性与量子场论的数学确定性揭示了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例如，2025 年量子计算机通过大规模纠缠态验证了贝尔不等式破缺的普适性，表明微观世界虽具概率性，但其内在规律仍可通过科学实践逐步把握。神经科学对意识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人类认知虽受文化环境影响，但大脑神经网络的客观物质基础决定了认知能力的可验证性与趋同性，这与马克思主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契合，否定了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认识论。

此外，后现代主义者德勒兹的“块茎”理论强调去中心化的流动本体，否定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与本质性。然而，**复杂系统科学的最新成果表明，无论是生态系统还是社会经济系统，其动态演化始终受内在矛盾驱动，并呈现阶段性规律。**例如，2025 年全球气候模型通过非线性动力学分析，揭示了碳排放与气候突变之间的阈值关系，证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规律在自然与社会领域的普遍适用性。这呼应了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论断。此外，人工智能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模拟研究表明，资本积累的逻辑仍主导技术应用方向，数字平台经济的垄断化趋势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集中规律的预见，而非后现代所宣称的“去中心化乌托邦”。

另外，**量子不确定性反映的是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而非规律性的缺失。**混沌理论研究表明，看似随机的气象变化实则遵循确定性方程，其不可预测性源于初始条件的敏感性而非超自然干预。2025 年《天体物理学期刊》关于宇宙结构自组织的研究表明，星系分布的模式完全可由引力相互作用和暗物质分布解释，无需引入非物质因素。这些成果印证了马克思提出的“物质运动有其固有规律”的论断，**说明偶然性始终存在于必然性的框架之中。**

运动、空间和时间不过是物质存在的方式而已。正如我们所解释的，运动是一个矛盾，即同时处于一个位置和另一个位置。亦即对立统一。黑格尔说过：“运动意味着物体在这个地点同时又不在这个地点；这就是空间和非时间的非间断性——正是这种非间断性才使运动成为可能。”要理解某事物本质，就有必要找出这些内部矛盾。在某些情况下，个体可以是普遍，普遍也可以是个体。事物变成相反的东西（原因可以变成结果，结果可以变成原因），因为它们仅仅是物质发展中永无止境连环中的一节。旧事物被否定的同时也是对旧事物有生命力的部分和对新事物的肯定。

对人类来说，血糖等级对于生命至关重要。血糖过高可能会导致糖尿病昏迷，过少会导致人无法进食。该安全等级受通过碳水化合物消化而释放到血液中的糖的速率，所储存的糖类，脂肪或蛋白质转化成糖的速率以及糖的去除和利用速率所调节。如果血糖水平升高，则通过从胰腺释放更多的胰岛素来提高利用率。如果它降低了，更多的糖会释放到血液中，或者人会感受饥饿并且进食糖分来源。在这种对反向力，正反馈和负反馈的自我调节中，血液水平保持在可容忍的范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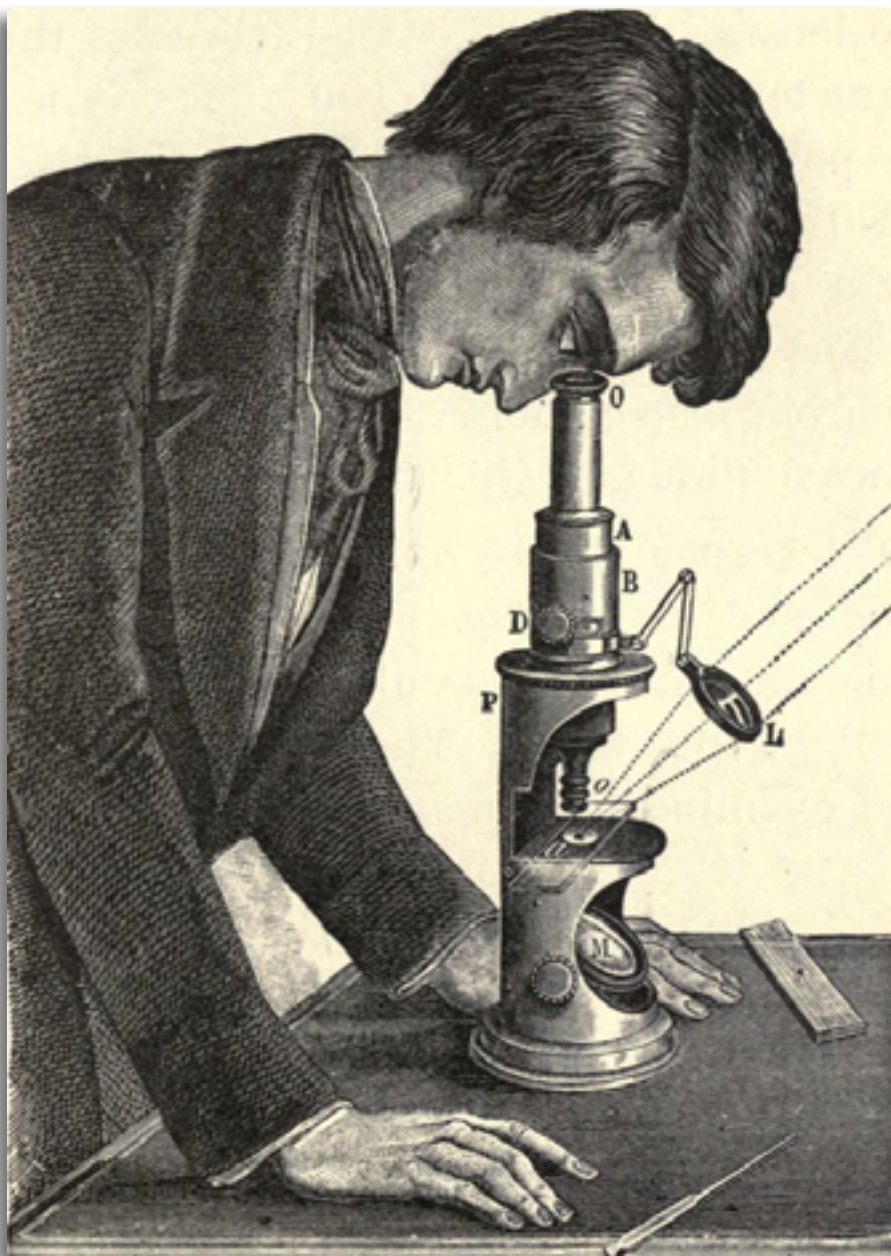
但是要明白一点，一个在“质”和“量”的层面上事物虽然存在“正反”两个方面，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强行消除“不好”的一面并保留“好”的一面，要明白“好”与“不好”的方面的综合才构成一个事物，消灭“不好”的一面等于要消灭这个事物本身。（有的时候“度”的层面上事物也是如此）

（3）否定之否定

历史发展的模式不是直线上升，而是复杂的互动，前进总伴随着相应的后退。反过来，这些退步将在接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得到纠正。否定的定律解释了某些特征在较高级别的重复，以及较低层次的特性和过去特征的表象重现。形式与内容之间以及内容与形式之间一直存在着不懈的斗争，最终导致旧形式的瓦解和内容的转变。

2025年肠道微生物组研究表明：早期抗生素治疗（否定1）虽抑制病原体，却破坏了菌群平衡；益生菌疗法（否定2）试图恢复平衡，但过度依赖外源菌种；最新研究通过CRISPR编辑宿主自身代谢通路（否定之否定），既保留抗生素疗效，又重建内源性菌群稳态，使治疗效率提升三倍。另外，传统核电站因安全问题被质疑（否定1），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通过标准化设计提升安全性（否定2），而2025年液态钍基反应堆结合AI实时监控系统（否定之否定），在安全性与效率上实现螺旋式跃升。

我们最好将整个过程描绘成一个向上漩涡，在这种情况下，运动返回到开始时的位置，但位置变得更高了。换句话说，历史的进步是通过一系列矛盾实现的。如果否定了前一阶段，则并不表示前一阶段已完全消除。它并没有完全消除它取代的阶段。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一书中以一系列示例来说明否定的否定：“我们以大麦粒为例。亿万颗大麦粒被磨碎、煮熟、酿制，然后被消费。但是，如果这样的一颗大麦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的条件，落到适宜的土壤里，那末它在热和水分的影响下就发生特有的变化：发芽；而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从它生长起来的植物，即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的生命的正常进程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大麦粒，大麦粒一成熟，植株就渐渐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为这一否定的否定的结果，我们又有了原来的大麦粒，但是不是一粒，而是加了十倍、二十倍或三十倍。”大麦通过回到起点来生存和进化，但进入了更高的层次上。一粒种子产生了许多种子。同样随着时间的流逝，植物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在进化。连续几代内就可发生出变化，并且变得更加适应其环境。



由此可见，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是从自然和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中抽象出来的，即自然和社会的辩证法反映到了思维上，形成了思维上的辩证法。就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不是发明了引力规则，而是揭示苹果落地背后的客观联系，**辩证法总结的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矛盾转化现象。**这完全不可能是各代哲学家靠单纯的“逻辑思维”的结果。

当我们看到种子发芽是胚芽与种皮对抗的结果，观察到昼夜更替源于地球自转与太阳辐射的矛盾，这些自然规律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已存在数亿年。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冲突，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初期就自发产生，而非理论家刻意制造的规则。辩证法提供的不是“模具”，而是认识复杂现实的“探照灯”——它承认每个矛盾体都有独特结构，就像水的相变同时受温度、压力、杂质等多因素制约，**绝非简单套用公式就能预测的。**

有人说我们认同辩证法就是“辩证法强加规则”，但他们同时的意思就等于否认科学规律具有客观性。量子纠缠现象颠覆经典物理认知时，辩证思维反而比机械决定论更能解释微观世界的矛盾统一性。真正会强加规则的恰是那些将历史简化为线性进步、历史循环、神学宿命的学说，而辩证法始终强调具体矛盾具体分析，这种开放性恰恰证明其源于现实而非凌驾现实。

XII

如何在当下中国 组织一个布尔什维克党

1. 中国当下左翼生态：问题与答案

当下中国的左翼生态圈非常复杂，在严密的监察制度下，不用说左派组织，任何的群众自发形成的、超越资产阶级法权所规定的纯经济活动的组织，这样的尝试一旦浮上水面都面临被“请喝茶”的风险。中国年轻一代在线下的原子化程度甚至超过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导致中国左翼呈现出一种分散的、相互割裂和各立山头的生态。左翼同志之间往往通过私人关系而非严肃的组织方法来结成组织，导致这类左翼小组织中普遍存在一系列问题：通过私人关系结成和维系的组织有无法突破的发展上限；造成私人事务和组织或政治事务混同，组织毁于私人问题或是私人分裂导致组织分裂；在缺乏良好民主集中制运行的情况下，靠私人关系维系起来组织稍有发展，便容易“自发”地形成按资排辈的权力结构。

出于对中国监察制度的恐惧和对先锋队生存环境的绝望，一部分中国左翼同志放弃了列宁主义和先锋队路线。这部分人中，一部分转向了纯经济斗争，比如尝试搞红色产业；一部分在结成组织的同时完全模糊掉自己的政治属性，退回到生活的场域里，比如零散的俱乐部；一部分转向了纯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比如退回到哲学的斗争里；一部分诉诸法律斗争，比如专注劳动保障、合法的劳工维权等。

当然，经济的斗争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是必要的，并且是和先锋队的政治组织有机补充的的革命群众浪潮的一部分。

但这其中最危险的是用纯经济和意识形态斗争取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张。因为任何时候，这种试图用纯经济斗争取代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仍然是需要政治来完成它们的任务的，即便它自身极力否认自己的政治属性，它也只能以缺乏政治原则统筹和纪律维系的方式，诞生自发的、混乱的政治和组织形态。而这些政治和组织形态往往问题重重，甚至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的无意识的模仿和延续。

中国需要且只需要一个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将领导中国工人、学生、以及被团结在中国工人周围的农民和一部分进步小资产阶级，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府，在经济上剥

夺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交由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管理，并剥夺资产阶级法权、确立社会主义法权以维护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经济上将政治权力从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官僚代表那里移交到工人手中，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民主政治；并将社会主义革命的浪潮带向国际。

为此，这个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必须有明确的、直白不隐晦的、被党员普遍认同的政治主张、政治原则和政治路线，以确立整个党有集中的、统一而成熟的政治行动；有一个稳固的组织原则以确保前者能持续实现，这就是民主集中制；以及有根据党自身的状况，比如规模和发展阶段，以及根据外部环境（尤其是安全环境）灵活改变的组织方法，比如在这里建立一个读书会，在那里建立一个讨论班，在这个学校组织一个学生小组，在那个公司组织一个工人小组，甚至是一对一的单线联系，这一点可以灵活，但是必须通过民主集中原则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内。

这些要求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对中国革命共产党给出的必选。而面对中国监察系统的特殊情况，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必须灵活地选择方法，以组织起一个成熟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党的内部，党的原则和路线通过民主集中制得到党员的一致认同，对党的外部，应当采用各种灵活的方式让我们的潜在同志知道我们的政治主张，并且让认同我们的现实路线主张的人加入我们。面对已有的左派团体，我们应该基于路线共识团结其中认可我们主张的人，必要和力量允许的情况下说服动摇者，鼓动他们遵从民主集中制原则并入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遵循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和组织方法工作，在灵活的、不同的工作部门中发挥自身的长处。

2. 布尔什维克党如何被组织起来？

对于一个政治组织，组织模式、政治路线和组织规模必定是适配的。在当下中国，由于工人阶级不论在人数还是力量上都全球最庞大，而中国资本主义又涸泽而渔地对工人持续超额剥削，已经激进化起来的左翼群众数目广大。在这个背景下，限制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扩张的，绝不是一些“老左”悲叹的“群众缺乏自觉”、“阶级力量对比不容乐观”！而往往是党自身的组织模式和政治路线问题。布尔什维克党的扩张不只是一个靠宣传和时间来积累人数的问题，而是只有确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建立了健康的组织模式，才能容纳一个成规模的、群众的革命共产党。

印证这一点的一个反面例子是一个现今已经基本流亡海外的革命组织。他们恐惧于中国的警察机器，但又在理论上仅能保守上世纪苏俄的老黄历、无法针对中国当下提出灵活的工作方案，因而在政治路线上龟缩不前。他们的龟缩政治路线、止步不前的政治工作导致事务凌驾于组织，只能和事务性官僚独大而非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模式适配，而这样的政治路线和组织模式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容纳更多的组织人数，因为组织规模稍一增大，就又会产生官僚组织无法调和的异见和分裂。

这和上世纪第四国际的频频分裂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相似的教训：革命党面对新的国内和国际局势，在提出新主张时有时会产生分歧。但是健康的民主集中制可以让党在形成集中决策时民主地考虑到不同意见并鼓励将理论分歧通过政治讨论充分展开，而持续进行着的政治工作则不断地检验党的理论和政治决策的正确与否。如果政治工作长期没有进展，那么理论分歧就会失去裁判和解决的方法，成为空洞的、无休止的争论。这个时候一种解决方法是不再鼓励理论活力，仅维护过去“一定正确”的理论正统，来消除党内的政治分歧。

这可能如他们所说，是在革命低谷时期“保存革命火种”的办法。**但这个方法不属于当下中国！**当下中国非但不处于无产阶级力量薄弱、阶级意识低迷的革命低谷时期，相反无产阶级的抱怨、愤怒和抗争已经随处可闻。固守这样的老黄历只会导致革命党的政治工作在当下中国无法展开，这又进一步地导致了组织模式的畸形，从而回过头来真的束缚住了组织发展的手脚。

在当下中国，布尔什维克党只有**严肃、踏实地以民主集中制原则建设组织，并且针对现实形势大胆地提出政治方案并持续践行**，才能在不论是组织风气还是组织规模增长上都有源源不断的活力。这样的党，才能用不仅仅是正确的理论，而且是实际的势头正旺的行动证明给中国的无产阶级：

我们是能为群众提供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并且有政治能力兑现的革命共产党！

XIII

文化战线：我们的现实与革命的自由

从原始人围坐在篝火旁第一次奏响骨质乐器开始，文化就没有任何一秒脱离了人类的视野。采集、渔猎或是农耕；搬砖、编程或是写作，人们无时无刻不在生产生活中通过动作、文字、声音乃至其活动本身等表达着作为个人活动的感想、思考或评论。文化问题贯穿人类历史，是阶级社会发展过程的优秀写照。清晰地阐述文化问题对于我们认知历史、指导未来都有着不小的意义。

什么是文化？

文化一词，就其起源而言，最初由西塞罗阐释为“灵魂的培养”，而后在不同语境下存在着诸如经验积累、人文教化和公共潜意识的外显等多种解释；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则是通过不同媒介表达的一般的社会思想及其所蕴含和得以展现的特殊的个人思想。然而，文化的意义与其一般所表现出的直接现象相反，其决不是脱离了物质而凭空出现在人脑中的臆想。相反，人的任何思想都必须以他所接触的一切外部物质环境为基础——一个以社会性为其基本性质的人，不能不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他所处的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即人与人在生产中占据的不同地位，发生的不同关系中汲取产出思想活动或文化创作的原料。因而文化就其本质的一般性而言，必须是基于一种普遍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认知方式——文化是物质的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中广泛的反应。

作为封建主、古典帝国官僚和资产阶级文化创作者存在的艺术家们都曾经创造出属于他们所处的生产关系的文化，而科学社会主义者所强调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劳动者在文化创造中的主要地位将超出之前统治阶级文化狭隘的范畴。无论是在资产阶级专政之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政权之中，无产者的文化创作都不仅意味着占据生产关系最主要物质生产地位的群体将会产出最能够反应该物质基础的文化产品，更能够代表其同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落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无产者的文化产品必然从不同视角包含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动态的斗争过程，并将作为人类历史进程本源的阶级斗争辩证地塑造为一个整体。再也不会有人在研究古代庄园、城堡、壁画和宫殿的时候忽略附属于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被资产阶级史学家

定性为“不值得学习”的文化印记——属于被剥削者与劳动者的文化符号将被给予同一切剥削者文化相等的关注，社会主义史学将以阶级斗争的视角重塑我们认识人类社会迄今以来一切历史与文化的方法。

文化与政治

在所有产生不同文化的物质基础之上，阶级社会的文化将必然辩证地包含阶级斗争这一基本进程。由此，所谓社会的文化必然会存在的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正如社会生产中必然会存在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那样。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创造维护自身再生产条件的自然倾向，并自然地导致上层建筑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压制其他意识形态与文化体系，进而对作为物质基础的生产关系产生反作用力。

这一过程既包含了我们所熟知的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又包含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前者不仅意味着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技能，同时还要求再生产劳动力对现存秩序规范的服从，即工人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服从与全社会作为集体为剥削者和食利者集团产出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能力，这种能力被国家机器的综合运用保障。因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即社会文化，在其塑造和展现的过程中不能不具备起码的政治性——这似乎会导致一种结论，那就是既然由于纯粹的文化，“为艺术的艺术”的不存在，那么任何阶级想要进行统治或至少是筹备进行统治，就必须抢占文化阵地，就必须自觉地在社会文化中推行本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有文化的军队”，使得文艺不仅是要变成革命机器的一部分，而且是要变成政权的一部分，就像曾在中国和苏联所发生的那样。

基于类似结论而产生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文化问题的重要聚焦点。在阶级斗争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两类现实主义：一类是肯定的现实主义，一类是否定的现实主义，他们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是新旧阶级斗争关系中的一体两面——当一个阶级尝试通过各种方法取得或巩固统治地位时，它不能不懈怠了对它构建或构想的理想秩序进行的赞颂；同样，被迫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也不能不为了追求同样的目的而结合其被统治阶级之地位所带来的现实发展出批评或否定现存秩序的现实主义。举例来说，前现代君主制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控制力有限的治理结构会不遗余力地歌颂皇帝、国王、贵族与骑士，号召全社会的节制与禁欲，而兴起的资产阶级却会主张回归人的现世生活，为导向萌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消费或享乐主义张本；建立了稳固统治的资产阶级会积极宣传作为生产单位的传统家庭观念与维护社会生产环境稳定、国内市场统一的“爱国主义”，而不屈的无产阶级将会一分钟也不停地从受尽压迫剥削的生活得到教育并将对自身苦难的感知发展为各种自发的工人阶级艺术，如早期的街头涂鸦与爵士乐。

卢那察尔斯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们把现实理解为“一种发展，一种在对立物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运动”。他们被卢那察尔斯基称作战斗者和建设者：他们自觉地批判了有产阶级静止的现实主义，从自身左派知识分子的角度去抨击为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所蒙蔽的黑暗现实的同时也揭穿了反动分子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怀好意的发自“资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攻击。他们坚决撕下有产阶级温情脉脉、反动的现实主义，把旧社会最深的黑暗和新社会最亮的光芒同时表现出来。的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一方面重视现实，展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成果；但是他们一方面又展望未来，希冀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从现实的确切趋向以发展的观点描绘可能达成的未来。当下现实的斗争怎么能够不在共产主义的手里与未来的物质基础结合起来呢？接受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浪漫主义地展望未来，注重当下、脚踏实地但比任何人都重视通过艺术团结进步力量和更坚定地迈向未来——因为社

会主义的“浪漫主义”决不是怯懦地逃入空想世界，却是反映现实——发展中的、未来的真正的现实——的重要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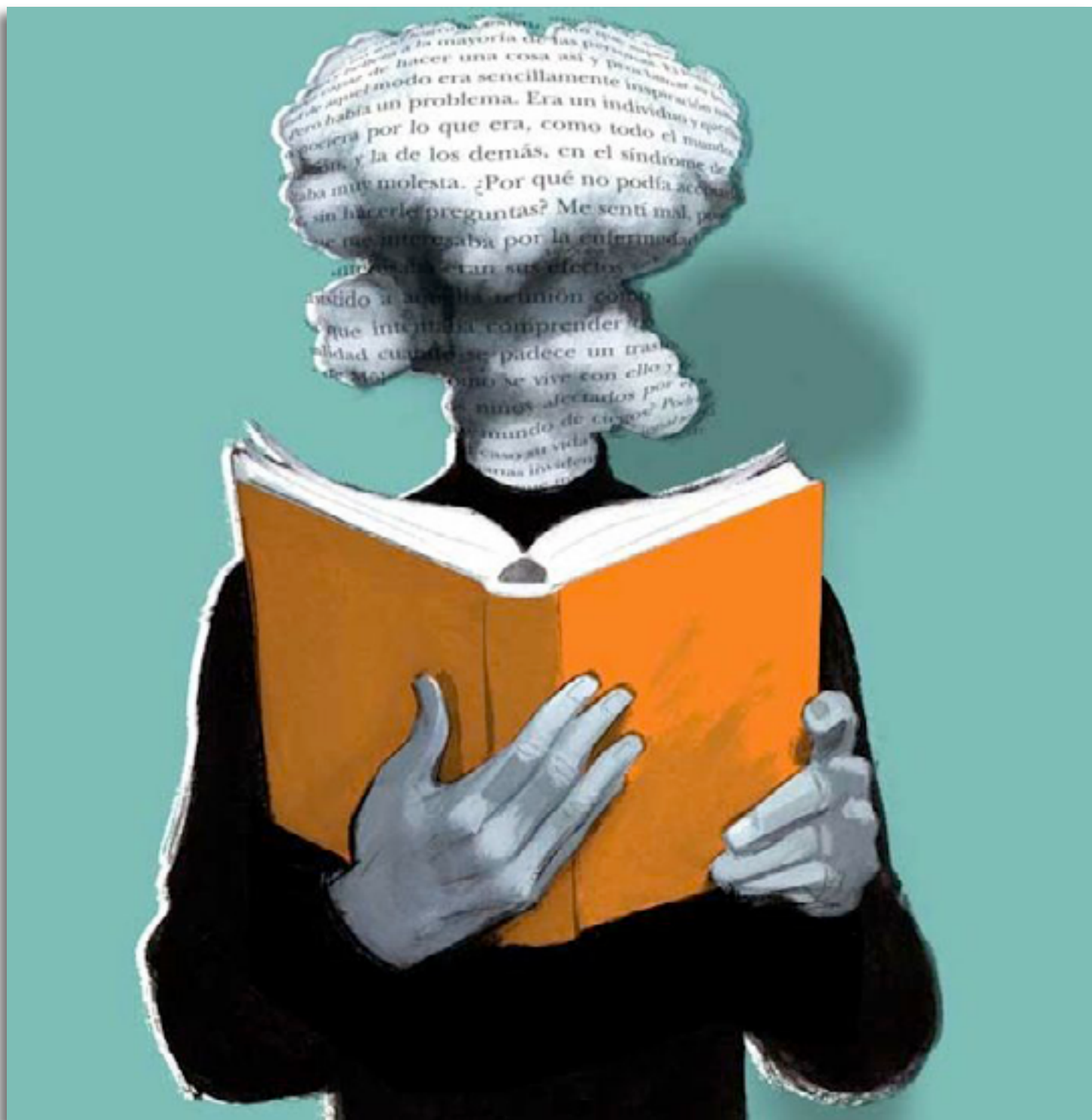
诚然，共产主义者不屑于隐瞒自己按照无产阶级的意愿改造世界的意图，无论是在政治行动上还是文化创作上皆然，社会主义政权的文化机构也当然要为无产阶级服务，各种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的文化产出自然都要自发地服务无产阶级专政，满足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完善经济基础、推进政治建设的诉求，然而，尽管这样的目标十分美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对于实现这样美好愿景的方法论却出现了严重的误会。卢那察尔斯基及此后采取社会主义之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和政客，包括斯大林、赫鲁晓夫等苏联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共和许多其他社会主义政权的政客都采取了可以概括为“政权对文化的彻底垄断”策略——这就是说，他们要借助文化的政治性扩展行政官僚的权力，而非无产阶级民主与劳动者自由表达的权利，是要让文化“服从属于国家机器的政治任务”，而却忘记了此时的国家机器仍然具有相当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残留，还远远无法代表尚无自由、民主地表达自身思想的广大无产阶级！借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理论武器，许多仍然无法摆脱资本主义时期甜美的国家机器集权呼唤、因新政权缺乏人才而留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旧官僚、旧权威肆意妄为地打压一切无产者争取自由的文创作的权利，攻击一切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先进潮流——苏俄文艺“白银时代”被粗暴地结束、革命样板戏被严格约束成政治词句的堆砌正是铁证——作为合理的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基础诉求的呼应遭到了官僚集团的利用和扭曲，成为了国家官僚审查和打压自由创作权的工具。这样的悲剧不能不说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又一血淋淋的教训。科学社会主义者绝不能够在革命之后相信国家机器“自我改造”的自觉，也绝不能够依赖某些专家和知识分子从脑海中凭空臆想的所谓“革命策略”——只要作为上层建筑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残留仍存在一天，无产阶级就必须被动员起来拿起笔杆，通过最广泛的自由创作权，在上层建筑中建设与捍卫业已焕然一新的物质基础。

技术与文化

技术的发展过程同样无法摆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影响，并同时对文化创作与传播的链条施加巨大的反作用因素。造纸和印刷技术的发明与推广为文化创作提供了载体，航海技术的突破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但是阶级社会的历史无时无刻通过其反动政策的方方面面提醒我们一个充满人民血泪的事实：无论是在封建等级社会获取起码教育的困难，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产出最适合资产阶级所需的劳动力而进行的教育资源倾斜，都揭示统治阶级仅仅根据自身利益而自觉封锁大众接触完善的教育、防止全民掌握技术的丑恶嘴脸——这是为了捍卫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生产过剩和所谓“廉价劳动力后备军”而服务的。资本家们制造最先进的机器，却发动最残暴的下岗浪潮；剥削阶级提出最“素质”的教育体系，却只供食利者的子弟们享用；金融巨鳄掌握着全世界最高效的媒体平台，却散布着最为低智的奶头乐麻痹劳动者的思想——与之相对的，由全世界工人发动、长期以来坚守社区的开源运动却代表一场由无产者自发产生、反对资本通过“知识产权”定价、垄断属于全人类共同的智慧财富、以不为资本折腰的全民技术为理想的解放性运动——这场运动产生了世界大量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所使用的、无法被资本家监控的各类安全互联网平台与操作系统，以工人阶级的线上社区为基础在数十年的连贯时间内创造了让垄断资本家惊慌失措的规模扩张，给予无数人民使用最新科技成果自由地表达自我的能力。技术要为全人类服务，也只有在为全人类服务的过程中，技术才能够不仅仅是作为经济基础的一员，而且是帮助组成经济基础的生产者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影响上层建筑的道路。

未来会怎样？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借助技术提高自我、把握自己，无论答案如何，至少解题的

方法能够由他们来亲自书写了。



怎么办？

阶级社会的文化因其要求维持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所形成的上层建筑必然追求一种蒙昧或半蒙昧的文化状态，其目的在于抑制人们表达自己的意志的能力，通过把人的活动异化、客体化而消灭每个受剥削压迫者的主体性，让他们彻底成为可供采撷的劳动力容器而非活生生的、完整的人，让每一个劳动者当一辈子奴隶，当一辈子工具。相反，社会主义以及其所导向的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恰恰是由全面发展的、认识并占有全面的本质的一个个“完整的人类”构成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的经济基础所要

求的必然是在一切方面坚决贯彻自由与解放的的上层建筑，它不能不把最彻底的表达权还给自由人民的联合体，进而摒弃官僚集团无耻的文化发明以及通过文化领域对无产者的异化。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文化产物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为了消灭包括自身在内的旧社会残留要素而存在。真正脱离了政治和阶级的文化有没有可能存在？当然可能，但只有因阶级的消亡而导致阶级文化消灭时才存在——但是这决不是官僚集团像他们口中念着未来不知猴年马月的国家消亡的真经却干着官僚化社会主义政权的下流勾当一样无耻僭越一切文化创作的借口。让凯撒的归凯撒，缪斯的归缪斯吧！健康的社会主义文化从其诞生到完成其阶级意义上的历史使命而随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消亡的消亡，自始至终是依赖于健康的土壤，即由劳动的无产阶级民主掌握的计划经济之磐石，而决不是官僚与学究摇摇笔杆子就能够指导创造的。

那么革命的新政权到底该如何对待过渡时期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残余？文化领域的对立由于资本主义价值规律、剥削关系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残余与新生的、充满工人阶级秩序的计划经济之间物质基础最尖锐的对立矛盾而产生，这种情况并不会在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变革取得进展前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这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以某些组织的意志为转移。恰恰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所不得不在经济基础中保留的，以按劳分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存持续影响着上层建筑，而这就要求任何革命者都决不能懈怠党最初始和最根本的任务和基础，那就是在充分的工人民主的地基上坚决贯彻社会主义经济改造，通过推动物质基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从根源上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铺就更完善的道路。诚然，人的意识的发展并不是线性上升的过程，维护社会主义政权也不能仅仅依靠人民的自发性，但是也绝不能仰仗官僚的包办与僭越——无论是革命党还是社会主义政权的管理机构与无产阶级自身都无法独自完成维护社会主义改造与过渡的政治任务。

因此，虽然作为先锋队的革命党作为无产阶级中最激进分子的代表，肩负着自觉干预历史过程，把分散的无产阶级引导到最高的组织形式上去的任务，但绝不能把这个任务归类为纯粹组织性的问题，而抛弃了对无产阶级意识的教育、抛弃了通过引入无产阶级民主而对旧国家机器进行的彻底重塑。革命的言论自由将不是自由派所幻想的完全自由放任，也决不应是某些知识分子和御用笔杆子“我也是十四亿分之一，怎么我就没有感受到任何压迫”的言论自由。革命的党在夺取政权后必须要做的恰恰是与剥削阶级的政党完全相反的事情——进行最全面最深入的教育，让每个劳动者掌握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具备艺术表达与政治批判的能力。只有这样，革命者才能真正发动群众，真正地实现在当时缺乏物质与政治基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未能实现的、在充分保证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劳动者之间最真切的言论自由。把文化还给得到了充分全面发展的人民——这就是共产主义者在文化问题上的至高回答。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政治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寰宇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华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寰宇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华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中国和华人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寰宇内的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

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以双手开拓的、属于新世界未来的晨曦！